

身处前沿

世界银行与中国合作 40 周年纪念文集



1980
— 2020

© 2021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 World Bank

1818 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3

Telephone: 202-473-1000

Internet: www.worldbank.org

2021 年版权所有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 世界银行

地址：1818 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3

电话：202-473-1000

网址：www.worldbank.org

本书为世界银行员工及外部人员的作品。本书所阐述的调研结果、诠释和结论未必反映世界银行、世行执行董事会及其所代表的政府的观点。

世界银行不保证本书所包含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实时性，对此信息的错误、遗漏或差异，以及使用或未能使用所阐述的信息、方法、程序或结论不承担任何责任。本书中的任何地图所显示的疆界、颜色、名称及其他信息，并不表示世行方面对任何疆土的法律地位的判断，也不表示对此类疆界的认可或接受。

此处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或被不得认为是限制或放弃世界银行的特权和豁免，这些特权和豁免都是明确保留的。

权利与许可

本书的材料具有版权。由于世界银行鼓励知识传播，因此本书内容可以全部或部分翻印转载，用于非商业用途，但须注明出处。

对权利和许可（包括附属权利）的任何疑问应发送至世界银行版权部，地址：World Bank Publications, The World Bank Group, 1818 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3, USA; 传真：202-522-2625; 电子邮箱：pubrights@worldbank.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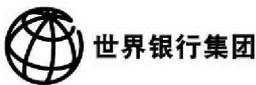
Reflections On The China World Bank Partnership 2014-19 © Bert Hofman

关于 2014 年至 2019 年中国与世界银行伙伴关系的思考，版权所有，郝福满

报告设计：Spaeth Hill

中文版翻译：李莉

身处前沿



目 录

前言

阿克塞尔·冯·托森伯格 4

邹加怡 6

引言

芮泽 8

第一部分：中国与世界银行四十年合作历程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席位

凯奥·科赫-韦泽 11

从计划到市场：伙伴关系初期的合作经济研究

林重庆 20

维持长久的伙伴关系，1987—1994 年

贾维德·伯基 27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工作的日子

鲍泰利 33

世界银行与中国改革：1994—1997 年

尼古拉斯·霍普 39

中国的扶贫战略与世界银行的支持，1997—2004 年

黄育川 47

应对中国严峻的环境挑战

杜大伟 53

中国与世界银行：从发展合作到建立全面的全球伙伴关系，2010—2014 年

罗兰德 58

关于中国与世界银行伙伴关系的思考，2014—2019 年

郝福满 63

第二部分：中方的思考

双方合作与时俱进不断迈上新台阶

杨少林 71

农村综合发展：世界银行项目经验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张文才 75

支持中国在 2015 年《巴黎协定》下为减排做贡献

陈诗新 78

中国与世界银行的知识伙伴关系：鉴往知来

杨英明、叶玉 83

结束语

中国与世行合作 40 周年反思

王忠晶 89

承前启后书写伙伴关系新篇章

常军红 91

继往开来推动伙伴关系行稳致远

维多利亚·克瓦 92

作者简介

94

世界银行对华贷款项目

1981—2021财年

102

世界银行对华政策研究项目

1981—2021财年

127

前言

阿克塞尔·冯·托森伯格¹

中国在过去 40 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堪称一项具有巨大全球意义的杰出成就。在过去 40 年里，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国际开发协会借款国，发展成为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大借款国和国际开发协会重要捐款国，也是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贡献国。这种转变在世界银行借款国里实属罕见，也使得中国与世界银行的伙伴关系非同一般，要求世行随着中国的快速变化不断调整适应，也为其他许多世行借款国提供了重要的灵感和发展经验来源。

本文集也非同一般，集合了多位推动、参与和见证中国与世界银行集团 40 年合作的伙伴和朋友，他们在书中分享的个人感想与经历，对于像我这样对世行历史怀有浓厚兴趣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宝库。这些文章展现出双方如何凭借领导力克服重重障碍，在面临挑战时如何依靠双方建立的互信，证明这一伙伴关系具有适应力，能够保持强健。

我想就 40 年世行与中国的关系分享几点个人的想法。

我们的合作关系是令人振奋的。世界银行为参与中国的发展成就而深感自豪。世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喜欢回忆 1980 年邓小平对他说的话，“中国下决心要实现现代化，发展经济。没有世行的帮助，也照样要做。但有世行的帮助，中国实现这些目标会更快、更好。”邓小平的话一直是我们的世行同仁们的动力源泉。

知识与相互学习始终处于伙伴关系的核心位置。20 世纪 80 年代初，世行完成了第一份对中国经济的详细分析，从那时以来，知识工作始终处于双方合作的中心。世行批准的首个对华贷款项目是重建中国的大学体系。我们也向中国学习，学习政策试点和次优务实解决方案的意义、交付和执行力的重要性。和中国的合作帮助世行造就了一批发展领域的顶尖专业人才，本书收录的作者简历就是证明。今天，我们共同致力于同其他国家分享这些经验——中国的改革经验。

随着中国日益富裕，中国也成为世行的重要贡献国，最重要的贡献当然是向国际开发协会捐款。2007 年，中国首次向国际开发协会（IDA）捐款。12 年后，中国在国际开发协会第

¹ 阿克塞尔·冯·托森伯格（Axel van Trotsenburg），世界银行运营常务副行长，在世行历任多个高层职位，2014 年至 2017 年担任世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副行长，在任期间监督世行对华贷款显著加大对气候变化和国内改革重点难点的支持力度。

19 轮增资中成为第六大捐款国。作为负责国际开发协会第 17 轮和 18 轮增资的副行长，我想借此机会，对支持国际开发协会增资的中国财政部同事们表示感谢，我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密切合作。

如今，中国在全球的经济与资金实力，使中国在应对世界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中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从应对气候变化到防范大流行病，从避免债务危机到促进区域一体化和互联互通投资，从创造就业机会到解决社会排斥问题、促进可持续发展，我们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将继续成为寻找解决方案的关键。

当我们面临共同挑战时，对于未来方向并非总能达成一致。我们有过意见分歧，但我们的伙伴关系足够强健，能够帮助我们渡过难关，而我坚信未来仍将如此。

我们能够从双方合作历史中汲取力量，但我们所了解的世界可能已不复存在。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健康与经济危机前所未有，地区和全球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在世界某些地区，十数年取得的社会和经济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我们该如何应对，这对于世行、对于中国作为重要参与方的多边合作，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中国有句老话，“四十而不惑”。走过了 40 年，对于双方伙伴关系未来的发展，我们应该看得更清楚。世行应该在中国做什么？中国应该在世行做什么？中国和世行能够一起做什么来推动全球发展？在一个瞬息万变的环境中，纪念合作 40 周年提供了一个契机，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这些重要问题，引导双方伙伴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希望本书收录的个人回忆文章能够带来灵感。

邹加怡²

今年是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 40 周年，也是我个人职业生涯同中国与世行伙伴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第 32 年。

作为这本文集的基础，纪念中国世行合作 40 周年座谈会可以说是一次家庭大聚会，是许多老朋友的久别重逢。尽管采取了虚拟会议的形式，但经过 40 年的成功合作，我们的友谊却是实实在在的，是脚踏实地的。40 年来，我们携手努力，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构建一个没有贫困和共享繁荣的世界。今天，我们可以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践行多边主义、合作共赢的典范。我想着重谈谈双方伙伴关系的三个方面。

我们是深化改革的合作伙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是中国与世行合作的奠基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中国恢复世行合法席位后不久，世行组成经济考察团访华，形成了两份宏观经济研究报告。中方与世行联合举行的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对推动围绕中国市场化改革建立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³。40 年来，世行总共为中国改革与发展提供了 500 余篇分析报告。近年来，双方联合完成了《2030 年的中国》《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创新中国：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等系列旗舰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中方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也为全球解决复杂的发展问题提供了见解和方案。

我们是减贫与经济转型的合作伙伴。截至 2020 财年底，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对华贷款承诺总额超过 644 亿美元，共支持建设 434 个项目，覆盖中国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这些项目既带来了金融资源，也带来了智力资源，帮助并见证了从中国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新兴经济体国家、从借款国发展为捐款国。以贷款项目为载体，中国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规范化的运作机制，竞争性招标、工程监理、污染收费制度等创新在全国普遍推行，成为标准做法。

我们是国际发展的合作伙伴。40 年来，中国在世行的角色从以借款国为主向股东国、借款国、捐款国、新型发展伙伴国等多重身份并重转变。中方积极参与世行内部治理。作为前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我亲身参与了许多世行内部治理事务。中国还出资设立了“中国—世行伙伴基金”。中国成为国际开发协会捐款国，并持续加大捐资力度。中国与世行联合举办上海全球扶贫大会，合作召开对非投资论坛，积极推进三方、多方合作。这些努力丰富了世行与成员国的关系，扩大了发展合作的空间。

40 年来，双方合作并非一帆风顺，但“有志者事竟成”，在一代又一代同仁的坚持和努力下，每次风雨过后我们总能见彩虹。在此，我对所有曾经或正在参与推进中国与世行良

² 邹加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副部长。

³ 详见本书中贾韦德·伯基和林重庚的文章。

好合作的合作伙伴、同事致以崇高敬意!

在世界大变局中伙伴关系快速发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积极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经过艰苦努力,2020年实现经济正增长,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正在致力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为中国与世行的合作带来新的机遇,我们希望世行从战略高度和长远眼光看待双方合作关系,以建设性态度推进合作,共同努力确保中国与世行合作行稳致远。我认为在三个领域存在这种机遇。

一是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世行应继续坚持2020至2025财年华《国别伙伴框架》确定的合作精神和内容开展相关合作,保持世行对华年度贷款规模稳定在10亿到15亿美元区间。同时,世行可以支持中国应对相对贫困、老龄化社会、城乡差距等新挑战,助力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是构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合作伙伴关系。世行可以围绕中方创建以规则为基础的竞争性国内市场、优化营商环境、推进规则标准现代化等重点领域,提供良好国际实践和政策建议,促进中国更好融入全球经济体制。

三是构建全球公共产品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可以继续加强在气候变化、海洋塑料污染、新冠肺炎疫苗采购等领域的合作。中国已经承诺将把国内开发的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并已优先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疫苗。

今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期待世行继续加强与中方合作。双方过去40年的合作展示了多边主义和合作共赢的力量,我们相信,只要持续深化双方友好互利合作,我们将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引言

芮泽⁴

本书收录了过去 40 年参与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的双方部分主要人员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根据 2020 年 10 月在线举行的纪念中国与世行合作 40 周年座谈会的发言整理而成，其中很多文章进行了大量修改和充实，讲述了个人在中国近期历史上的一个非凡时期、在中方与世行令人兴奋的合作中的亲身经历，内容丰富，引人入胜。对中国领导层来说，世行在当时既是具有影响力的顾问，也是国际理念与经验的传播者。

随着中国的发展，世行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但这一合作关系对于双方依然非常重要。无论是世行的国别局长，还是中国财政部的司长，或是驻世行的中国执行董事，都表示这一伙伴关系给他们的个人职业生涯留下了深刻印记，表达了对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的满足感。

在阅读这些文章时，应看成是作者个人的思考与感悟，而不是世行与中国关系的官方正史，也不是指导未来的路线图。因此，免责声明对于本文集收录的世行和中方的所有文章都适用。文章中的趣闻轶事和选择内容反映了作者经历中最难忘的片段，其中有些作者在任职期间以及后来的研究工作中参与了围绕中国经济发展改革的政策辩论，本文集并不试图对此类资料进行总结，也不想提供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概述，更无意全面涵盖世行在华业务计划和对华合作的发展演变。我再次重申，文章中所涉及的重要事件是作者本人根据其意义的记忆选择采用的。在编纂本书的同时，我们也在编制一个更全面的世行与中国合作的知识文库，将通过一个专门的交互式网站呈现。对世行与中国关系的诠释与评价，最好留待历史学家们去评说。

但是，这些文章呈现出一个总体叙事。显而易见，世行从一开始就向中国提供了诚恳和基于证据的政策建议，但在处理与世行的关系、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方面，中国始终牢牢掌握着主导权。知识自始至终处于突出地位，尤其是在合作初期，而贷款在快速增加之后重要性逐渐下降。世行定期参与国家层面的政策辩论，先是通过巴山轮会议、大连会议，然后是《2020 年的中国》《2030 年的中国》以及其他世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联合研究。然而，在大部分时间里，世行的影响力是在地方层面，通过示范项目和改革

⁴ 芮泽 (Martin Raiser)，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接替郝福满担任此职。来华前，芮泽曾在不同地区任世行国别局局长，职业生涯初期曾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研究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转型。

试点，中方学习、调整、推广成功经验。通过新一批结果导向型贷款项目，直接实现规模化，标志着最近世行做法的变化和加强国家层面政策参与的新尝试。最后，近 10 年合作中一个日益突出的主题是世行与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合作，通过国际开发协会、南南学习交流和围绕国际发展金融良好实践的讨论等方式加以实施。鉴于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和资金实力持续增长，这个主题会变得愈发重要，需要我们双方进一步适应。

还有几位参加 2020 年 10 月中国与世行合作 40 周年座谈会的中方与会人士未能为本书撰文，这一点在本书的编排上反映出来。在中国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和世行运营常务副行长阿克塞尔·冯·托森伯格的前言之后，第一部分是几位前世行国别局长的文章，按年代顺序排列：20 世纪 80 年代为凯奥·科赫-韦泽和林重庚；90 年代为贾韦德·伯基、鲍泰利和尼古拉斯·霍普；本世纪头十年为黄育川和杜大伟；第二个十年为罗兰德和郝福满。在每个新的十年的开头都配有几张该时期的标志性图片，以及中国主要经济发展和世行贷款计划演变的概要。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中方作者的文章，按专题排列。这部分的开篇文章作者是杨少林，他从现任世行高层管理团队成員、前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和财政部国际司司长的高度阐述了世行与中国的合作关系。第二篇文章作者是现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张文才，他论述了中国综合农村发展经验。第三篇文章作者是陈诗新，现任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他讲述了世行业务重点转向支持中国根据《巴黎协定》采取的气候行动，其经验对未来的伙伴关系发展具有高度相关性。第四篇文章作者是杨英明，他是前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现已回中国财政部任职，他论述了世行与中国在知识和资金合作方面的互动，为其他国家以及伙伴关系的未来提供启示。结束语由前财政部国际司司长王忠晶、现任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常军红和世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副行长维多利亚·克瓦撰写。

第一部分

中国与世界银行四十年合作历程



1980年4月15日，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率领首个世行代表团访华，受到邓小平副主席会见。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席位

凯奥·科赫 - 韦泽⁵

本文回忆了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席位以及中国政府与世行合作初期；1980年2月初次接触、1980年4月时任世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访华并受到邓小平副主席接见；一年后世行批准首个对华贷款项目，完成第一份中国经济研究报告；逐步形成大规模、多元化的贷款、技术合作和培训计划；应中国领导人的特别要求，紧密合作对中国未来20年可能面临的主要发展问题开展前瞻性研究，1985年完成第二份世行中国经济研究报告。

我认为，世行与中国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取得了显著成功，这缘于多种因素。中国恢复在世行的席位符合双方的利益。从中方来说，中国刚刚走出数十年的封闭状态，而世行是国际发展经验和理念的一个重要来源。对于麦克纳马拉以及在他领导下转型为一个专注扶贫的全球性发展机构的世行来说，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恢复席位，会使世行真正具有全球性。因此，双方都有速战速决的积极性。

邓小平和他的改革派行动迅速，他们顶住残存的反对压力，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领导国家走上新的发展之路。中国领导人在早期给予世行的信任，对世行开放数据和机构，这是独一无二的。麦克纳马拉也希望速战速决，尽管在世行执行董事会有一些反对意见，理由是美国1980年下半年的总统选举以及他本人1981年退休的计划。在世行方面，能否做出快速反应，并从世行各部门和国际上招募人员组成高素质的团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世行从一开始就很重视知识转让，比如培训课程、技能传授以及与对方团队紧密合作，而中方以快速学习、吸收知识和创新能力，以及有序实施和取得结果的能力相配合。

当然也有很多需要克服的障碍，不仅仅是语言障碍，中方希望获得的国际开发协会软贷款也很有限。而且那时候双方都存在知识盲区：经过数十年的闭关锁国，中方对经济、商务和财务管理的国际理念缺乏了解；另一方面，世行对中国经济、行业和机构、过去的业绩和未来的计划一无所知。这些都是最初的主要障碍，同时也是建立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的黄金机遇。我们常常把中国与世行的关系比作是“天作之合”，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分三部分介绍双方关系的初期阶段：1980年5月中国恢复世行席位之前的几个月；1981年6月前相互了解、合作和初见成效的第一年；以及接下来双方关系不断发展成熟的五年。这个时期涵盖了我参与世行对华业务的阶段，开始是担任麦克纳马拉行长的个人助理，后担任世行中国处处长，与担任世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的林重庚密切配合。

5 凯奥·科赫 - 韦泽（Caio Koch-Weser），1977年至1980年任时任世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个人助理，1980年至1986年任世行首任中国处处长，之后任世行副行长、常务副行长，1999年返回德国任财政部副部长。

麦克纳马拉与邓小平的会见和中国恢复世行席位

1980年2月11日，中国驻美大使请求拜会麦克纳马拉，并邀请他早日访华会晤中国领导人，启动中国恢复世行席位的流程。他咨询了获得国际开发协会信贷（俗称“软贷款”）以及中国在世行的席位从台湾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问题。麦克纳马拉指出，前提条件是先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席位，但中国大使并没有拜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也不知道基金组织在华盛顿的办公地点。麦克纳马拉表示，他很高兴了解中国恢复世行席位的意图，并强调指出他将对这一历史性请求和访华邀请给予高度重视。

为访华做准备

虽然从麦克纳马拉方面来说，对中国最终回归布雷顿森林机构的预期已有时日，他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时任财政部长迈克尔·布鲁门塔尔（W. Michael Blumenthal）的交流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看法，但收到中方的邀请仍颇感意外。自从1973年在内罗毕举行的年会以来，双方之间并无官方交流，但有少量非正式接触，世行也了解1979年中国银行研究局曾牵头组团调研恢复席位的可行性。麦克纳马拉立刻着手为访华做准备。

他通知了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雅克·德拉罗西埃（Jacques de Larosiere）。德克罗西埃表示一旦开始正式接触，他愿意马上采取行动。麦克纳马拉召集了一次秘密会议通知世行执董会，并要求赫里伯特·戈尔桑（Heribert Golsong）领导的法律部开始准备中国恢复席位的法律文件，要求沙希德·侯塞（Shahid Husain）因领导的东亚地区为访华准备有关中国经济和优惠贷款资格的材料。在工作层面，东亚地区熟悉中国情况的经济学家林重庚准备介绍材料，我帮助协调访华计划。

在接下来几周里出现的主要问题涉及到台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资格、国际开发协会、美国国会的态度、谈判时机等。遵循联合国的先例，代表权变更得到了台湾的接受。但是，中国恢复世行成员国席位的问题仍充满争议，并受到美国国会的激烈抵制，引得有些人提出慢慢来。1980年4月8日，在麦克纳马拉出发去中国的前夕，时任美国财政部长G·威廉·米勒（G. William Miller）和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在几次会议上向他施压，要求他推迟访华行程，把这次访问仅作为探讨性的，把中国恢复席位的日期至少推迟到1981年9月以后。麦克纳马拉表现出坚定的领导力，他表示，他此行是应中方最高领导人的邀请，不是为了世行管理层，而是为了中美双边关系，去为一件拖延已久的事转达美方的良好祝愿。在这些争论激烈的会议上，他还提出质疑，美国政府如何能在政治上和公开场合坚持一年半对中方表达的愿望置之不理。麦克纳马拉的计划占了上风。第二天，他按时出发前往中国，陪同人员有莫因·库雷西（Moeen Qureshi，世行主管财务的高级副行长）、赫里伯特·戈尔桑、沙希德·侯塞因和我本人。

在北京的会谈

在快速完成代表权转换的共同愿望激励下，在北京举行的五天紧张讨论证明双方都做了充分准备。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我们的访问由中国银行负责接待，这是一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在恢复席位的准备工作中主持过一次内部审议。我们的访问日程包括农村部（还包括参观一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公社）、外交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谷牧副总理和邓小平副主席会见。我们还游览了故宫和长城，也留下充裕的时间以便在必要时临时增加一些会议，麦克纳马拉对此表示欢迎。除了最初的设想外，根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讨论进展，会谈的焦点很快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行的代表权以及未来的世行贷款项目。为了尽快推动进程，世行准备了有关 1945 年以来中国代表权和恢复成员国席位的文件和信函草稿。

中国银行副行长为团长、由多个部门组成的中方代表团做了充分准备，立刻对各种文件展开了技术性讨论。会谈气氛亲切友好，重点突出，大家的共同目标是快速推进和完成流程。所有的会谈都是实质性的，耗时很长。到五天的紧张会谈结束时，双方已就中国恢复世行席位的大部分关键问题达成了一致，有些关键问题，比如中方的软贷款借款资格、世行获得中方数据、执董会代表席位等，则留待谷牧副总理和邓小平副主席会见时解决。

谷牧副总理的会见内容广泛，他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形势和现代化计划。1978 年他曾应邓小平的要求率领大型代表团访问欧洲多国，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他的考察报告导致了广东省经济特区的设立。谷牧副总理强调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农业部门的落后状况，强调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需要国外的专业知识和资金来帮助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计划，世行贷款应重点支持农业、轻工业和能源交通。我们还讨论了世行的业务程序和数据要求，谷牧副总理介绍了日本援助的初步经验。最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由沙希德·侯赛因在几个月后率团再次访华，就未来的贷款优先领域和备选项目取得一致。

邓小平副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我们，他事先已听取了关于双方讨论结果的详细汇报。会见开始后，他首先询问了世行对其他国家的贷款情况，并指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获得世行的优惠贷款。他表示，中国将一如既往地依靠自力更生到 20 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但国外的专业知识和世行的援助将会大有帮助，为了取得成功，中国需要 20 年的和平，在这方面最大的危险来自苏联及其通过阿富汗从印度洋方向侧翼包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张政策。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冗长的地缘政治讨论。

到会见快结束时，中方表示同意我们双方的关系应具有长期性，贯穿邓小平副主席构想的实现现代化远景目标的 20 年。虽然中国的发展基础是自力更生，



麦克纳马拉率领的代表团在北京受到邓小平接见。本文作者站在麦克纳马拉（着白色西装者）身后，代表团成员还包括莫因·库雷西（邓的右侧）、沙希德·侯赛因（左起第二人）和赫里伯特·戈尔桑（右起第四人）。

但中国也希望借助国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资金支持。麦克纳马拉提出一个假设，虽然世行的数据要求和程序有时过于繁琐，目前还面临资金紧张，但十年后世行应成为中国获得经济和技术援助的最大单一来源。邓小平最后表示，从长期来看，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也会成为促进世界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知道有些人对中国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感到担忧，但共产主义有很多种定义，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永远是第三世界的一员。

离开中国时，麦克纳马拉坚信，有了双方达成的协议，有了中国领导人表现出的紧迫感，他就能够成功地说服世行成员国立即采取行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之后，1980年5月15日，在世行执董会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正式接纳为中国在世行的合法代表。美国此时表示完全支持，美国执董还赞扬了麦克纳马拉的智慧、远见和领导力。

共同学习建立 紧密关系

快速布局初见成效

中国恢复世行席位后不到三个月，在邓小平副主席对双方建立重要和紧密的长期关系的强有力支持下，在第一个财年内，也是在麦克纳马拉1981年年

中从世行退休前，双方合作战略初步取得重大成果。从内部来说，沙希德·侯赛因在访华时已向中方宣布，将在世行规划局设立中国处，全面负责世行在中国各方面的工作。他要求我在1980年世行年会结束离开行长办公室后担任中国处处长，要求林重庚担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世行决定给中国处提供一大笔专用预算拨款，可以快速灵活地用于从世行内部和外部吸引顶尖人才，不受通常很死板的官僚和预算限制，这给了林重庚和我快速行动的必要手段，有利于为我们的经济研究和贷款工作招募最佳专业人才。结果很快表明，世行内部专家和国际专家对于加入我们工作从而获得进入中国的机会兴趣浓厚。

在中国方面，建立关系的职责被分配给了财政部，并很快组建了一支团队。在解决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认购股权和代表权等剩余问题后，中国在世行执董会获得了自己的席位，财政部的王连生成为首任中国执行董事。他曾是中国银行研究恢复世行席位可行性的工作小组成员。

根据在麦克纳马拉访华期间达成的协议，由沙希德·侯赛因担任团长、规划局和项目局局长爱德华·杰科克斯（Edward Jaycox）和赛义德·基尔马尼（Syed Kirmani）、交通处处长库特·卡内马克（Curt Carnemark）、能源处处长杰克·比奇（Jack Beach）、林重庚和我本人组成的代表团于1980年7月访华。中方团队给予了我们热情接待，并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们拜会了很多部门，特别是能源、交通、农业和教育部门，倾听了各部门及其运行职能和计划的详细介绍。这是令



1980年10月至12月，世行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经济考察。世行考察团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全面调研，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报告，这是第一份由国际专家和中方专家联合对中国经济状况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的报告。

人着迷的入门课，让我们得以一窥未知的中国经济。我们得出的印象是技术规划、设计和实施能力普遍很高，但既没有强有力的中央计划，也没有市场机制，农业部门的改革是走得最快的。双方都希望尽快进入项目开发和贷款，并初步甄别出备选项目。在考察收尾时，我们受到不久后出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接见，他介绍了改革议程和他本人领导下在四川开展的第一批农业改革试点的情况。访问结束前，我们到四川考察了人民公社改革。赛义德·基尔马尼详尽介绍了世行项目开发步骤和程序，特别是对国际竞争性招标采购的要求，也明确了初期培训需求。

我们为第一年制定了如下战略和工作计划。首先，我们准备五个教育、基础设施和农业领域的项目，目标是在1981财年底将第一个项目提交世行执董会。第二，由东亚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帕尔维兹·哈桑（Parvez Hasan）和林重庚率领一个大型经济和部门考察团于年底前访华，并在翌年春完成对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面评估，报告的研究成果也将作为世行贷款以及确定国际开发协会软贷款资格的先决条件。第三，就组织采购、项目分析和贷款支付等领域的若干技术考察团达成一致。初期贷款计划规模以及软硬贷款构成等问题留待10月份世行年会后确定，原因是世行管理层尚未在执董会就资金方面达成共识。

双方合作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语言障碍，世行各团队只有少数几个人会说中文，而中方有关部门会说英语的人也很少。财政部从大学招聘了一批英语专业毕业生帮忙，他们中有些人后来担任要职，其中最突出的是金立群，现任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行长。但是，由于翻译不准确引起的误解常常增加了我



1981年6月23日，世行执董会批准第一笔对华贷款2亿美元，用于大学发展项目，资助中国25所重点大学采购教学实验设备和材料，提供奖学金资助大批学生出国深造。

们初期工作的难度。

中方团队的工作速度之快频频超出我们的预期。我们后来在考察项目点时常常会想，中方的工作进度总比项目时间表提前，完全不同于其他许多惯于拖延实施进度的国家，这也减轻了我的负担，使我总是能够按期完成快速扩大的贷款计划。

第一份世行经济报告大获成功。在1980年7月的准备团之后，我们立即组建了由大约30位专家组成的大型考察团，分成一般经济、农业、能源、工业和交通五个小组，考察日期定在1980年10月至11月，各小组轮流在中国考察一个月时间。考察团访问了代表全国各地不同情况的甘肃、湖北、江苏、北京和上海。报告终稿涵盖了一般经济、统计数据和九个行业部门，于1981年3月提交中国政府，6月提交世行执董会。

我们准备的第一个项目是大学发展贷款项目，包括25所大学的理科（物理、化学、计算机科学等），资助实验室设备、计算机以及科学家出国短期进修。高等教育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例如，我在武汉大学考察的实验室几乎是一片废墟。我们认为，引进世行贷款支持中国教育项目从象征意义上来说也是正确的选择。我们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盈余中拨出1亿美元支持这第一个软贷款项目，并给这个大项目补充了1亿美元硬贷款，也于1981年6月提交世行执董会。

合作密切领域 广泛

在第一年的成功基础上，随着双方在各个层面相互熟悉，关系不断加强，中方对世行贷款的需求快速增长。我们的战略调整以三个紧密相连的支柱为基础，即，经济与部门研究，贷款计划，培训和技术援助，特别是通过世行经济发展学院提供培训和技术援助。除了能力限制外，主要的制约因素是能否获得软贷款资源，尤其是在国际开发协会第6轮增资期间。

由于中国同时符合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贷款资格，我们的目的是说服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接受硬贷款比重不断增加的混合贷款条件。国家计委只是把世行每笔项目贷款的条件转嫁给借款部门和省份，而不是统筹使用从世行获得的所有贷款，确定一个统一的转贷利率（比如印度的做法），这就造成了各部门、国家计委和世行中国处之间冗长乏味的谈判。我和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每半年进行一次贷款计划审议，参加审议的还有世行东亚项目部的汉斯·怀斯（Hans Wyss）和后来接替他的戴维·特恩汉姆（David Turnham），这个问题总是成为最难啃的硬骨头，除此之外就行业部门构成和备选项目则很容易达成一致，各行业部门的实施情况也非常出色。同甘子玉的合作总体上是卓有成效和令人愉快的，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朱镕基对贷款备选项目也很上心。

带来丰厚回报的一个早期战略优先领域是世行经济发展学院的大规模培训



1984年，世行贷款建设的云南鲁布格水电站项目首次将国际竞争性招标机制引入中国。

计划，培训内容包括项目分析和招标采购等，培训地点初期是在美国华盛顿，后来在中国大规模开展。在最初几年内，参加培训的中国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超过千人。被选中参加这些培训对个人来说是一种特权，而且学成归来后他们有义务培训其他更多的人，这种倍增效应最令人印象深刻，对我们的合作大有裨益。

接下来的两个项目是在黄河下游地区通过改善农业灌溉排水系统治理盐碱地的项目和广州港、上海

黄埔港和天津港首个大型集装箱码头建设项目，随后是一大批遍布全国各地、涉及多个行业的备选项目，比如云南鲁布格水电站、淡水养鱼、先进铁路信号设备、甘肃黄土高原贫困农村地区发展、黑龙江国有农场和海南橡胶种植等项目。短短几年后，世行贷款规模就达到了10亿美元。

在经济和部门分析研究工作方面，在1983年时任世行行长克劳森访华期间，邓小平和赵紫阳向他提出世行研究撰写第二份经济报告的建议，这一次是探讨中国可能遵循的经济增长路径和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的可行性。这成为了一项大工程，由林重庚牵头，涵盖多个部门、外贸、人口、就业和社会问题，包括收入差距问题。这份报告由世行与中方资深团队共同完成，1985年呈交给政府，成为推动改革讨论的一份关键文件，包括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参与的巴山轮会议（林重庚的文章对此有详细介绍）。

到1985年，双方关系不断深化，呈现出多元化格局，贷款规模巨大，全面开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在北京设立代表处，由林重庚担任首席代表，这一举动受到中国政府的热烈欢迎。

40年后，当我回顾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又是怎么历经数十年发展成为世行有史以来最卓有成效的伙伴关系和国别计划的，我认为有几个突出的成功要素：

双方从一开始对于加强合作的兴趣基本一致，邓小平最初表示的欢迎和支持，与麦克纳马拉果断的领导力、中方的开放态度、吸收和执行能力、世行的响应质量和速度形成完美匹配。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双方大型工作团队之间建立和共同拥有的高度信任与友谊。



1985年7月1日，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成立，图为世行驻华代表处首批外籍员工合影，右起第三人为世行首任驻华首席代表林重庆。

从计划到市场：伙伴关系初期的合作经济研究

林重庚⁶

如凯奥·科赫-韦泽的文章所述，在1980年4月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访华与邓小平会见后，中国与世行的伙伴关系迅速发展，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关系，涵盖了发展投资的方方面面，从技术准备、可行性分析和融资，到人员培训和引进国际竞争性招标采购等国际做法。此外，中国和世行从一开始就开展了合作经济研究。本文将侧重介绍经济研究工作，因为这是我在合作初期先任世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后任世行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时的主要职责，我与世行中国团队的主要经济学家伍德（Adrian Wood）共同担此重任。

20世纪80年代世行的中国经济研究工作有三个主要特点：

- 主要研究活动都是应中方提出的支持和咨询要求开展的。当然也有支持世行贷款业务所需要的研究，比如第一份经济研究报告就是世行启动对一个国家的贷款和确定该国获得国际开发协会软贷款资格所必需的。很多具体行业部门研究也是为了支持在这些部门的贷款项目而开展的。然而，从建立伙伴关系之初，中国领导人就把世行看成是引进国外知识和经验的一个主要来源，因此大部分经济研究工作的设计初衷都是为了回答他们提出的具体政策问题。
- 中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充分参与这些经济研究。这一传统始于准备第一份经济研究报告的需要。经过数十年的闭关锁国之后，让一个外国专家团队到全国各地调研中国经济形势的想法，对于负责接待并与世行团队一起工作的中国政府官员听起来令人生畏。为了在中国政府官员和世行团队之间建立信任，我们同意中方指定一个对等的团队和我们一起工作。中方的对等人员参加每一场会，获得给我们提供的所有数据和信息，阅读我们撰写的每一份报告草稿，并且尽可能实质性地参与。结果证明这种与对方团队一起工作的方法非常成功，对双方都大有裨益。大多数中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都很欢迎与国际专家团队一起工作的机会。例如，一位自愿参与第一个世行经济考察团工作的中方经济学家就是朱镕基，他后来于1998年至2003年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⁷
- 为了响应中方关切的领域，世行利用外部专家作为内部人才资源的补充。当时世行可以声称拥有远超任何其他机构的发展专业人才，但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探索和创新时期，中方感兴趣的很多领域超出了世行员工的经验范畴，比如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启示、如何管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世行通过从世界各国招募专家，包括从当时并非积极的世行成员国的国家聘请专家来满足中方的要求。世行真正发挥出一个全球性“知识银行”的作用，能够超越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获取智力资源。

⁶ 林重庚（Edwin Lim），1980年至1985年任世行中国事务首席经济学家，1985年至1990年任世行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之后曾任世行西非局局长、印度局局长等职，1994年至1996年，从世行请假，领导组建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国首家国际投资银行），任首任总裁。

⁷ 如杨英明、杜大伟和罗兰德的文章所述，这种联合研究方式多年后仍然是双方知识伙伴关系的一个特点，这似乎是持续了40年之久的一项成功经验。

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简称莫干山会议（1982年7月）

这些特点从下述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三项重大经济活动中充分体现出来：

在中国改革进程初期，前苏联和东欧经济体在意识形态导向以及中央计划体制方面与中国相仿。因此，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始于学习苏东国家及其改革经验是很自然的。这项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特别是经济所牵头，经济所很多主要经济学家都曾在苏联进修。在世行第一份经济考察报告发布后不久，时任经济所副所长刘国光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提议请世行出面邀请一些既懂改革理论又有实际改革经验的东欧经济学家来华，组织一次苏东经济改革座谈会。根据这一提议，我们于 1982 年 7 月组织了莫干山会议，会议在浙江省莫干山的一处避暑山庄举行。

我们为会议召集的东欧专家组由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łodzimierz Brus）带队，布鲁斯曾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与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和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ł Kalecki）一起试图在波兰引进市场社会主义。1979 年 12 月布鲁斯曾在中国做系列讲座，对中国的经济思想已产生了影响。参会的东欧专家组还包括波兰国家物价委员会前主任朱利乌斯·斯特鲁明斯基（Julius Struminsky）、捷克斯洛伐克前副总理奥塔·锡克的工作搭档吉利·考斯塔（Jiri Kosta）和匈牙利改革经济学家彼得·肯德（Peter Kende），我们还邀请了苏东经济改革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戴维·格兰尼克（David Granick）。

中方参会人员由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薛暮桥、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顾问廖季立和国家物价总局局长刘卓甫带队。从会后他们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莫干山会议上开展的讨论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莫干山会议于 1982 年 7 月 11 日至 16 日召开。参会代表合影，前排左起：肯德、斯特鲁明斯基、伍德（斯特鲁明斯基身后）、廖季立、林重庚、布鲁斯、考斯塔、刘卓甫、格兰尼克。

首先，东欧改革经济学家们介绍了将现代经济学用于分析苏联计划体制面临的问题，他们向中国同行说明中央计划体制功能紊乱的特点是制度性的。中国决策者和经济学家认识到，他们原以为很多经济问题是由于政策失误造成的，实际上却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弊病，只能通过根本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克服。

第二，对东欧改革经验的深入了解使得中方经济学家对在中国采用东欧经济改革模式的可行性变得更加悲观，他们对当时东欧和苏联考虑的主要改革方案，特别是引进高科技、比如使用高速计算机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可行性表示怀疑是合理的。事实上，东欧经济学家一旦开始了解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他们自己也得出结论认为东欧的改革经验对中国没有相关性。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包括消费必需品的严格配给制、非常有限的劳动力流动和国家对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严格控制，都是“指令性经济”的一个极端形式。即使是在市场机制更发达、企业和家庭自主权更大、信息管理系统更成熟的东欧，所有的改革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中国从东欧身上还有什么可学的，改革只能另辟蹊径。

在莫干山会议上，我们讨论了不同的改革选择，是所有部门一次性（一揽子的方式）改革，还是通过分步走的方式。所有参会的东欧专家最初都建议采取一揽子的方式。会后，东欧专家考察了多个中国城市，考察后他们传回来的信息是他们改变了想法。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比如巨大的地区差异，仍然是一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承受不起犯错误的代价，他们建议采取审慎的分步走的方式。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改革首先需要放在具有明确改革目标的总体规划内，然后分步实施。所以，最后，东欧专家、世行的伍德和我本人以及参会的中方经济学家围绕中国需要采取渐进式改革的问题达成了共识。

从总体来看，尽管有东欧改革的失败先例，但莫干山会议的所有参会人员都对中国的改革前景感到鼓舞，原因是农村改革已经取得了成功，为整体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这是东欧国家在其自身改革尝试中从未经历过的。由于农村改革的成功，尽管可以预见到城市改革面临的困难，但我们相信中国的改革进程不可逆转。

因此，到8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思想和实际改革进程已不再考虑对中央计划体制进行改革，而是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必要性问题上趋向一致。

第二份世行经济考察报告：长期发展问题与选择（1984至1985年）

正如凯奥·科赫-韦泽的文章所述，世行的第一份中国经济考察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申请世行贷款所要求的，于1981年完成。而第二份报告《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与选择》则是应中国领导人的特别要求而做的，探讨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以及经济快速增长的挑战。

1983年5月26日，邓小平和赵紫阳总理会见了由A·W·克劳森（A. W. Clausen，于1981年麦克纳马拉退休后继任行长）率领的世行代表团。中国领导人向代表团介绍了他们对中国发展及其长期目标的看法，中国刚刚通过从

1980年到20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发展规划，他们发现世行的第一份经济报告很有意思，很有用，所以提议世行可以再做一份报告，研究中国在未来20年可能面临的一些主要发展问题，特别是根据国际经验为中国实现自身发展目标提供一些不同的选择方案，并就实现这个目标的可行性进行一些研究。

这样，世行在1984年启动了第二个重大经济研究项目。研究团队两次访华，时间长达九周，行程和第一次相似，考察了甘肃、湖北、江苏、北京和上海等地。1985年2月，主报告草稿、包括六个附件（教育、农业、能源、经济模型与预测、国际视角的中国经济结构、交通）被呈递给中国政府征求意见。伍德和我作为报告主笔在3月再次访问北京，与中方研究团队讨论报告草稿，会见中央和财政部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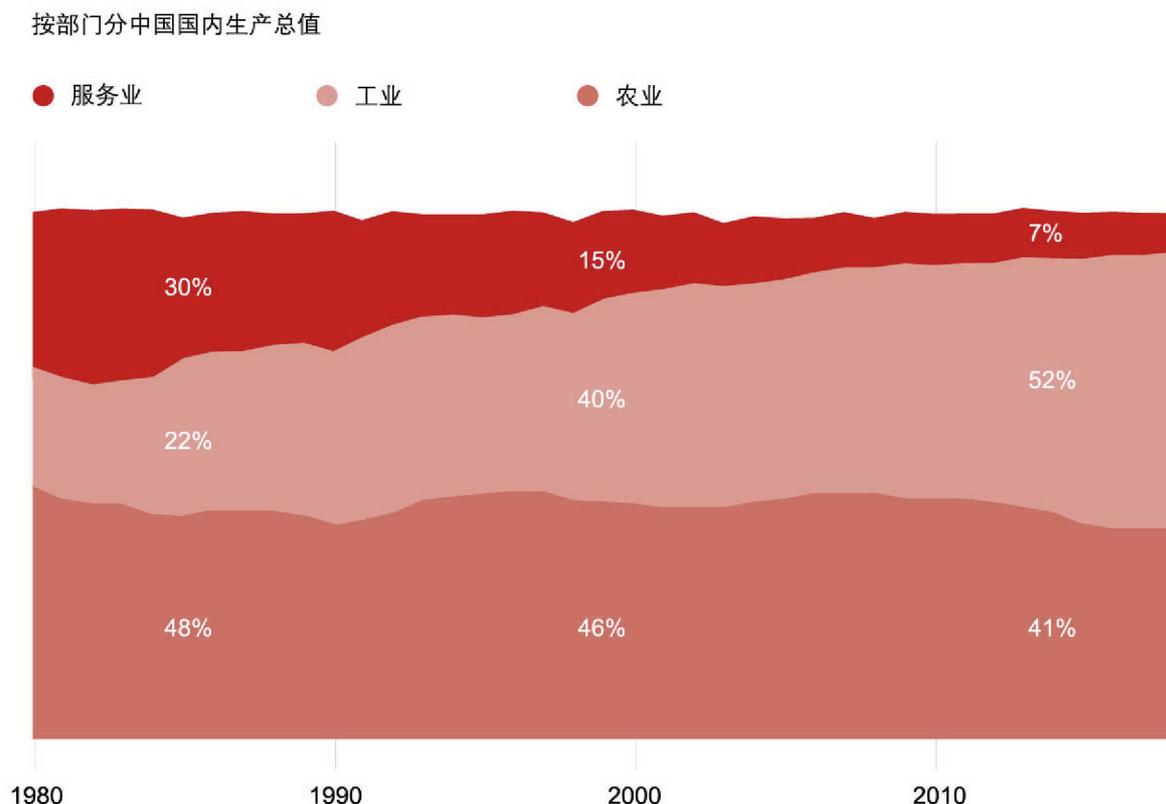
1985年的报告以《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与选择》为标题，比1981年的第一份报告更为雄心勃勃。报告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一个多部门模型，尝试预测中国可能的经济增长路径，认可未来经济快速增长和在20年时间里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可能性。但报告也提出了可供选择的替代发展路径，尤其强调指出以更重视服务业和更有效利用资源为基础的发展路径能够实现更好的经济平衡，同时仍然能实现以快速工业化为基础的发展路径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报告还对农业、能源、技术、交通、工业布局、内外贸易、人口、教育和就业等领域新出现问题，以及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住房和社会服务等的社会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



1984年，世行启动在中国的第二个重大经济研究项目，图为双方专家合影。

- 8 正如该报告的概要和结论所述，该研究的目的是：“近年来，在中国国内以及国外，辩论围绕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展开：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很好地服务了中国人民？以下要素各自起了什么作用：1. 政府控制之外的要素；2. 奉行的政策；3. 经济管理体制本身。”世行的第一份中国经济报告主要是试图根据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解答这些问题，并探讨对未来政策的根本意义。

图1 中国从农业到工业和服务业的经济转型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http://wdi.worldbank.org/table/4.2>。

1985年的世行报告对中国的经济分析现状产生了重大影响。报告展示了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科学和客观地进行经济分析的可能性。报告中的分析基于逻辑理论、统计数据实证及国际经验教训，目的不是界定或改变中国的目标，而是单纯地就如何以更快速度、更低成本实现这些经济发展目标提出建议，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当时国内外很多人都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这份报告在从事计划制定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中广泛散发，对当时正在编制的第七个五年计划产生了重要影响⁹。令人遗憾的是，对加快服务业和消费增长、减少工业和投资依赖的替代经济增长路径从未进行充分的讨论，或者就我所知，没有被中国政府决策者给予考虑。事实上，这个问题以及报告中讨论的许多其他问题，即使在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仍没有得到解决。

巴山轮会议 (1985年9月)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下决心打破中央计划体制的限制，但对于市场经济在中国如何发挥作用仍然了解甚少，特别是有些人担心市场经济会带来盲目竞争和经济增长方向缺失，不可避免会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在快速增长后出现严重衰退。中国领导人的这些担心导致了1985年9月的巴山轮会议。

⁹ 很多经济学家都承认这一点。2018年，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的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刊中，重新刊载了1985年世行报告的概要和结论，伍德撰写了回顾引言。在2018年11月18日财新峰会由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主持的“温故知新：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年”圆桌会上，伍德概要介绍了1985年报告，与会者进行了讨论。

1985年初，在我和时任国家体改委委员廖季立的会见中，他告诉我兼任体改委主任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提议世行和体改委共同组织一次国际研讨会，讨论以下问题：

- 如何管理市场经济；
- 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有关问题；
- 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国际经验。

这次国际研讨会于1985年9月召开。世行负责邀请与会国际专家，8月底在北京集结，8月31日和部分中方与会人员一起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接见。然后与会人员飞往重庆，研讨会在一艘名为“巴山轮”的游轮上举行，与会人员9月2日上船，9月9日会议结束，在武汉下船。所以，这次会议的正式名称是“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简称“巴山轮会议”。

我们很幸运能够邀请到三位拥有市场经济管理的丰富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国际专家：吉姆·托宾（Jim Tobin，美国），他几年前因论证金融市场及其与消费和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和物价的关系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阿莱克·凯恩克劳斯爵士（Sir Alec Cairncross，英国），杰出的政府官员、国际公务员和经济政策领域的著名学者；奥特玛·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德



巴山轮会议于1985年9月2日至7日召开，全体与会代表合影。

国),著名国际经济学家,专门研究货币政策,曾任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多年,德国央行是发达国家中独立性最强的中央银行。此外,凯恩克劳斯和埃明格罗曾分别主管英德两国二战后取消物价管制和开放市场的工作,拥有在物资短缺情况下采取反通胀措施和取消物价管制的直接经验。

其他国际与会专家还有米歇尔·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法国),前法国国家计划办公室主任;亚历山大·巴伊特(Alexander Baijt,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稳定委员会和政府经济改革委员会委员;勒罗伊·琼斯(Leroy Jones,美国),经济学家,专门研究韩国经济,曾在韩国计划部工作(由于政治原因我们不能邀请韩国专家出席会议)。我们还邀请了W·布鲁斯(W. Brus,波兰)和雅诺什·科尔奈(J. Kornai,匈牙利),主要介绍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有关问题。

中方与会人员包括来自政府部门参与政策制定的经济学家以及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研讨会的目的不仅仅是邀请国际专家讲课,也是提供一个机会让中外与会人员进行深入交流。之所以不寻常地选择一艘游船作为会议地点,原因是为中外与会人员不间断地开展讨论提供机会。会议期间,我们既有全体会和小组讨论,也有持续到深夜的私下对话。

在船上开会的最大局限是空间极为有限,因此中方参会人员的人数很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致同意中方参会人员应代表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机构,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策,中方代表团不仅包括一些中国最资深、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也包括一些青年参会人员,他们在此后数十年的改革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方代表团的组成是老中青三结合,老年参会人员有安志文、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和童大林;中年参会人员有高尚全、吴敬琏、项怀诚和赵人伟;青年参会人员有郭树清和楼继伟。

很多中方与会者都曾撰文谈论对这次会议的印象及其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意义。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成就是对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如何从20年代至30年代的自由放任政策转向80年代的总需求管理和宏观经济的积极应对政策加深了理解。大部分讨论围绕着通过综合采用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管理总需求、从而以间接方式管理市场经济的议题展开。如今,巴山轮会议被广泛看作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上的一次关键性事件,是标志着中国对自身管理市场经济的能力增强信心的一个里程碑。

世行在中国开展活动的初期,正值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这并不是巧合。与世行的伙伴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经济工作来说尤其如此,经济工作反映出中国经济思想的快速进步,在短短几年内思考的问题就从苏联计划体制的有关问题转向建立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和为经济快速增长创造条件的先决条件。这些活动都是需求推动的,是合作开展的,利用了世行内部及外部的知识和经验。

维持长久的伙伴关系 1987—1994 年

贾维德·伯基¹⁰

我第一次访华是在 1965 年夏，那次我发现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我当时是巴基斯坦政府派遣的一个三人小组成员，应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1965 年夏到中国考察人民公社制度。西方报纸对中国人民公社制度的报道非常负面，使中国领导人感到不安。中国人并没有建立像苏联那样的巨型国有农场，而是给农户留下五分之一的土地作为自留地，农户可以耕种但没有所有权。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举动损害了大地主的利益，但帮助了贫苦农民，使他们成为小块土地的主人。

我们考察了 13 个人民公社，带回了大量数据资料。我们发现并在考察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自留地的生产率明显高于公社集体管理的土地。中国政府对这个结论很不满意。直到毛泽东去世、邓小平成为最高领袖后，这个结论才得到接受。两年后，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把我收集的数据拿给德怀特·波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看，他说服我写一本书阐述我们的考察成果¹¹。

我在哈佛读书期间认识了教数理经济学的萨勃拉曼尼亚·斯瓦米（Subramaniam Swamy）教授并成为好朋友。我们利用中国农业部提供的数据，合作撰写了一篇文章，估算了中国 1958 年至 1965 年的粮食产量¹²。中国在 1958 年大跃进失败后停止对外公布粮食产量数据，大跃进期间中国对外宣布粮食产量创纪录，实际上却发生了严重粮食短缺，出现大饥荒和饿死人的现象。这些例子表明，我很早就从事对中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用证据说明改革的必要性，远早于我到世界银行工作之前。

从那时以来，我去了中国不下 40 次，考察过全国几乎所有的省份，西藏是我任世行中国局局长期间唯一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亲眼目睹了从那时以来中国的发展，并以不同身份参与了这一发展进程，最重要一段是在我任世行中国局局长期间，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记忆，很高兴有机会在这篇短文中分享一些高光时刻。

¹⁰ 贾维德·伯基（Javed Burki），1987 年至 1994 年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1994 年任世行拉丁美洲地区副行长，与中国的关系回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曾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研究农业生产问题。

¹¹ 《中国人民公社研究》，沙希德·贾维德·伯基著，哈佛大学出版社，1969 年出版。

¹² 《1958 年至 1965 年中国粮食产量》，萨勃拉曼尼亚·斯瓦米和沙希德·贾维德·伯基合著，发表于《中国季报》第 41 期，1970 年 1—3 月。

扩大关系：1987年成立世行中国局

在我接手中国业务的时候，中国只是世行负责整个东亚地区的大部门中的一个处。后来，由于1987年世行进行大规模改组，成立了单独的国别局。那时有三个这样单独的国别局：巴西局、中国局和印度局，体现出世行贷款计划在这三个国家的重要性。我被任命为中国局局长，于1987年7月1日上任，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七年半，我认为我仍是任期最长的世行中国局局长¹³。有一次，世行行长问我是否愿意晋升副行长。“但是，”他说，“我听说你不愿意离开中国，你希望20年后从中国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休。”所以，可想而知我与中国的渊源有多么深厚。

林重庚和我共事非常融洽，我们共同负责一系列工作。令人惊讶的是，中方非常愿意接受我们在各种问题上的建议。在我上任中国局局长后第一次访华期间，我和林重庚见到了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朱镕基市长对我说他们想要开发浦东，希望世行为浦东新区开发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贷款。那时，浦东基本上是一无所有，只有几间渔民的住房。朱镕基邀请我同他一起坐到地上，观看一张浦东的地图。我也有一张浦东的地图，于是我们一起坐在地上对着地图，讨论我们想要做些什么。世行的技术人员对世行深度参与帮助浦东开发很不以为然，他们怀疑在不耗费中国政府 and 世行本可用作它途的大量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开发浦东的宏伟目标还能否实现。我和林重庚决定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世行参与的要求。

但也有一些时候，技术人员的意见很有价值，得到中方的赞赏。一个例子是我们对参与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的处理方式。我接任中国局局长后，也成为三人委员会的负责人，负责审核这个大型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该委员会的另外两位成员包括一位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官员和一位加拿大对外援助机构的官员。在三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中方详细介绍了他们为该项目编制的可研报告，我们的技术专家表示需要更多时间来对报告给予反馈。于是我们安排了第二次会议，这次是应加方邀请在蒙特利尔举行。考虑到这个项目需要的大量工程建设和加方在这个领域的经验，加方很有兴趣赢得这个巨型工程的一些咨询合同。在我去蒙特利尔之前，世行的技术人员向我建议，只有在中方对项目造成的110万移民拿出切实可行的安置方案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对可研报告表示赞同。我在蒙特利尔的会议上表明了这一点，令我惊讶的是居然得到了中方委员的赞同。他说，世行的立场将会为那些也要求可研报告包含移民安置计划的中方人士助一臂之力。中方要求我们把对项目的反馈延迟六个月，以便他们编制移民安置方案。中方还告诉我，他们清楚这个项目有争议，所以不打算申请世行贷款。虽然我们最终没有为三峡大坝建设提供资金，但中方拿

¹³ 黄育川也担任世行中国局局长七年，从1997年至2004年。

出了世行可以接受的移民安置方案。

我们在浦东开发中的参与，是我与朱镕基关系的开端，我同他建立了深入的关系。在朱镕基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并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改革的主要推手时，这种关系变得非常重要。我与朱镕基的关系一直延续到我离开世行之后。在朱镕基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我曾短暂担任巴基斯坦财政部长，那时我们急需资金援助，朱镕基总理非常帮忙，很快就安排好了中国的援助。

1996 年 12 月初，我应朱镕基总理邀请从伊斯兰堡飞到北京，在两天之内和他见了两次面。第二次是在钓鱼台国宾馆的晚宴上，他表示了解到巴基斯坦遇到了财政困难，问我他能否帮上什么忙，我回答说我需要往我国准备金里快速注入一笔资金。在第二次见面时，他说他已经同江泽民主席讨论了巴基斯坦的财政形势。江泽民主席在担任上海市市长时我也认识。他说，“我们决定往纽约储备银行的巴基斯坦账户里放 5 亿美元。如果你手头有银行账号，这笔钱吃完饭就能汇过去。”他的话让我松了一口气，我随身带着银行账号，马上交给了他，他转身交给了一名助理。他所说的那笔钱当晚就到了我们的账户里，中国的帮助使我们避免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优先债权人”的债务拖欠。

我在为中国局招聘管理人员时，专门寻找那些具有在世界较贫困国家工作经验的人选。我说服研究印度的土耳其裔经济学家扎弗·埃杰维特（Zafer Ecevit）到中国局担任处长，负责开发社会部门的项目和扶贫领域的分析研究，他欣然同意加盟，并着手研究中国需要解决的一些难点问题。扎弗和他的团队通过认真搜集证据作为依据，甚至在一些敏感领域都取得了进展。例如，为了说服中国在火车、公交车和机场等公共场所限制吸烟，扎弗的手下精心研究，对吸烟的健康影响以及吸烟对肺部的危害造成的经济成本进行了估算，他们向有关部门提交的证据成功地说服了他们在这些公共场所实行禁烟。

六四事件

1989 年晚春，我正在华中地区考察，我的妻子来电话告诉我，美国电视新闻频道报道说，北京天安门广场聚集了大量人群，要求对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进行重大改革。游行队伍由学生领头，他们要求制度更加包容，结束一党专政。我向当时所在城市的接待人员求证，但他们说对我妻子所说的情况一无所知。但是，我决定提前结束行程，经由夏威夷返回华盛顿。在檀香山转机时，我接到时任世行行长巴伯·科纳布尔（Barber Conable）的电话，他问我是否知道中国政府动用武力驱散了天安门广场聚集的抗议者，他要我迅速赶回华盛顿，应对不断发展的形势。

我一回到华盛顿，马上拟定了三条标准作为指导未来世行与中国关系以及贷款计划的原则：一是中国具有申请世行贷款的信用；二是中国积极回应我们的政策建议；三是我们的贷款项目实施达到满意标准。与此同时，七国集团认为应该暂停对中国的所有多边贷款，并向科纳布尔行长表达了这个要求。科纳布尔在和我进一步讨论后，将我的三条标准转告了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布什总统要求我立即前往中国确认这些条件是否得到了满足。1989年6月7日，也就是六四事件发生三天后，我启程前往中国。因为那时中美之间没有直达航班，我在东京转机，然后乘坐几乎空无一人的飞机抵达北京。我和林重庚一起仔细审核了我们即有的贷款项目，同对口部门交流，包括同朱镕基和他在上海的工作班子交流，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三条标准都得到了满足。

恢复世行对华贷款

当时我们有七个项目在等候世行执董会审批，根据我们的判断，如果七国集团的代表投反对票，那么这些项目提交执董会后就有可能出现被否决的结果。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是世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员工提交的项目遭到执董会否决。我说服中国政府致函世行执董会，申请延迟这七个项目的审批。经过些许犹豫后，中方同意给予配合，并请我代为起草给世行执董会的申请函，这样做给我们赢得了一些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着手寻找一个七国集团的执董们不可能反对的项目。几个月后，我听说华北地区发生了地震，造成了相当广泛的破坏，于是派我的项目



河北地震恢复项目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恢复了震毁的居民住房、医院、学校、工厂和水利设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顾问达乌德·艾哈迈德（Daud Ahmad）赶赴中国准备一个地震救援项目。他完成项目准备后，我们提交给执董会，项目获得批准。不久后，我们提交了那七个待批项目，也获得了世行执董会的批准。

90年代初深化改革

保持通往中国之桥畅通的决定是正确的决定。在1992年初邓小平著名的南巡之后，改革势头不断增强，世行处于为中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的重要位置。

我想从三个方面说明世行提供改革建议的范围。第一个方面是住房制度改革。中国政府对于放弃住房管控犹豫不决，那时住房完全归国家所有，通过工作单位分配给住户。我们说服中国政府，如果希望真正让私营部门成为经济体制的重要参与方，就必须实行住房私有化。经过很长时间的犹豫和世行方面做了大量分析调研后，政府决定采纳我们的建议在山东青岛开展住房制度改革试点。青岛实际上是中国的啤酒发源地，我记得连早餐都有不少本地啤酒。但更重要的是，青岛的住房改革试点为中国住房存量的私有化打下了基础，到90年代后期住房私有化已基本完成。这是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一个关键因素，从而也为同时进行的国有企业结构重组奠定了基础，大量国企下岗工人被快速发展的私营企业所吸收。与此相关，世行也深入参与了乡镇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有些改制后的乡镇企业甚至吸引到了外资，一部分乡镇企业中后来发展成为大型工业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推动力量。

我们的另一个项目是农业部门改革。正如我60年代中期初次访华时得出的分析结果，中国把土地所有权交给人民公社后，农业生产率实际上是滞后了。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中国开展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中国要求世行就如何维持农村收入增加和生计改善提出建议，从而开启了围绕农村综合发展的讨论。农村综合发展就是将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同投资农产品加工厂、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相结合。本书收录的张文才（张那时在财政部世行司任职）的文章对此有详细论述，时至今日这种方式对中国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仍有现实意义。

14 本书中鲍泰利的文章介绍了世行驻华代表处通过本地员工招聘参与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试点，说明这也与住房改革密切相关，所以世行不仅仅是顾问，有时也是设计改革试点的重要参与者，在这个例子里本身也成为试点。

我想简要介绍的第三个方面是货币和金融体制改革。鲍泰利和尼克·霍普（后者在我之后接任中国局局长）的文章对此有更详细的介绍，但我想提一下1993年的大连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国金融部门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那时，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改革，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货币控制权重新集中起来，把中国人民银行变成名副其实的中央银行（那时人行是作为商业银行运营的）。我邀请了几位经验丰富的央行行长参加大连会议，根据讨论结果我们写了一个建议，是我手写的，约有六七页纸，列出了很多想法。之后，我们面见朱镕基副总理，把这些建议呈送给他，他照单全收。那是一次奇妙的经历，说明了世行在中国宏观经济改革紧要关头发挥的重要作用，也说明了朱镕基与世行团队之间建立的高度信任十分重要。

“世行最重要的贡献是国际竞争性招标”

我刚上任时，世行对华贷款总额每年约11亿美元，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国际开发协会信贷（俗称“软贷款”）。到我离任时，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俗称“硬贷款”）和国际开发协会软贷款总额达到30亿美元左右，软贷款的比重基本没变。正如麦克纳马拉行长在初次访华时所作的准确预测（参见凯奥·科赫-韦泽的文章），中国已成为世行最大的借款国。七年后，中国从国际开发协会毕业，又过了七年，中国成为国际开发协会的捐款国，但世行贷款规模从来不是我们关系中最重要方面。最后，我想用一件趣事作为本文的结尾，我在告别访华之行中，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接见，李鹏对我说：“你看，伯基，你为中国做了很多事，但有一件事我要对你说，世行最大的贡献是给我们引进了国际竞争性招标。”

所以，那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年寿命，但我在中国的岁月终生难忘。中方对于我们的做法非常乐于接受，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使得我们的伙伴关系成为令人无法忘怀的经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世界银行 驻华代表处工作的日子

鲍泰利¹⁵

我于 1993 年至 1997 年担任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本文着重介绍我曾经合作过的一些主要中国同行、1993 年大连会议的重要意义以及世行驻华代表处对外国机构在华聘用本地员工制度改革的贡献。

我于 1970 年进入世行工作，在我从事过的所有工作中，“中国”工作是最感兴趣，最有成就感的，也是要求最高的，那是一种改变人生的经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政府机构里我的同行们的高素质，是中国的“经济沙皇”朱镕基领导下的经济改革势头，朱镕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本世纪头十年先后担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1991—1998 年）和总理（1998—2003 年）。我的中方合作伙伴都十分坦诚，对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充满好奇，他们很好地利用了世行，世行也很好满足了中方的需求。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双方逐渐形成了真正的伙伴关系。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世行对华贷款计划在世行是规模最大的，也是最成功的。在 90 年代中期，每年新增贷款承诺额超过 30 亿美元，同时有上百个世行贷款项目在实施中，还有几十个新项目在准备中，每个工作日的平均支付额达到近千万美元，世行贷款项目几乎遍布中国全国各地。中国政府非常认真地对待世行，对吸收世行经济分析和意见的热情毫不亚于努力确保世行贷款项目顺利实施的热情。为保证项目实施，中方聘用了数千名公务员（大部分由地方政府聘用）。同样，世行的中国分析研究计划（研究、会议、研讨会等）也是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多样。

我的夫人格蕾丝是一位职业钢琴家，在宋庆龄基金会协助下应邀到中国各地演出，这使我们有机会结识了很多平常见不到的有趣人物。此外，格蕾丝和我常常在家中宴请中国政府官员，晚宴结束后她通常会弹奏一曲。时任中国财政部世行司副司长、现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的金立群是常客，他热爱古典钢琴曲，能够准确地说出格蕾丝弹奏的乐曲名称。

世行驻华代表处原本设在北京西郊风景秀丽的钓鱼台国宾馆 5 号楼。随着世行在华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世行代表处的员工人数从 1993 年初只有 25 人，到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8 月份我离任时，已增加到 65 人。在同一时间段里，1985 年启动对华业务的国际金融公司在北京开设了单独的办事处。

世行在中国政府的对口部门是财政部，财政部为此专门设立了世界银行司。在我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时任世行司副司长金立群是我的主要对口联系人。我在中国享受大使级待遇，比较容易接触到高层政府官员，对这项特权我谨慎对待绝不滥用。虽然世行贷款在中国的投资总额中只是沧海一粟，但按照世行的标准衡量对华贷款计划是一项规模宏大的业务。

15 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1993 年至 1997 年任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在世行工作 28 年期间，历任多个职位，如拉丁美洲和北非地区局长、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任亚洲副行长高级顾问等职，从世行退休后的近 20 年时间里，在美国各大学讲授中国经济与改革课程。

与主要同行建立关系

如上所述，在我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在中国政府的主要对口联系人是时任财政部世行司副司长**金立群**。我们初次见面是在美国华盛顿，那时我正准备去中国赴任，而他是世行执行董事会的中国副执董。后来，金立群先后担任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常驻马尼拉）、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人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财政部副部长等职，从2016年以来担任总部设在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任行长。从对中国发展与改革的贡献来说，中国政府官员中很有人能超过金立群。

在我接触过的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中，我在此只想提几位。最重要的是**吴敬琏**教授（他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最资深、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目前已年逾90，仍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联系。吴敬琏教授是朱镕基的主要顾问之一，也是许多青年经济学家的老师和导师，并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书籍和文章。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作为孙冶方任所长的著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一直从事发展问题研究。

另一位对中国经济改革和与世行合作都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是**吴晓灵**。我初识她时，她是中国人民银行副司长，后来担任过很有影响力的人行副行长和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我初次见到**周小川**时，他是中国银行副行长，也曾任中国证监会主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2018年从人行行长职位上退休，由人行第一副行长**易纲**接任。在我接触过的所有中国经济学家里，周小川可能是最重要的务实改革派，特别是在银行和金融界。1993年，在大连会议前后，那时他是中国银行副行长，他和吴敬琏合作撰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成为20世纪90年代多项中国经济改革举措的蓝图。

我接触过的中国经济学家几乎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朱镕基有关系，包括前面提到的吴敬琏和周小川，以及**王岐山**、**樊纲**、**楼继伟**、**郭树清**、**高尚全**、**李剑阁**、**陈锡文**、**卢迈**、**谢平**、**林毅夫**和**刘鹤**。现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经济顾问刘鹤在我们初次见面时是国家计委产业政策司司长，国家计委在2003年改组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我认识林毅夫是在1994年，那时他刚成立了得到世行支持的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他后来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卢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学家，后来任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锡文曾是中国农村发展的首席专家。

楼继伟和郭树清是两位训练有素的国际经济学家和坚定的改革派，他们的职业生涯很相似。郭树清在楼继伟之后接任国家体改委宏观经济司司长。国家体改委是赵紫阳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的，目的是帮助指导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郭树清也是在楼继伟之后接任贵州省副省长。楼继伟后来曾任中国的主

权财富基金董事长、财政部长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郭树清曾任世界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中国建设银行的董事长、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山东省省长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我认识谢平时，他在人行金融局任处长，后来出任人行金融稳定局局长，金融稳定局是在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新成立的。李剑阁是我接触过的唯一一位不会说英语的重要政府经济学家。樊纲不在政府部门工作，而是一家民间经济研究机构的负责人。

高尚全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体改委后深度参与了经济政策制定。1995年，他成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组织了很多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国际会议。1998年，他曾作为访问学者到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世行总部做研究。体改委2003年被撤销，并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我和王岐山只有一面之交，那是在1993年他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时候，我和他讨论搞一个世行贷款项目帮助建行改革的可能性，王岐山婉拒了我们的提议，理由是他认为世行贷款的费用太高。王岐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主要改革派经济学家之一，在90年代是朱镕基工作班子的成员，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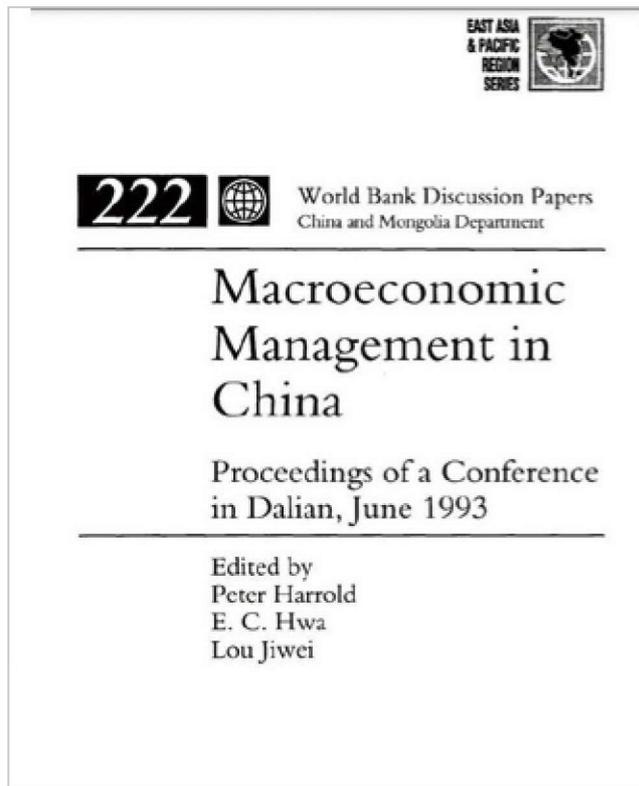
与多位著名中国经济学家的接触，使我们得以聆听了很多真知灼见，也有助于建立信任和友谊，为后来数十年世行及其给中国最高领导人提出建议打开了很多扇门。

1993年大连会议及其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同1985年著名的巴山轮会议以及其他许多国际会议一样，大连会议的核心内容是宏观经济管理，由世界银行和国家体改委共同举办。大连会议是在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于1993年6月在通胀严重的情况下举行的。要理解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就有必要了解在当时造成高通胀的因素。

在1989年6月发生六四事件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急剧放慢。虽然政府继续做出重要改革决策，比如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成立浦东新区等，但改革势头受到一定影响。在政府内部，围绕国家经济优先重点问题出现了严重分歧。改革派希望继续推进改革，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改革已经走过头了。

1991年经济开始恢复，在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之后，投资出现爆炸性增长。邓小平南巡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后者做出积极响应，他们往往利用地方分行批准的银行贷款进行投资，当时地方分行基本上是在地方政府官员的把控之下。投资热导致货币供应快速扩张，通货膨胀接踵而至，1993年通胀率达到20%。



凭经验深知高通胀不利于稳定和经济增长，中国政府领导人很担心，急于给经济“过热”降温，但在采取什么措施问题上看法不一。中方基本上分成两派，一派主要是在俄国受训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他们认为通胀是表示物资供应不足，说明需要增加物资供应，因此就要增加投资。另一派主要是在西方留学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说明需要放慢投资和货币扩张速度。在这场辩论发生的时候，投资在邓小平南巡后已达到极高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达 14%。

June 1993. Dalian Conference on Economic Re-Centraliz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图 2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增长率起伏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与增长率



来源：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大连会议汇集了一批中国主要的改革派经济学家、外国学者和世行人员，针对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挑战以及克服结构性问题两方面的措施展开讨论。中方与会者提交的论文涉及到金融部门改革、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作用、国有资产管理等议题，外方与会者准备了对这些论文的意见。会议在结束时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建议，提交给中国政府领导人参考。这些建议的核心是需要对货币供应和财政政策实行集中控制。从本质上看，认为通胀是货币现象的一派占了上风。

在大连会议之后，朱镕基实行了一系列旨在放慢投资速度和控制货币供应的措施。朱镕基在7月推出了加强宏观调控16条措施（包括收回银行体系调控权的痛苦政治决策），为1994年的重大财政、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调控做准备，包括统一汇率和取消外汇券（外汇券是20世纪50年代推出的一种针对外国人的特殊货币）。中国经济逐步成功实现了“软着陆”（1996年通胀率已降到不构成威胁的程度），大连会议引发的许多项改革举措虽然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调整，但基本上仍在实行。

外国机构在华聘用本地员工制度改革

世行驻华代表处中国本地员工的素质和敬业精神令我印象深刻，但我惊讶地发现，世行代表处的本地员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世行员工，专业人员（农业专家、高速公路工程师等）是由政府部门借调给世行的，而辅助人员（秘书、司机、清洁工等）是由外交人员服务局派遣的。因此，所有本地员工都由政府部门支付工资，世行再通过财政部付款给这些政府部门，同时直接付给员工一些小额现金补贴。我们中国员工的薪酬（数额很少）是我上任后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

到北京上任后不久，我被告知在世行与中国政府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世行驻华代表处将被作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小幅度开放的一个试点。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每当出现职位空缺，我就可以开展中国员工的所谓“直聘”试点，但不允许在当地报纸上刊登招聘广告。所以，一切都必须通过“口头”方式进行。

在过渡到“直聘”制度的过程中，我很快发现中国对雇用和安置本地员工的管理非常严格，留给我进行改革试点的操作空间很小。我被允许悄悄地寻找合适的本地员工人选，但在开始阶段只能通过长期咨询专家合同（最长期限6个月）聘用。对于原有的本地员工给他们提供转成长期咨询专家合同的机会，但世行代表处不能为本地员工提供住房，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公寓，中国那时候也没有城市商业住房市场。此外，世行代表处不是政府“单位”，无权保管中国员工的人事档案。这些限制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单位”通常保管员工

的人事档案，给员工分配国有住房。对新聘用本地员工的住房及其人事档案管理，世行代表处依靠北京市的一家专门机构，这是由财政部代表世行代表处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

由于我们没有针对通过长期咨询专家合同聘用的中国员工的工资级别，我不得不创造一个出来，并把合同金额与候选人资质（包括受教育程度和实际工作经验）挂钩。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在当时北京没有私营劳动力市场可以作为确定工资等级制度的参照。另一个复杂问题是，在文革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大学和高等院校处于停课关闭状态，因此特定年龄段的中国本地专业人员都没有学位证书，很难确定他们的工资等级。这样一来，听起来很简单的中国员工“直聘”就成了一大挑战。不过，我们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成功，世行代表处的“直聘”制度变成了包括各国使馆在内的所有在华外国机构的样板。

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了解到世行代表处在“直聘”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后，他给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大老板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写了一封信，建议加利给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写信，要求给予所有联合国驻华机构同等特权。据说李鹏收到加利秘书长的信后非常吃惊。不久后，我收到财政部的一封信，要求我在3个月内取消这些人事改革措施。

这样一来，我就必须设法让所有已转成长期咨询专家身份的本地员工重新回到原单位，这在有些情况下行得通，另一些些情况下则行不通，有时原单位拒绝合作（也许是因为他们无法给相关人员安排住房），导致问题复杂化，造成了大量负面情绪。

最后，金立群和我私下达成默契，世行代表处无须完全落实取消的指令。从那以后，我们尽可能采用新的直聘方式招聘本地员工。在我离任之后，从1998年开始，大部分专业人员和许多由外交人员服务局派遣的辅助人员都转成了世行直聘员工，享受世行的医疗保险、养老金等福利待遇。我的继任黄育川解决了一个他上任时并未预见到的问题，他成功地说服世行华盛顿总部，在计算世行养老金权益时承认中国本地员工从政府机构借调到世行代表处的工作时间。

在中国实行城市住房私有化（1998—2003年）之后，外国机构在中国面临的住房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从那以后，中国人可以在无需所在单位干预的情况下自主购买或租赁住房，外国人也可以自主选择住处了。

世界银行与中国改革

1994—1997 年

尼古拉斯·霍普¹⁶

我与中国的初次接触是在 1983 年至 1987 年，在此期间我先后担任世界银行外债处处长和世行东亚工业发展金融处处长。我于 1990 年至 1994 年被派驻雅加达领导世行驻印尼代表处，之后被任命为世行中国局局长，工作地点按照当时的惯例是在美国华盛顿。在我正式任命之前，我参加了时任世行中国局局长贾维德·伯基的访华告别之行，此行期间他慷慨地将我引见给他的许多重要联系人。在一次与中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官员的会见中（伯基没参加这次会见），李勇先生（他后来出任财政部副部长）直言不讳地表示，我应该清楚我的工作不是告诉中国怎么管理经济，我对此表示同意，并回答说我的工作是确保世行的钱一分也不借给没有机会成功实现目标的项目，所有与会者似乎都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

回到华盛顿后的头三个月是我世行职业生涯中最紧张的学习阶段。在这三个月里，在学习吸收世行对华业务信息的同时，我尽可能利用业余时间加深对 1993 年 11 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含义的理解。

我上任时恰逢 1994 年世行经济研究报告完成，该报告指出，在前段时间努力促进决策权下放之后，中央政府有必要重新建立对宏观经济总量的控制。此外，世行也在积极努力完成伯基留下的 30 亿美元贷款计划，并为 95 财年及以后准备同等规模的贷款计划。决定贷款计划构成的流程令人印象深刻，双方进行密集的磋商，确保共同商定的项目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发展目标，同时也满足世行支持宏观经济和具体部门政策改革的意愿，对项目的地域分布也给予了认真考虑。

此外，新一轮国际开发协会增资谈判已经开始，有些世行高管赞成让中国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毕业，至少有些人认为这样做有利于推动谈判进程。随着讨论的深入，中国倾向于作为借款国参与增资，这一表示得到世行执董会部分成员的坚决支持（特别是法国和日本），但支持者所占的比重只有上一轮增资时的三分之一。期望中国在此轮增资后毕业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进一步期望中国在毕业后很快成为捐款国。在 97 至 99 财年世行每年对华贷款总额 30 亿美元中，国际开发协会软贷款约为 3.3 亿美元，同 94 至 96 财年软贷款在世行年贷款总额 30 亿美元中占三分之一相比，已经大幅减少。

本文接下来将着重谈一下在我短暂担任中国局局长之前、期间及之后中国的总体宏观经济政策关切，包括调控经济周期性波动，根据《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世行在支持中国为实现这些领域的目标采取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结尾是我对世行贷款计划对中国改革的贡献的一些思考，以及世行香港年会的准备工作，包括《2020 年的中国》系列报告和中国应对东亚金融危机。

¹⁶ 尼古拉斯·霍普（Nicholas Hope），1994 年至 1997 年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2000 年从世行退休后任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继续保持与中国的密切联系，曾接待多位中国政府官员开展中国政策改革研究。

调控经济周期性波动

我很快就了解到，在改革的前十五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大获成功，超过了开发确保宏观经济稳定的有效工具的速度。直接控制信贷和投资仍然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工具，但已证明对于解决阶段性经济不稳定是不够的。快速通胀与经济高速增长和不可持续的繁荣相伴而行，繁荣过后（相对）萧条接踵而至，这种模式屡见不鲜。在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后，通胀率飙升到年平均20%以上，明显暴露出零敲碎打式的改革带来的系统性弱点。

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令人鼓舞的领导之下，（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协助下）经过许多中国优秀经济学家（其中有些人2021年仍活跃在经济领域）的广泛经济调研，围绕实行稳定经济的改革和建立基于规则的宏观经济管理与监管机制，在党内形成了共识。这些要求涵盖了《决定》的精髓。然而，在许多必要的改革措施生效之前，朱镕基副总理和他的同事在1993年至1995年期间采取了多项抑制通胀但不造成增速下降的措施，包括直接调控贷款和支出规模。

对于围绕如何抑制通胀又不过度降低增速、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需要采取哪些政策等问题的讨论，世行的贡献大部分发生在我就任中国局局长之前（参见我的前任的文章），但在我上任时，世行正在对一份经济研究报告做最后的润色，该报告传达的主要信息是，中央政府必须收回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决策权，这是允许单个经济主体独立决策的前提条件。这些经济主体中最重要的往往是省市委书记、省长、市长，他们在各自管辖地区内的经济发展重点导致了国家层面的“合成谬误”。地方政府任意利用国有商业银行地方分行的信贷扩张进行投资，而投资的价值往往令人怀疑，他们的行动又因为他们能对中国人民银行各省市自治区分行施加影响而获得便利。

《决定》的实施

《决定》提出了对中国社会将产生广泛影响的全面改革计划的设想，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主要措施包括：汇率并轨（1994年1月得到有效实施）和重视更有效地管理对外商务；内贸和外贸自由化；具有深远意义的公共财政法律法规修订，引进增值税，建立国家和地方税务局；改革货币管理安排，以地方政府为代价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更大的独立性；初步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金融和企业转型（尚未完成）等。

改革计划的成功完成需要在上述大部分领域协调推进改革。财政改革的目标是通过建立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对指定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具有不同

的管辖权，取代财政大包干制度。这些税收改革措施以引入增值税为基础，解决了由于早期财政分权而导致中央政府收入减少的问题。1995年通过的《预算法》确保了财政纪律，禁止中央政府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赤字只能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地方政府也受到类似的约束。世行通过一个财政技术援助项目，协助政府为新税制建立制度安排，包括购置登记纳税人和监测增值税相关交易所需要的计算机设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参与了这项工作。

货币集中管理和一些重要金融改革措施有助于更有效地控制信贷和抑制通胀。中国人民银行被赋予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限，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将更多地受制于商业原则。1993年，人行切断了地方分行管理层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人事联系；随后，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人行唯一的货币政策权限，将地方政府排除在外。随后进行的人行管理体制改革撤销了省级分行，设立九个跨省市区分行，这种机构设置明显受到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影响。

为了让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能够进一步按照商业原则经营，1994年初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其目标是免除国有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贷款义务。这个目标至少在初期并没有得到充分接受，其证明是国有商业银行分行继续受到压力为地方政府提供投资贷款。此外，三大政策性银行的贷款资金来自于发行债券，其中大部分债券必须由国有商业银行购买。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仍用于为政策性项目提供资金，新的安排只是使资助变成了间接形式¹⁷。

世行根据《决定》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为改革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世行中国局大部分经济研究工作和贷款项目的许多政策和制度建设子项目都是以推动经济改革作为设计目标的。

其中一项活动是1995年世行与中国政府多个部门共同组织的国有企业改革研讨会，中方主办单位包括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国家计委等，也包括监管部门和国企业的代表。多位中方嘉宾在会上提交的论文吸取了世行聘请的外国专家的意见建议，研讨会就国企改革如何推进形成了广泛共识。

虽然通过研讨会对国企改革的蓝图形成了共识，但随后采取的改革措施在地域上比较分散，试点性的，而且断断续续。最高层对于国企需要发挥的作用似乎缺乏共识。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对很多小型国企实行了私有化、兼并重组或关停并转。对于国企与政府关系的看法至今仍模糊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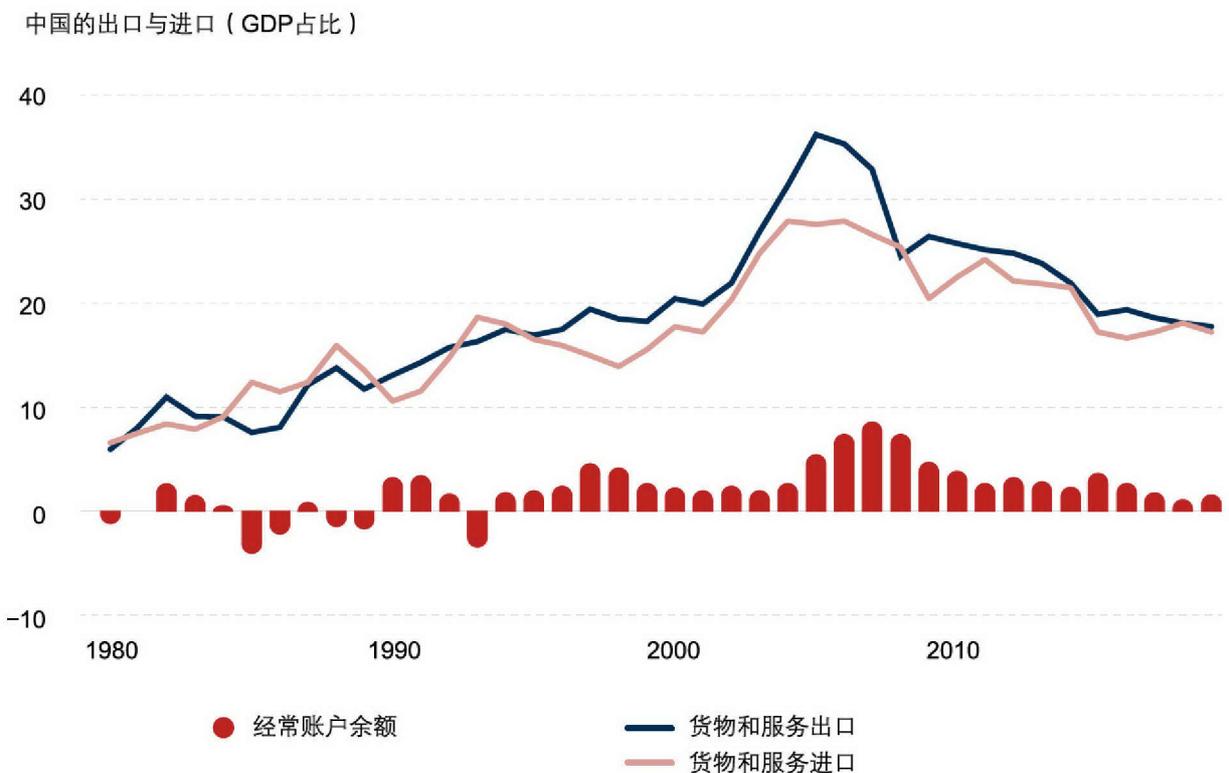
17 另一个能说明消除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贷款负担的例子是我1995年与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岐山的一次谈话，当时我们准备了一个支持建行改革的大项目，我向王行长建行贷款中多大比重由信贷计划确定，多大比重由建行贷款专员自主决定，他回答说一半一半，但中央要求将信贷计划确定的比重提高到60%，剩余部分由建行内部自主决定。我提出世行贷款的一个可能条件是将信贷计划确定的比重改成40%，独立贷款比重提高到60%，王行长对此给予了否定回答，他解释说国家计委下达的贷款项目质量远远优于分行经理提交的项目质量。这次谈话可以说明，当贷款决策不以商业原则为主导时，分散化决策会产生不良后果。

加入世贸组织

世行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详尽分析大部分发生在我离任后，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世行围绕旷日持久的人世谈判尽力提供帮助。在入世之初，中国希望成为世贸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世行支持中方的这个意愿。世行人员定期与中方谈判代表、特别是龙永图会晤，商谈世行能否提供帮助和提供哪些帮助。

在一次这样的会晤中，世行的地区管理团队见到了时任国务委员吴仪，她表示中国迫切希望加入世贸组织，但不接受过于不利的条件。她把入世谈判比喻成一场足球赛，一方（我们推测她指的是美国）极力想缩小场地面积，同时又要求中国在常规大小的场地上比赛。我个人对中方在谈判中的立场是很同情的，因为似乎每次中方对要求做出让步，对方又会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我认为让中国尽快入世对双方都有益，中国入世后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就能在出现分歧时进行仲裁。

图 3 2001 年中国入世后贸易飞跃发展



来源：数据来自世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接下来是在华盛顿与克林顿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的会晤，世行的地区团队在会上竭力推动中国入世。我们被告知中方误解了美方的反对意见，以为是出于政治动机。那位官员说，实际情况是由于美国企业的商业利益对克林顿总统的制约，因为美国企业决心将中国市场准入最大化作为中国入世的条件。此外，他接着说，欧洲人很乐意让美国“唱白脸”，一旦美方对谈判结果表示满意，中方可以预期欧洲人会提出他们自己的要求。最后，又经过了好几年时间，以及中方进一步做出实质性让步，中国才于2001年12月最终加入了世贸组织。

世行贷款计划的贡献

世行对华贷款项目的质量是世行中国局引以为豪的。在这方面我要向一位世行同事胡长焄（Austin Hu）致敬，他于1995年至2005年的十年间担任世行驻华代表处副代表、后任世行中国和蒙古局副局长¹⁸。94至97财年世行贷款额每年在30亿美元左右，其中国际开发协会软贷款在前三年每年10亿美元，97财年减少到3亿美元左右（第12轮增资期间），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市场利率贷款补足30亿美元的剩余部分。世行执董会通常每年批准15个项目，平均平均项目贷款额2亿美元，单个项目的贷款额从5000万美元到4亿美元不等。

同样，中国也迫切希望获得全球环境基金和蒙特利尔议定书所提供资金的公平份额。这些是数额较小的贷款，但从中国局为项目准备投入的资源来说并不一定成本更低。尽管有预算压力，但世行中国局理解全球环境基金和蒙特利尔议定书项目有助于提升中国对环境治理紧迫性的认识。蒙特利尔议定书项目在快速使用替代品取代消耗臭氧层化学品方面发挥了非常有效的作用。一个生产有害化工产品的工厂被改造成了卡拉OK歌厅。

在大部分情况下，中国财政部和世行中国局往往在与国家计委磋商后开展广泛讨论，确保就双方优先考虑的备选项目达成一致。大项目主要有发电厂、水利枢纽工程和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高速公路项目。与其他借款国相比，中方工程投入的质量令人大开眼界。所有的项目都致力于改进相关政策和体制，例如电力项目的电费制定、大坝项目的非自愿移民安置、公路项目的征地拆迁补偿等，并确保对接入新建高速公路网的农村公路建设给予适当重视。

很多城市项目也开始重视环境子项目。供水和污水是双方优先考虑的重点。有一个创新型住房改革项目旨在推动国有企业住房分配制度改革，探索将住房所有权转移到住户的路径。市政项目始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找到更有效的沟通渠道，让市委书记和市长了解更好的选择方案，从而使本身受益人数有限的项目产生更大的影响。

18 其他许多我要感谢的人士在鲍泰利的文章中有所提及。

对我来说，有些项目规模小但意义大。例如，在我考察了贵州山区一些克汀病仍很普遍的小山村之后，支持碘盐生产的项目成为重中之重。黑龙江一个较小的农业企业信贷项目响应朱镕基副总理要求省政府官员通过世行项目加快改革步伐的指示，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世行对环境治理提供了额外支持，实施了林业项目、淮河治理项目和重庆城市环境项目，重庆项目最初是一个工业结构重组项目，后来调整为搬迁两座造成污染的炼钢厂、减少长江以及后来的三峡库区污染排放的项目。

中国政府做出决定要消除绝对贫困，并设立了2000年扶贫攻坚短期目标，为落实政府的决定，世行协助准备了复杂的扶贫项目。西南扶贫项目是试点，在多个子项目中有一项措施是在自然条件不适于维持生计的地区帮助农民进城务工，通过务工收入使留在农村的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当然，在项目准备期间也会有意见分歧，有时在项目谈判中还会出现困难。我记得与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有过两次在会谈中发生争执，起因是我们坚持西南扶贫项目要将很大一部分世行贷款、特别是软贷款用于支持项目区的教育卫生服务，而国家计委倾向于将贷款资金用于直接生产性活动。采购经常引起争执，在贷款批准前和批准后都发生过，原因是世行要求确保设备和土木工程采购采用国际竞争性招标，而中方则希望尽可能在本地采购。

世行中国局感觉工业重组项目推动企业改革的效果令人失望，所以在贷款计划中逐步淘汰了此类项目。在其他方面，比如有两个铁路项目延期，原因是项目相关的改革缺乏魄力，特别是在铁路部门已制定全面改革战略的情况下，世行认为除非就实施该改革战略的具体行动计划达成一致，否则就无法推进项目。即使偶尔会有失误，但充足的项目储备意味着可以提前一些项目来代替延迟的项目。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比考察实施中的世行项目更令人愉快了。亲眼目睹世行对提高中国人民生活质量所做的贡献是极其令人欣慰的。令人欣慰的还有时任世行行长沃尔芬森（已故）上任后首次访华时的反应。他非常享受在中国各地考察世行项目，尤其是对黄土高原小流域治理项目印象深刻，对面积“相当于瑞士国土”的黄土高原重披绿装、农民生活明显改善赞叹不已。

他对这个项目的印象如此之深，居然在访华后期江泽民主席会见时对其大加赞美。在这次极为亲切友好的会见中，沃尔芬森行长还介绍了其他项目，比如小浪底大坝和甘肃的一个灌溉项目，会谈涉及很多话题，包括两人的体育运动造诣和对音乐的共同爱好。几天后，中国财政部的刘仲藜部长、刘积斌副部长和其他同事很高兴地通知我们，江主席要求他们把沃尔芬森先生赞不绝口的那些项目的详细情况上报给他。



1994 年批准的黄土高原小流域治理项目一期

为世行香港年会做准备：《2020 年的中国》和东亚危机

在我的任期临近结束前，也是世行进行大改组期间，英国将香港控制权交还中国，但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还保留一定程度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权。为了体现其重要性，世行中国局认为在 97 财年要有所表示。这一事件的意义通过 1997 年 9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行在香港举办年会得到了体现。我把香港年会看作是一次“初次亮相”的盛会，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世行中国局年会准备工作的核心内容是编纂一份对中国 2020 年发展前景的综合研究报告。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研究团队，由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牵头，在罗兰德指导下开展工作。这个研究团队着手勾勒出到 2020 年之前中国可能遵循的发展路径。我的想法是按照《世界发展报告》的模式，但预算紧张意味着我们不能把摊子铺得太大。最后，我授权透支 20 万美元预算作为尼赫鲁研究团队的工作经费。

作为对核心团队研究工作的补充，展示世行和中方经济学家过去两年的合作努力，最终成果将包括新的《2020年的中国》报告，加上若干近期经济研究的修订版作为分报告，总的目的都是为了协助中国政府推进《决定》的实施。

在第一个分报告里，作者团队论述了中国的环境恶化问题，这是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不利后果。报告针对急需解决的空气和河流污染以及如何减轻未经处理的垃圾造成的破坏，对各种选择方案进行了评估。随着中国日益把修复环境作为首要任务，世行的经济研究也以越来越多的环境项目作为补充（有些项目上文已有介绍）。

在第二个分报告里，另一个世行研究团队协助中国政府官员确定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措施，目标是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通过一些简单易行的改革提高粮食流通效率，可以增加农民的售粮收入，粮价下降也对消费者有益。

在第三个分报告里，来自世行多个部门的经济学家调研了大幅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空间。虽然中国卫生部官员和世行人员一致认为需要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但财政资源严重受限的现实决定了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确定中国现行医疗卫生支出中的低效之处，为重新配置资源取得更好效果提出路径建议。

第四和第五个分报告研究了经济快速增长对福利的影响问题。在第四个分报告里，作者探讨了快速增长的效益分配不均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第五个分报告考虑了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提出必须建立能为老龄人口提供有保障和充足养老金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六个分报告呈现了世行核心经济研究团队针对中国经济快速融入全球经济的研究成果。中国快速崛起成为一个国际性经济大国，这一趋势在2001年12月中国入世后显著加快。

在香港年会后，东亚危机成为我们最为关切的地区性问题。中国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在国内实行维持经济增长的政策，帮助稳定了地区需求，而且没有采取某些外国“专家”提出的货币贬值建议，这些直到后来才得到充分承认。中国向经历严重经济困难的周边国家证明，中国在决策时考虑到了他们的情况，而不是单纯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决定。

令人遗憾的是，我的中国局局长任期于1997年6月结束，健康原因使我不得不中断在世行的工作。我的继任黄育川成为首个常驻北京的中国局局长，主持完成《2020年的中国》研究和代表中国局出席9月香港年会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

中国的扶贫战略与世界银行的支持

1997—2004 年¹⁹

黄育川²⁰

在我担任首个常驻北京的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任期内（1997 年至 2004 年），正值中国从一个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中等收入国家。那些年以几个显著事件为标志——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然后是中国政府采取重大举措开展银行业和企业改革，最后是中国充分利用 2001 年的成功入世，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适应国内外环境快速变化的能力，使其得以实现两位数的持续经济增长，实施使亿万人民摆脱绝对贫困的计划。2004 年在上海举行的全球扶贫大会庆祝了中国的脱贫成就，恰逢我卸任世行中国局局长职务。

1997 年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使我有机会了解世行对华业务。

这次盛会是为了展示东亚的活力和中国成为重要的经济参与者。中国领导人庆祝香港回归大陆，标志一个世纪的不平等条约和尊严丧失的终结，生动展现出这一事件的政治意义。

香港年会是一个展示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机会。对我来说，它采取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会见记者的形式，那是一场罕见的、不用稿子的记者会，朱镕基以不同寻常的坦率态度，回答了一系列记者提问。6 个月后，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他开拓性的改革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起了历史性作用。世行处于前排位置，得以与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技术官员共事、近距离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即使是担任总理期间，他依然对改革辩论的分析基础表现出浓厚兴趣，在意识形态压力仍然限制改革选项的情况下，展现出采取务实行动的本领。

¹⁹ 我在担任世行中国局局长期间，与许多中国财政部及其他中央政府部门的官员和世行官员合作。使我受益匪浅，包括好几位为本书撰文的同仁。我的直接联系人有些后来升任财政部部长，还有现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朱光耀和邹加怡，我对他们给予我工作的支持深表感谢。

²⁰ 黄育川（Yukon Huang），1997 年至 2004 年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此前任世行俄罗斯及前苏联局局长，中国政府与世行《2030 年的中国》联合报告首席顾问，现任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研究重点为中国经济及其区域和全球影响。

香港回归的喜庆气氛还未消散，1997年7月泰铢暴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东亚各地股市和资产价格相继下跌，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其传染效应给整个地区带来威胁，很多专家担心中国是否会屈服于外部金融压力，在其他亚洲货币纷纷贬值的情况下让人民币贬值。中国坚持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做法获得广泛赞誉，特别是得到时任美国副财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的赞扬。财政部高级官员们认识到，北京帮助恢复地区稳定的行动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初期表现。

但是，这场危机也引起对中国积累的大量不良贷款、国有企业财务业绩不佳和财政分权体制的弊病等问题的关注，这些问题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很多世行报告和政策咨询的主题，也包括同多位被标记为朱镕基门生的主要官员的交流，最值得一提的是同周小川关于金融问题的交流、同楼继伟关于财政改革问题的交流，同郭树清关于体制改革问题的交流。我还记得曾邀请当时还很年轻、现任习近平主席“经济沙皇”的刘鹤来我家吃饭，同世行考察团讨论经济问题。

世行的分析研究为政府金融重组计划提供了建议，这个计划包括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贷款和采取“抓大放小”战略剥离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也许更重要的是世行为推进中国贸易体制改革准备工作开展的多项研究，这一改革导致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朱镕基总理将入世看成是他最重要的成就，入世与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共同为中国此后十年经济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1997年9月23日，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世行发布了全套七册《2020年的中国》报告，研究了中国近期历史、现状和在21世纪前二十年应遵循的路径。

在这个阶段，世行还有一些贡献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却在中国政府的世行最重要贡献清单上名列前茅，那就是世行项目带来的核心金融服务的效益。在我任期内，作为世行推进分散化管理的一项内容，世行将采购和支付工作的职责下放到北京代表处，得到中国财政部和负责项目实施的省级政府官员的普遍赞赏。这一举措帮助加强了政府的公共支出管理能力，是成就世行对华贷款项目高质量的一个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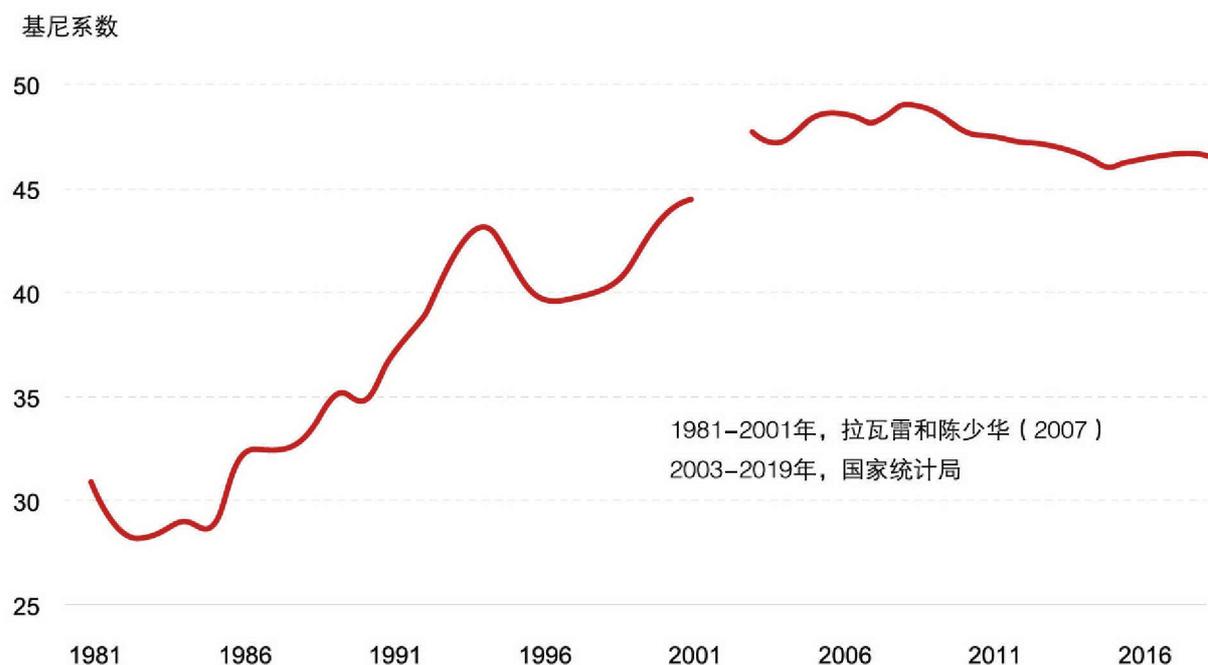
下面我想着重谈谈中国加剧的不平等问题以及世行对华业务计划将减贫摆在日益突出的位置。

不平等现象与减贫计划

中国非凡的经济增长历程持续稳定地创造了大量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就业机会，帮助亿万人摆脱了贫困。但是，这一增长过程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空间分布很不均衡，生产集中在沿海地区以便于出口，由此建立的竞争优势使国家走上了快速增长轨道，但也造成收入差距显著扩大。

作为不平等程度指标的基尼系数快速上升，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0.30 到 90 年代后期已攀升至 0.45，之后趋向平稳。中国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主要是地域性的，这是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到本世纪初，城乡人均收入比值超过 3，沿海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两倍多。

图 12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平等程度显著上升



来源：作者根据拉瓦雷和陈少华（2007）的 1981-2001 和国家统计局 2003-2019 年数据编制。

虽然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减贫就是一项优先任务，但在我担任世行中国局局长期间，扶贫工作的紧迫性更加突出。我到北京上任后就做了一次实地考察，由时任中国财政部国际司司长、主管世行对华贷款的祝宪全程陪同，以彰显政府对扶贫的重视。我们同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年度贷款计划讨论把重点放在向落后内陆地区输送更多贷款资金。中国政府 1999 年提出并广为宣传的“西部大开发”计划极大地促进了扶贫工作。

西部地区的生态条件不利于农业生产率提高，城镇化率偏低和社区分散孤立增加了公共服务的成本。世行贷款越来越多地向四川、甘肃、宁夏、广西、云南、新疆等内陆地区集中。在这些地区，由于不稳定的灌溉服务、荒漠化、水土流失和环境恶劣，农民打的是一场毫无胜利希望的仗。

我们的很多项目将农村发展计划同改善农业生产实践和促进作物多样化相



西南扶贫项目是世行在中国支持的首个扶贫项目，示范推广了多部门综合性扶贫开发模式，图为种茶项目农民在采茶。

结合，比如秦巴山区扶贫项目、国营农场项目和加强灌溉农业项目。这些项目与其他帮助建设多功能大坝、建立或恢复灌溉系统的项目相辅相成，比如塔里木盆地灌溉项目和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项目。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世行贷款黄土高原小流域治理项目推广梯田建设和新型农业生产技术，在这片荒凉贫瘠的土地上有效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生计，引起广泛关注。世行的农村发展项目在适当时还包含易地搬迁子项目，把农户搬迁到资源条件和灌溉设施较好的地区。这些项目被认为取得了较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比如西南扶贫项目就曾获得世行执行董事会考察团的称赞。

解决这些体制性问题需要具有奉献精神的世行员工与中央和省级政府官员的持续合作。世行有一批最懂行的专家，在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与中国政府同行建立了紧密关系，比如皮安澜（Alan Piazza）与国务院扶贫办、古纳（Daniel Gunaratnam）与水利部、伏格乐（Juergen Voegelé）与黄土高原项目。

世行的生产型项目也与解决教育卫生地区差距的社会项目相互补充。比如在农业领域，哈尔西·毕莫（Halsey Beemer）等世行资深专家在十几年时间里同中国教育部保持沟通，准备了一系列教育项目。还有一些世行专家在开展卫生服务改善项目和应对非典、消除结核病等领域做得风生水起。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西部扶贫项目涉藏敏感问题引起争议，使得世行在这个阶段对中国扶贫工作的支持蒙上了阴影。1999 年，西部扶贫项目被指控支持青海省对包括多个少数民族在内的 5.8 万农村人口进行易地搬迁，违反了世行原住民和社会安全保障有关规定，受到世行独立监察小组的审查。这是我在

中国任期内的至暗时刻，我投入了无数个星期的时间同中国财政部的朱光耀、金立群等官员协商，设法解决这场危机。这场争议最终导致中方撤销了青海子项目的贷款申请，改为自筹资金实施，甘肃和内蒙古子项目单独立项申请世行贷款。这个事件对双方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个事件增加了对外部政治因素影响项目本身考虑的担忧，引起了对应用世行安全保障政策时是否将中国同其他借款国区别对待的关切。对于世行来说，限制了世行在敏感地区开展贷款业务。尽管世行与中国的关系在这个阶段经受了严峻考验，但通过双方的不懈努力，业务活动最终得以恢复正常。

基础设施和城镇化与减贫

在这个阶段世行基础设施贷款对减贫的影响往往被忽视。在国际发展机构和世行主要股东国中，围绕基础设施投资对扶贫的贡献程度有很多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良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公路、铁路、内河航运、通讯和能源）在这方面至关重要，中国是这种观点的主要支持者。

做中国项目的世行员工常常必须在世行执董会上据理力争，说明把很大一部分贷款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理由。在我任职期间，中国每年把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以上用于交通建设投资，按照国际标准这是前所未有的。世行为国家高速公路网、农村道路、铁路、沿海和内陆港口建设提供的贷款，在改善中国落后地区与沿海商贸中心之间的互联互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投资项目缩小了过去因人为省界划分和距离遥远造成的巨大工资和物价地区差异，通过降低商品最终价格中的运输成本比重，使贫困内陆地区的劳动力融入了全球市场产业链。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取得的成功，有助于改变国际发展机构对基础设施的减贫作用的想法，也为数年后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

成功的农村发展计划同基础设施投资相辅相成，促进了快速城镇化。世行通过很多加强市政服务的城市发展项目，为城镇化进程提供了支持。这些项目遍及全国多个城市，从西部的重庆到上海、广州，支持 1.5 亿到 2 亿外出务工人员的跨省流动和有效利用。世行对外出务工人员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研究，为中国政府改革户籍制度和居住政策的长期努力提供了支持。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城市就业岗位转移，不仅增加了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也为农村留守人口腾出了资源。

快速变化的中国意味着，世行业务计划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这些需求范围广泛，既有农村扶贫和社会发展，也有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发展。为减少不平等现象付出的全部努力，其最终影响体现为地区经济增长率差距不断缩小。虽然从 1990 年到 1995 年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超中西部地区，但是到 2005 年，地区经济增长率已大体持平。

在上海召开全球扶贫大会

中国减贫事业的成功和与世行的合作，在 2004 年 5 月举行、由时任世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D. Wolfensohn）主持的全球扶贫大会上得到了充分展现。在上海召开的全局扶贫大会旨在展示中国数十年致力于大规模扶贫、实现亿万人脱贫的成就，一千多名来自发展中国家、包括多位国家首脑、政府官员、私营企业和民间社团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人员分析了 100 多个案例，分享知识和实践经验，探讨在实施大规模减贫计划中哪些方法可行，哪些不可行，原因何在。全球扶贫大会是世行与中国数十年合作的一次盛大庆典，也是对时任世行行长沃尔芬森先生（1995—2005 年）恰如其分的致敬，他以恢复减贫作为世行首要目标而闻名于世。这次盛会为我在中国的任期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全球扶贫大会于 2004 年 5 月在上海召开，时任世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致开幕词。

应对中国严峻的环境挑战²¹

杜大伟²²

中国在经济增长和减贫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也带来了许多环境问题。我于2004年夏来北京担任世行中国局局长，但我有幸拥有过去在中国教书和做研究的经历。1986年和1988年春，我曾两度来北京讲授经济学，这两次讲学之旅使我有机会游历了中国很多地方，包括云南和四川农村地区。我在世行研究局工作期间（1995年至2004年）曾主持过一个大型研究项目，对中国100个城市的一万家企业开展问卷调查，2000年前后还参加过一个黄土高原项目考察团。

这些经历使我对中国面临的主要环境挑战有切身体会。1986年，我骑着“飞鸽”自行车在北京城里到处转，曾遭遇过可怕的沙尘暴，从千里之外的西部地区刮来的滚滚黄沙是乱砍滥伐和荒漠化的后果。其他空气污染则是季节性的，在中国北方地区，冬季使用劣质煤炭取暖，致使城市终日笼罩在雾霾之中。很多河流湖泊受到严重污染。1986年我曾有一次乘坐驳船沿大运河航行的经历，河水散发出刺鼻的臭味。同样，广东省的珠江上飘着未经处理的垃圾，成了一条臭水沟。

在我就任中国局局长时，中国已开始采取强有力的环境治理措施，并已取得了显著进展（例如，全国森林覆盖面增加，从1995年到2005年北京等大城市空气污染有所改善）。但是，环境的挑战依然严峻，公众对空气和水污染带来的健康和经济影响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求世行提供援助，而这个领域很适合得到世行的关注，因为大多数环境问题解决都需要采取投资与政策改革双管齐下的方式。因此，将示范项目与政策改革和分析研究相结合是对症下药。世行援助计划在三个具体领域帮助推进了环境治理：植树造林、清理河流湖泊和治理空气污染。

²¹ 感谢李莉、刘登立和华玛雅对本文提出的有益建议。

²² 杜大伟 (David Dollar)，2004年至2009年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历任多个世行职位，包括发展经济学部发展政策局局长，从世行离职后，2009年至2013年任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专注于中国经济和美中经济关系。

黄土高原

世行实施了两期黄土高原小流域治理项目。这两个项目都是在我上任之前批准的（是中国最后一批国际开发协会软贷款项目），所以我可以给予客观的称赞。黄土高原是生态脆弱地区，覆盖北京以西的多个省份。随着岁月的流逝，树木和大部分植被荡然无存，黄土裸露在外，我2000年前后初次访问的印象是，这个地方就像月球表面。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有机会定期回访，亲眼目睹了黄土高原由黄转绿的巨大变化。在这个地区居住着数千万人，主要靠放牧和种田为生。世行项目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特点，项目支持农民自愿外出务工，解决人口过多超过环境承载力的问题。项目区实行封山禁牧以恢复生态环境，用养猪作为替代生计，每个村培训一名妇女学习养猪基本技术，再发给她几头猪崽，条件是她要教会其他农户养猪。在后来的一次访问中，我发现其他项目建设的穿越该地区的公路是养猪成功的关键，可以把饲料运进来，把成猪运出去。我记得有一位妇女给我看她怎么在手机上查猪肉价格，确保中间商不会骗她。农户传统上也种粮食，耗水多的作物不适合当地环境，项目出资帮助农户改种耗水少的经济林。

这些项目在减贫和恢复生态方面非常成功。随着重新绿化工作的深入，黄土高原以东的北京等城市沙尘暴次数明显减少。在这个项目的成功基础上，我们与四川省地方政府合作，在长江流域也开展了类似的小流域生态恢复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果，从1990年至2015年森林覆盖率提高了33%。我们与电影制片人刘登立合作把这个成功的项目拍摄成纪录片，在国际上广为宣传。非洲一些类似黄土高原的生态脆弱地区也开展了多个内容相似的项目。

清理河流湖泊

在我担任中国局局长期间，我们代表处全体100多名员工到桂林开工作务虚会。务虚会的娱乐部分是乘船游览著名的漓江山水美景。在导游做完常规旅游讲解之后，我们的一名中国籍员工接过话筒，介绍了世行贷款桂林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这个项目的基本内容包括规定随意丢弃未经处理的垃圾违法、投资建设污水处理厂、推进水价改革实行用水收费，以及征收污水处理费使污水厂能够可持续运营。

在中国，水价改革是很有争议的，因为水历来是免费的。但是，中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而且各地区水资源分布不均。中国人口以长江为界，近乎完美地划分为长江以南和长江以北各一半，但江南地区拥有可再生水资源的80%，而北方地区则符合极端缺水的定义。在我任期内第一次家庭度假出游使我对此深有体会。在对河南和陕西境内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摇篮探访之旅中，我们的

日程包括“乘船游览”黄河，我加上引号是因为我们乘坐的气垫船驶过的实际上是一片黄泥滩，河里的水太少，船根本浮不起来。

在这种缺水的环境里，为了鼓励提高用水效率、减少浪费和提供水处理所需资源使可用之水适合人类使用，经济地给水定价是合理之举。（1999年，全国40%的河流湖泊为劣V类水质，不适合人类使用）担心水费对贫困人口有影响也情有可原，但可以通过收入支持（最优方案）或阶梯水价制度（可接受的次优方案）来解决。如果所有用水都享受低价补贴，则富裕人口获得了大部分好处（多个世行研究报告对此均有论述）。尽管世行项目包含定价契约，但我们本着务实的态度：现实情况是水价大幅上调，但仍未达到完全经济成本水平。在我任职期间，中国大城市的水费标准一般为每立方米人民币1至3元，高于20世纪90年代每立方不到1元的水平。这是一个小的进步，水费覆盖了运营成本，但还不足以偿还设备投资欠下的债务，使水务部门成了地方公共财政的拖累。中国也很擅长“重建得更好”，早于这成为全球性口号之前。汶川地震发生后，世行地震恢复重建项目包括在从未有过污水厂的小城镇建污水处理厂。

污染的代价

我任职期间争议最大的一项工作是《中国环境污染损失》研究。污染问题众所周知，但是污染带来的损失到底有多大，投入多少资源进行污染防治是合理的，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为了推动这场辩论，我们组建了一个权威专家小组与中方研究人员开展合作研究。当时，关于空气和水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包括导致过早死亡是有现成估算的，但当时还没有采用中方数据进行的健康影响研究。由于在中国一些城市，空气污染已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即有研究成果是否还有相关性令人质疑，所以一项主要分析内容是首次采用中方数据对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进行估算。

研究的第二项主要内容是对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经济成本估算，这也是一个敏感领域。一种传统方法是人力资本方法，基本上是根据发病率和死亡率造成的工资损失进行估算。但是，人并不只是他们的工作和收入。因此，专家小组在上海、南宁、九江等地开展了一个创新性支付意愿问卷调查，用以估算中国城市人口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减少污染延长寿命支付额外费用。调查结果显示，民众愿意付出很大代价。以此为依据，专家小组得出的结论是，水和空气污染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相当于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5%，其中大部分损失来自空气污染（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3%），原因是民众通过喝成本不高的瓶装水能够减轻水污染问题的影响，而面对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害则无路可逃。

报告讨论稿在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讨论时引发了很大争议。对空气污染导致的额外死亡人数平均值估算为每年 35 万人，水污染导致的死亡人数为每年 5 万人，而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7.5%，远远超过各级政府环境治理上的投入。结论是：加强对水和空气污染的监管，大幅增加污染治理的公共支出，将会有利于提振民生。世行团队期望中国政府同意公布这个报告，关键是这是世行与中方科学家的合作研究成果。中方科学家极力要求公布这份报告，而他们获得了胜利，报告被放到网上，成为进一步分析这个重要问题的垫脚石²³。

这个分析报告为世行围绕水资源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在我任期内，我们并没有任何具体针对空气污染的项目，只有促进公共交通发展的普通城市交通项目。不过，这个报告为世行后来的工作，特别是与城市合作治理空气污染奠定了基础，比如世行贷款河北省和京津冀地区的空气污染治理项目，以及开发低成本、高效益的环境空气质量管理模型，中国目前在这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经验启示

我从这些经验中获得了四点主要启示，这些启示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日常工作压力下很容易被遗忘。第一，与客户携手合作至关重要。曾几何时，世行只要完成报告就算大功告成了，但到 2004 年，那种日子早已一去不返。给我留下最美好记忆的是与地方政府合作，研究他们面临的挑战，帮助他们研究和尝试新的解决方案，或者是与中方专家密切合作开展分析，为内部辩论提供参考。（作为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我仍然坚持这种做法：不久前，我与北京大学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们合作撰写了《中国 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一书，阐述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挑战。²⁴）

第二，世界银行在中国（以及在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是微不足道的，世行所有活动加在一起的直接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成功必须体现在示范项目和新分析、新理念上。森林恢复项目和水资源项目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项目展示出新方法的成效，然后就能在没有世行进一步参与的情况下扩大规模和复制推广。同样，《中国环境污染损失》报告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产生了重要影响。总的来说，世行在传播合作项目成功经验上的投入不足。我们在其他方面通过一些并非世行常规业务的活动也做出了一点

23 参加世界银行 2007 年《中国环境污染损失》，下载网址：<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782171468027560055/pdf/392360CHA0Cost1of1Pollution01PUBLIC1.pdf>

24 《中国 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杜大伟、黄益平、姚洋著，英文版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出版。



通过中国版《人民公敌》的演出，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

贡献。我前面提到与刘登立合作拍摄黄土高原纪录片。在《中国环境污染损失》报告发布之后，我们与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和挪威政府合作，主办了一场“呼唤绿色中国”环保演出活动，除了放映刘登立的纪录片外，还演出了易卜生话剧《人民公敌》的中国版（作为挪威政府在世界各地举办的易卜生逝世 100 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中国版的《人民公敌》把故事发生地改在中国的一个小城，当地一位医生发现工厂排放的污水会造成致命影响，因此动员民众要求关闭工厂，但在面临失业和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民众反而把医生当成了

“人民公敌”。这是一个很有震撼力的故事，说明在环境与经济之间往往存在着真实的权衡取舍。中国政府很好地利用了这个节目，在国家电视台多次播放，提高民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

第三点启示是与公民社会合作。妇联在黄土高原项目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世纪以来，随着世行在环境问题上的参与不断深入，我们主办了两期“中国发展市场”活动，从不同来源筹措赠款资金，资助民间组织的小型项目。在中国的环境和社会领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在四川农村访问一个民间组织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这个民间组织从“中国发展市场”活动中获得项目资助，组织大学生对口帮扶留守儿童，利用周末时间下乡给留守儿童辅导作业，教他们学习用电脑，传授他们的爷爷奶奶不懂的知识。

最后，主要从大自然的角度考虑环境问题是很自然的，比如森林覆盖率、清洁的河流湖泊、呼吸的空气等。但文化环境也很重要，虽然从来不是我们工作的核心内容，但很多世行大型城市环境项目都包含少量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从重庆到丽江，再到长江三角洲，瑰丽的文化遗产作为大型城市环境项目的组成部分得到妥善保护。在我任期临近结束时，我们为甘肃和贵州两省设计开发了专门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使这两个贫困省能从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发展可持续旅游中受益。

中国与世界银行：从发展合作到建立全面的全球伙伴关系 2010—2014 年

罗兰德²⁵

2008 年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经受住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产生的涟漪效应，基本上毫发无损。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2008 年 11 月，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中国快速推出 4 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3%）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经济增长得到实质性提振。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其规模相当于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的两倍左右，对帮助避免国内经济下滑起了决定性作用，也成为稳定全球经济的主要因素，对全球经济衰退和发达经济体增长疲软起到了制衡作用。在 2010 年冬我抵达北京时，情绪已出现变化，中国的经济决策者对自身克服短期经济冲击和经济增速放慢的能力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回顾 2010 年至 2014 年我担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期间世行与中国伙伴关系的主要发展。在世行继续保持对华贷款计划蓬勃发展的同时，中国在全球范围日益增长的作用和双方关于中国国内改革的联合研究，对我作为中国局局长的的工作影响最大，所以作为本文的中心内容。

²⁵ 罗兰德 (Klaus Rohland)，2010 年至 2014 年任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此前在世行历任多个职位，包括越南和俄罗斯国别局局长，任国别局长主管太平洋岛国时，还负责东帝汶的国际灾后重建工作。

中国在全球范围的作用日益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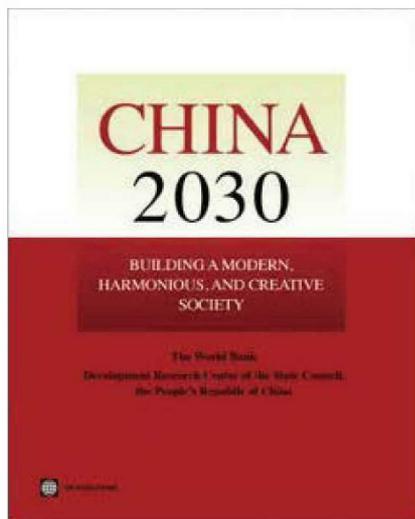
中国走出金融危机后比过去更加强大。早在 2010 年，中国就已坐上全球经济第二把交椅，向上中等收入国家快速挺进，并于 2015 年获得这一地位。政策制定者们意识到，中国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政策制定，并重新定义与其他世界大国的关系。中国官员过去认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承担的责任有限，只会逐渐成为一个全球利益攸关方，这种看法已让位于更为积极主动的政策，例如，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的声音，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双边援助。让中国在布雷顿森林机构和世界经济中扮演更明确的角色，成为中国外交和对外经济政策的一个优先重点。

中国在这方面行动迅速，接连推出一系列全球性和区域性举措。这些举措的实施在我 2014 年 10 月任期届满退休后仍在继续，我的继任郝福满接手管理世行的业务计划，他的文章将介绍 2014 年至 2019 年他领导下的事态发展。

中国早期在全球扩大影响的重点地区是非洲。中非合作论坛自 2000 年首次在北京举办以来，已成为中国与非洲各国讨论发展合作的定期活动。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和国家进出口银行大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的贷款和优惠信贷。中国在 2013 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融资举措，在 100 多个国家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公路铁路建设推动亚欧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互联互通，通过亚洲主要水路港口建设，促进海运业发展。在几年之内，中国快速确立了自己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成为与七国集团平起平坐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合作伙伴。虽然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有理由为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而沾沾自喜，但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投资步伐过快，缺乏协调，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期也日益成为地缘政治紧张的来源。世行在初期坚决支持中国作为全球参与者发挥更大作用，目的是利用中国与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的协同与互补效应。但最近以来，由于对透明度不足、在低收入国家的项目动机、设计或执行不当可能造成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的关切，使得这种支持受到影响。

《2030 年的中国》报告

加强本国经济建设，为保持经济增长路径奠定基础，是这些全球性倡议的自然补充。我初到北京时，国内政策制定者担心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认识到为防止经济增速放慢有必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果不进行改革，仅靠采取宏观经济措施来刺激经济，非但不能发挥效力，药到病除，最终反而还会导致增速放慢甚至停滞。中国政策制定者很清楚，在过去 50 年里，只有少数中等收入国家达到高收入水平，大多数国家功亏一篑，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是世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Indermitt Gill）和霍米·卡拉斯（Homi Kharas）在其专著《东亚复兴》中发明的。中国决心避免掉进“中等收入陷



阱”，必须彻底改变老的战略，把重点转向结构性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10年迎来了中国与世行合作30周年。为纪念这一重要里程碑，时任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和中国领导人达成一致，组织一个中方和世行联合专家团队开展一项综合性研究，借鉴国内外最佳实践经验，明确中国的前进道路，为中国迈向2030年制定长期愿景。中国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国研中心）和世行三方的高层领导对这项研究从整体上给予指导，国研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财政部副部长李勇、我本人作为世行中国局局长以及世行东亚地区首席经济学家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在工作层面负责组织报告编撰工作。

从2010年11月到2012年9月，联合专家组举行了多次研讨会，往往利用周末时间，深入讨论中国如何实现“2030年建成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目标。2010年11月，第一次会议在香山饭店举行，国研中心、财政部和世行三方组成一个联合研究团队，并形成了后来我们所说的“香山精神”。在报告准备期间讨论非常激烈，但联合研究团队从未按所属机构形成不同的派别。报告的会议版本于2012年2月发布，最终完成版于2013年9月面世。

《2030年的中国》循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期轨迹，提出在经历了30多年快速增长后，中国已到达一个新的转折点，需要应对新的挑战，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世行的观点包括以下七点：

- 第一，实施结构性改革以加强市场经济基础；政府应避免直接干预，把重点放在建立稳固的制度框架上，通过规则和政策加强经济运行能力，促进竞争，提升效率、专业化水平和环境保护；
- 第二，加快创新速度，提升研究开发质量，尤其要重视提高大学毕业生的技术和认知技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加强大学与产业的网络联系；
- 第三，推进绿色发展议程，市场激励机制、法规建设、公共投资、产业政策和制度建设多措并举；
- 第四，扩大机会和促进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就业、金融服务、优质社会服务和社保异地转移等领域的机会均等化，因为中国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程度较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在这些领域存在的巨大城乡差距；
- 第五，向服务不足的农村地区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包括从早期儿童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基层医疗服务到老年护理等各项服务；
- 第六，加强财政体系，调动充足的资源，重新配置资源增加社会和环境目标支出，确保预算资金提供与各级政府的支出职能保持一致；
- 第七，成为全球经济中更积极主动的利益攸关方，在多边机构中发挥更大作用。为此目的，中国必须在多边环境中与发展伙伴加强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帮助制定金融稳定、气候变化和环境等方面的全球议程，而不仅仅是做出被动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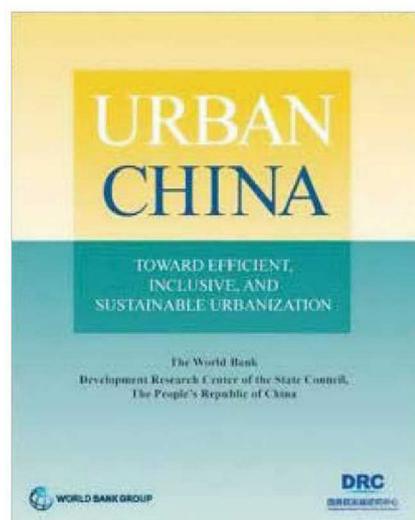
《2030年的中国》获得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在中国互联网平台上引起热烈讨论，有时甚至出现激烈争论，尤其是围绕国企改革或户籍制度改革等敏感话题。作为中国财政部、国研中心和

世行的联合研究成果，这份报告代表了中外专家的共同看法，为2011年“十二五”规划的讨论和2016年通过的“十三五”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承认风险的同时，《2030年的中国》重申，市场经济改革之路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并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维护社会稳定的唯一路径。

回顾2012年报告发布以来的八年，报告所做的许多经济社会分析和提出的建议都已逐步得到证实和支持。《2030年的中国》所预见的许多改革都已在中国开展和实施，即使是在全球经济和政治环境逆风劲吹，改革和国际合作难度增大的情况下，改革步伐也没有停止。与此同时，显而易见，《2030年的中国》提出的改革议程在很多方面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将报告的建议付诸实践仍须进一步努力。

《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报告

在《2030年的中国》报告中，联合研究团队提出，在这一报告的基础上，世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应考虑开展新一轮合作研究，进一步深化各项主题和结构性改革建议。中国的城镇化是研究项目的一个明显选题，2012年11月开始着手准备，组织架构仍依照被实践证明有效的《2030年的中国》的模式，由新任首席东亚经济学家郝福满接替退休的维克拉姆·尼赫鲁。城乡结合部作为放大镜，凸显出城镇化带来的种种问题：需要新的融资模式，以摆脱过度征用农村土地和与此相关的土地财政暴利，人口流动障碍，农民工收入过低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户口和无户口市民获得的教育卫生服务不均等。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加大了城镇公共服务的压力，农村土地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常常在当地农村引发社会骚乱。而且，农村土地（耕地）城镇化速度过快，导致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已接近18亿亩耕地“红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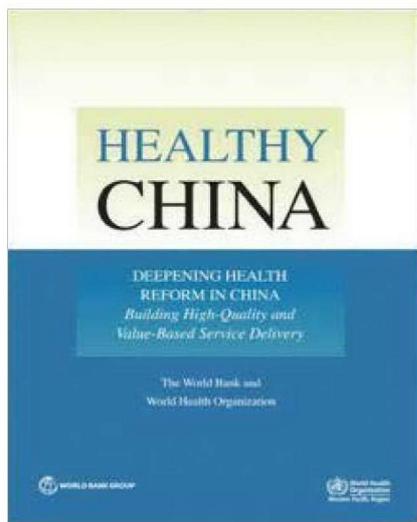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城镇化中国》）提出改革的六大优先领域：

- 第一，改革土地管理制度，促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城市密度、农业现代化水平和财富分配的公平性；
- 第二，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劳动力流动，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获得统一标准的公共服务的平等机会；
- 第三，将城市融资建立在更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同时建立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财政纪律；
- 第四，改进城市规划，加强连通性，鼓励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
- 第五，通过更高效的资源管理，减轻环境压力；
- 第六，改善地方政府治理。

2014年9月，《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报告发布，随着围绕城镇化战略的讨论不断深入而被广泛阅读。报告提出的建议进入“十二五”规划实施的讨论中，并为2017年至2022年的“十三五”规划编制提供了参考。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和“十二五”规划一样，

“十三五”规划也非常重视推进针对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放松居住证申请限制，目的是给予一亿多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权。实际上，中国采取了渐进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截至目前最大、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仍不在改革范围之内。

《深化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设基于价值的优质服务提供体系》报告



在2014年我任期届满时，中国和世行联合研究系列报告又增添了《深化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设基于价值的优质服务提供体系》（《健康中国》）。这个报告是由世行、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财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五方联合撰写。我亲历了报告的前期准备，郝福满在我退休后继任中国局局长，接手了报告的起草过程。《健康中国》报告重申，中国应继续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但应将重点从以医院为中心的模式转到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质量上。报告提醒公众将注意力转向非传染性疾病，因为非传染性疾病在每年1030万死亡病例中占比超过80%。总报告在我离任后于2016年7月发布，报告全文于2019年发布。报告提出的很多建议得到“十三五”规划采纳，但加强对基层卫生服务的重视和三个层级的卫生服务一体化仍有待进一步落实。

重视和三个层级的卫生服务一体化仍有待进一步落实。

联合研究报告的成功要素

我于2014年任期届满。在文章结尾我想着重谈谈对《2030年的中国》和《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成功要素的个人看法。两份报告都是世行、国研中心和财政部的联合研究成果，由三方共同发布。报告从零开始共同撰写，文字和建议都必须由三方达成一致。我们商定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上，避免逐字逐句的审核，在确有必要时交由负责各章节的工作小组去做。这种务实的做法确保了任务能够顺利完成。当然，有些敏感问题，比如国有企业、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等问题，必须在撰写过程中尽早提交给各工作小组组长，以三方都同意的、灵活的方式加以处理。在两份报告的准备过程中，讨论热烈，重点突出，但从未发生过激烈争论。这些讨论的结果都建立在证据和各自论点的合理性基础上。维护这种学术氛围是国研中心、财政部和世行团队的一项主要成就，也是成功的关键要素。在工作小组会议上（常常是在周末的务虚会上），经常性的面对面交流使得合作伙伴之间加深了相互了解，这也是一个成功要素。我作为这个研究团队的一员深感幸运。最后，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工程师和从事发展的实际工作者都拥有找到共同语言的意愿，从而促成了报告的撰写完成。

离开中国时，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成就感、满足感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合作成果自豪感，对于这些年的一路同行，我深表感谢。

关于中国与世界银行伙伴关系的思考

2014—2019 年

郝福满²⁶

2014年9月，作为新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重返中国，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实际情况也差不多，因为我入住的是我2004至2008年任驻华代表处经济部主任时住过的同一栋公寓楼，只不过房价涨了10倍。重返中国也具有象征性：我入职世行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研究中国，从那时以来，我所积累的经验、建立的关系，以及2004至2008年担任世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后担任世行东亚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常驻新加坡）的经历，都使我能一到任就“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马不停蹄”也是这个职位的需要：从2008年到2014年，无论在其自身发展、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还是与世行的关系中，中国都实现了一个飞跃。因此，在我担任世行中国局局长期间，最大的挑战不是开发和管理贷款计划以保持世行对中国的相关性，而是考虑到其他世行股东国对中国的看法改变、他们对世行在中国所起作用的意见，以及中国对世行持续的、甚至更高的需求，如何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平衡。



1993年4月中国经济改革与财政管理国际研讨会代表合影，前排右起第一人为郝福满，第五人为时任世行驻华首席代表鲍泰利。

²⁶ 郝福满（Bert Hofman），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2014年至2019年曾任世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

“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对国际参与采取了不同以往的看法。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将“等待时机，隐藏实力，绝不当头”作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指导方针，而习近平采取了不同的方针。这一方针的第一个具体体现是“一带一路”倡议²⁷。世行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在该倡议所涉及的国家有大量投资，据统计，世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金承诺额约有800亿美元左右。因此，深入参与是有必要的。参与采取了三种形式：一是世行领导出席2017年和2019年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二是“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三是多边开发银行与中国之间的协调努力。

到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时，这一倡议已成为一场地缘政治博弈。一些世行大股东国认为这是中国为占据地缘政治优势所采取的策略，而不是促进经济一体化和增长的手段。虽然世行按其章程规定是一个非政治性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世行的走廊里政治就不会出现。所以，时任世行行长金墉（Jim Yong Kim）与30多位国家元首和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共同出席高峰论坛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他在习近平主席讲话之后紧接着发言，强调了“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带来的发展效益，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与此同时，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崇高的目标，但在评估这项巨大工程的经济效益和成本方面却所做甚少。世行同意承担起这一评估的重任。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移动靶子，既没有一个总体设计，也没有一个优先项目清单，因此世行报告把关注点放在一批已确定项目的经济意义上，这批项目的投资总额约4000亿美元。报告得出的总体结论如下：

“‘一带一路’交通走廊可以显著改善贸易、外资和参与国公民的生活条件，但前提是中国和沿线经济体实行更深层的政策改革，以增强透明度，扩大贸易，改善债务可持续性，化解环境、社会及腐败风险。”

报告得出的一个关键结论是，由于网络效应，受益的不仅仅是沿线国家，“据估计，‘一带一路’交通项目可使沿线经济体的贸易额增加2.8%至9.7%，使世界贸易额增加1.7%至6.2%。”此外，报告的结论认为，“预计贸易额增加将使全球实际收入增加0.7%至2.9%，不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成本。预计沿线经济体将获得最大收益，实际收入增幅在1.2%至3.4%区间。”

²⁷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议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议的。恢复亚欧之间的传统贸易纽带的想法并不新鲜，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和希拉里·克里顿都曾经提出过，但他们的倡议缺少中国给予这个想法的决心与雄心。

换句话说，如果实施得当，改善基础设施所需要的投资将通过收入、贸易和投资增加带来回报，如果沿线国家以政策改革相配合，收益还会更大。但是，要把事情做对，东道国需要支持，需要投资规划、遵守环境和社会标准、合理安排资金结构、优化采购和治理腐败等方面的支持。在这些关键领域，中国、东道国和多边机构协调努力，可以对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投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议设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旨在加强多边开发银行与双边融资伙伴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世行成为《关于共同设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的谅解备忘录》签署机构之一，但迄今还未成为实施伙伴。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成立一家由中国支持的基础设施银行的想法，中国早在 2009 年就已提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二十国集团承诺将把基础设施作为拉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主要需求来源，多边开发银行将在基础设施融资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为此目的增资。然而，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眼中，到位的增资数额相对较少。亚洲每年需要约 8000 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才能跟上经济增长的速度，而当时实际到位的资金还不足一半。然而，对给予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在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中更多话语权的犹豫态度，使增资计划功亏一篑。

在这种背景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孕育成形，2013 年 10 月宣布筹建。在我就任中国局局长的头几个月里，亚投行的筹建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国召集了一次“谈判伙伴”会议，推动将提议付诸实施。当时，21 个国家²⁸签署了一个谅解备忘录，发起了一系列会议。2015 年 12 月，亚投行正式成立，57 个国家最终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

亚投行谨慎地采用了符合全球最佳实践的治理架构、运营程序和环境、社会及采购标准。我为自己在亚投行筹建和运营初期尽了一点绵薄之力而感到自豪，和我一起参与这项工作的还有时任世行东亚太平洋地区副行长阿克塞尔·冯·托森伯格。从一开始，时任世行行长金墉就明确表示世行将支持亚投行，他的支持使我们能够从世行内外广泛调动专业人才资源，围绕各项工作提供咨询建议，从章程到采购标准和社会与环境安全保障政策，再到一些日常事务，比如办公室布局、信息技术安排以及为举办首届年会提供支持。许多世行退休人员都被动员起来提供专业支持，比如杜大伟、娜塔莉·利希滕斯坦（Natalie Liechtenstein）、斯蒂芬·林特纳（Stephen Lintner）、伊恩·南丁格尔（Ian Nightingale）等，世行司库、会计、采购、安全保障等部门的很多在职人员也通过数十次视频会议和访问提供了支持。前世行同事刘晓云（Elaine Sun，

28 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老挝人民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蒙古、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曾于本世纪头十年任世行中国局副局长)是亚投行与世行人员、特别是我的主要联系人。

帮助成立一家新的开发银行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我参加了多次由现任行长金立群主持的会议,讨论的话题包括银行的整体治理架构、资本结构、贷款策略、合作原则等。金立群是我早在1992年就认识的首批中国政府官员之一,那时他是中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司长。后来去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工作,再后来出任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到他执掌亚投行之际,他已成为杰出的金融外交家,具有对发展金融的敏锐理解,以及他做英语专业研究生时研读莎士比亚的渊博知识。在他的领导下,亚投行以空前的速度投入运营,并获得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支持。2015年6月,经过9个月的谈判,亚投行章程文本敲定,准备签署。2015年12月,亚投行协议规定的生效条件已具备,亚投行正式成立投入运营。2016年,世行等开发银行与亚投行做了第一个联合贷款项目。2017年,亚投行发行了首支债券,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3A级。

亚投行的成立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很高兴世行成为亚投行筹建过程中的一个坚定的合作伙伴。这是由中国发起设立的第一个真正的国际性机构,亚投行的成功表明,中国确实能够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帮助塑造世界秩序,补充而不是取代旧秩序,愿意接受合理的规则,当旧结构落后于时代时勇于创新。虽然我认为亚投行也许永远不会成为最大的开发银行,但其管理结构简洁,并拥有强大的后盾,因而能够成为发展金融的创新者,世界和世行都会从亚投行的创建中受益。

贷款支持改革重点领域

虽然中国寻求在国际发展金融中发挥更大作用,但同时也希望从世行获得更多贷款用于推进自身的发展目标。我上任两个月后,我们第一次和中国财政部讨论了扩大世行贷款规模的问题,财政部方面牵头的是时任副司长杨英明,他在不久后出任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我们的想法是扩大三年贷款计划的规模,利用扩大规模的机会解决中国的一些当务之急,同时也引进世行新型贷款工具。

在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涵盖15个关键领域、包括60项经济和社会改革举措,总体目标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提升了在各项议题上的雄心。在这一背景下,中方和世行达成一致意见,将重点放在规模较大的转型项目和规划贷款项目上,旨在应对主要的跨行业发展挑战,包括空气污染、能源效率、水资源短缺、卫生服务提供体系等。双方也同意采用新型贷款工具,比如尚未在中国使用过的结果导向型贷款工具,并考虑

在中国首次使用政策性贷款，这些贷款工具很适合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系统性问题。

采取这一新方式的第一个重点是空气污染治理。当时空气污染已达到危机程度，成为过早死亡和致病致残的一个主要原因。2013年初，在中国北方地区被严重雾霾笼罩六周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宣布向空气污染全面开战。为了快速启动项目准备，我们调动了世行专家（其中有些专家参与中国空气污染治理工作已有20年之久）以及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国际专家，组织了一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介绍国际经验。在大会结束时，我们同几个省和中央有关部门商定了世行贷款项目的重点：提高能效和污染监测与防控。我们准备了两个结果导向型项目，于2016年初提交世行执董会审批。这两个项目虽然是中国首批结果导向型项目，但都大获成功，为中国治理大气污染做出了贡献。

第二个重点是减贫。《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设立了到2030年消除绝对贫困的国家目标，习近平主席将脱贫作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其他两大攻坚战为污染治理和金融稳定）。世行为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公室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供有关贫困瞄准和代理家计调查方法的技术咨询建议，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建立覆盖7000万贫困人口的数据库，收录包括致贫原因在内的数据。在这个数据库的基础上，中国各级政府开展了各种扶贫项目。很多县级政府（最直接接触贫困人口的层级）面临的问题不是缺少资金，而是如何合理利用资金。

在这种背景下，世行应邀与最贫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合作开展一个结果导向型贷款项目，支持当地政府优化提升脱贫攻坚工作。世行结果导向型贷款广西扶贫示范项目支持政府打通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项目支持了两项重要的制度创新：一是通过建立国家贫困人口登记系统，精确瞄准贫困户和贫困村。二是改进扶贫项目的规划、预算管理和监测评估。项目帮助整合大量涉农资金，根据当地实际需要统筹安排用于脱贫攻坚。广西项目的经验可以为全球面临类似复杂情况的地区提供借鉴，有助于世行支持其他国家消除极端贫困。

世行希望推进成果规模化的第三个重点是医疗卫生。在与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和财政部联合完成了中国医药卫生领域的旗舰研究报告后，世行应邀在福建、安徽两省支持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国医药卫生体制面临的一项主要挑战是第一层级薄弱：很少有人愿意到乡镇卫生院看病，甚至也不愿意到第二层级的县级医院就医，因为他们不信任这些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结果，第三层级的市级医院往往就成了看病就医的首选，造成这些医院人满为患。人力资源使问题复杂化：由于医务人员的一部分薪酬与药品、检查、治疗收入挂钩，诱使他们过度治疗，却没有积极性去农村卫生院工作。因此，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医疗卫生费用出现爆炸性增长。在这种背景下，福建省三明市开展了药品耗材集中采购试点，以此作为加强三级医疗服务

一体化的基础。世行结果导向型贷款项目配合三明试点，支持建立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并通过激励机制向农村地区输送更多医务人员和优质服务。

中国与世行

在我任中国局局长期间，无论是在资金方面，还是在发展思想与实践的智力贡献方面，中国在世行的地位都愈发突出。早在本世纪头十年初期，中国在世界各地的经济足迹快速增长，其存在感在非洲尤为明显。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中国开始寻求在贸易和投资范围之外扩大影响力。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日益把自己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习近平主席 2015 年 9 月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对此有明确表示。他在讲话中宣布设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世行日后的合作伙伴），并承诺为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提供 20 亿美元，支持各国实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成为国际发展融资的主要参与者。国家开发银行是世界最大的开发性银行，目前海外投资组合已超过世行，但近来新增贷款规模有所缩减。随着对外援助快速扩大，中国于 2017 年成立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世行及其他发展合作伙伴为其提供了支持。

在这一广泛的背景下，早在罗兰德任局长期间，中国财政部就已开始同世行讨论设立一个中国信托基金，2015 年 7 月金墉行长和时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共同签署了赠款协议。首笔赠款 5000 万美元虽然数额不大，但意义重大，使世行各团队得以深化同中国有关机构的合作与发展经验交流，加强与世行中国团队的合作，并在其他国家应用获得的经验。跨部门扶贫、医疗卫生服务、水资源管理和经济特区等各种研究项目获得了信托基金的资助。当时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已经成立，信托基金也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期评估认可了信托基金的贡献，但也指出在选择所资助的活动时应该更具战略眼光，超出南南交流的范畴，尽管南南交流也很有益。从中国经验获得的一个启示是：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施，因此获得发展经验的最佳途径是通过项目实施。

中国还以其他方式增加了对世行资源的贡献。在我任期内，通过国际开发协会的两轮增资，中国成为更具实质意义的捐款国，从第 16 轮增资时捐资不到 2 亿美元，到第 18 轮增资时捐资 6 亿美元（在后任局长任期内的第 19 轮增资中达到 12 亿美元）。此外，中国还通过加快软贷款还款和在第 16 轮增资周期内自愿还款（分别增加了 13 亿美元和 10 亿美元的额外资金），并在第 17 轮增资中提供一笔 10 亿美元“优惠伙伴贷款”，为国际开发协会做出了贡献。在第 18 轮增资中，中国首次以人民币捐款，人民币已于 2016 年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²⁹。到第 19 轮增资时，中国已成为第六大捐款国，但其贡献仍远远

29 国际开发协会借款国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因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而突然面临人民币风险，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掉期工具抵消了这种风险。

低于国际开发协会为每个国家计算出的“分摊份额”。在其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在第18轮增资中提出“转型与就业”专题，依据的是由前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领导的专家团队根据中国自身经验所做的深入分析。

在我任期内，中国也为世行2018年增资做出了贡献，虽然远未达到中国的期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世行的合法席位时，中国持有的股权约为2.8%，远低于1944年世行成立时中国持有的7.0%的股权。由于中华民国放弃了数次普遍增资和特别增资的机会，致使中国的股权不断缩水。2009年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承诺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平等的话语权，但即使在2010年（小幅）增资后，中国的股权仅略高于4%。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大幅增长，到2015年按现价美元计算已达到15%左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达到18%。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世界银行集团管理层启动了新一轮增资讨论。

像任何公司企业一样，增加某个股东的股权是以稀释其他股东的股权为代价的，对于世行来说主要涉及到日本和欧洲，这就使得讨论高度复杂化，尽管对世行贷款的需求已远远超过了其放贷能力。作为第一步，在2016年的秘鲁年会上，各方一致同意股权审议应采用“动态公式”，不仅要考虑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也要考虑这个国家过去对国际开发协会的贡献。根据这一全体同意的公式，采用2015年的数据计算，中国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名义股权应为12%。这是其他股东国无法接受的，因此要求中国同意接受明显偏低的股权份额以及其他条件，这些条件将逐步转移分配给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资源数额。中国表示同意，从而帮助具有历史意义的增资获得通过，使世行能在未来数十年保持强势地位。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不断增长，在布雷顿森林机构中的话语权和角色问题仍然摆在桌面上。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成功意味着，无论你喜不喜欢，中国都会影响发展思想。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是由其自身特殊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决定的，因此很难说有一个可以应用于其他地方的“中国模式”。但是，从中国丰富多样的经验中汲取适当的经验教训，对于其他希望实现高增长和快速减贫的国家，无疑将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应该欢迎对其经验进行深入研究，开放有助于了解这些经验的数据和档案。

世界银行集团应该张开双手拥抱中国的贡献，帮助世行客户国从中学习借鉴。世行与中国伙伴关系的巨大优势在于它所采取的合作方式不囿于意识形态的束缚。相反，世行采取了务实的做法，同中国合作解决眼前的问题与挑战，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做出调整。邓小平在1978年对改革开放提出的指导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仍然适用于今天的发展。

第二部分

中方的思考



198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

双方合作与时俱进不断迈上新台阶

杨少林³⁰

在 21 世纪头十年结束之际，2010 年中国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这标志着中国与世行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显示出中国对世界银行集团的贡献不断增大，中国已于 2007 年下半年成为国际开发协会捐款国。因此，2010 年增资体现出世行与中国伙伴关系的发展演变，也展示了中国从国际开发协会借款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融资与知识重要贡献国、国际开发协会重要捐款国和世界银行集团重要股东国的华丽转身。



2010 年 4 月 25 日，中国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

在过去 30 年里，我有幸参与和见证了这一发展演变进程。作为世行高层管理团队的一员，这是我第三次在世行任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曾任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顾问，从 2009 至 2013 年任中国执行董事。通过在中国政府和世行任职，我亲历了这一伙伴关系的发展演变，在这篇短文中谈谈我的心得感悟。

30 杨少林，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此前曾任中国财政部国际司司长、2009 年至 2013 年任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

伙伴关系互利共赢不断演进

这么多年来，令我感受最深的是世行和中国政府都具有加强合作关系的强烈愿望。通过世行的平台，中国促进了国内的改革开放，与此同时也以其发展经验和资源，丰富了世行与借款国的合作。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对世行的贡献以及同世行的联合投资产生的杠杆效应，进一步优化了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资源，显著提升了发展效率和效益。我认为，双方合作的性质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而演进的过程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 中国与世行集团的所有成员机构合作，与不同机构合作的性质及分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中国与世行的合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与国际开发协会的合作。后来，在80年代中期，中国被划入中等收入国家类别，从而转向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合作，成为主要借款国，硬贷款规模快速扩大，到90年代中期达到巅峰。在本世纪头十年，我们看到国际金融公司对华业务开始扩大，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今。这个演进过程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包括私营部门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发挥更大作用是一致的。国际金融公司扩大对华业务，也有助于平衡其自身投资组合的风险与回报。
- 近十年来，在“走出去”战略的影响下，中国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合作日益密切。近年来，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涉及中国投资者的案件数量逐渐增加，这是中国对外投资不断增长的必然结果。中国企业是世行项目招标采购中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也证明中国企业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能力不断增强。
- 合作对双方都有益。世行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也引进国际经验、全球知识、管理经验和专业技能。中国与世行的资金和知识合作反过来又有助于维护金融可持续性，丰富世行的知识研究和经验案例库。
- 通过与世行的合作，中国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也回报国际社会。在这个方面，2007年国际开发协会第15轮增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作为中国首位国际开发协会代表，有幸参加了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闭门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做出第一笔捐款承诺。从那时以来，在每一轮增资中，中国都大幅增加捐款数额，例如，去年中国承诺在第19轮增资中捐款12亿美元，比第18轮增资时的捐款额增加了一倍。

合作植根于知识交流

从一开始，我们的合作就植根于知识交流。我的前财政部同事杨英明将在他的文章中着重阐述知识合作的前景。我只想强调一点，我们双方的伙伴关系自始至终都建立在知识合作的基础上。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和1993年的大连会议是早期知识合作的里程碑，对中国后来的改革轨迹产生了深远影响。《2030年的中国》联合报告秉承这一传统，论述了中国到2030年之前面临的经济机遇与挑战，在过去十年为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在2012年2月这个报告发布时，我任驻世行中国执董，报告围绕中期发展增长路径提出建议，有助于中国成功实现转型，迈向高收入社会。

按照《2030年的中国》的方式，双方近年来围绕城镇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增长新动能等主题，成功开展了多个联合研究项目。罗兰德的文章对此已有详细描述，我就不再重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世行与中国的合作实现突破，转变为双向交流。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经验丰富了世行的发展理论与实践。多年来世行与中国的务实合作不断加强，对双方都实现了双赢。

机动灵活量身打造

最后，我想强调指出，世行之所以能在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它致力于并有能力根据当地实际，快速调整和量身打造业务计划。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是一个能说明这一点的最佳范例。

- 2008年5月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当时我正率团在美国华盛顿参加“世行贷款三年滚动计划”谈判。当日下午我们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刻停止常规谈判，转而同世行、中国执董办和财政部一起商量调整原来的贷款计划，为救灾和重建提供支持。短短两周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正式启动，贷款承诺总额7.1亿美元。
- 这个项目实施了八年，取得了丰硕成果，是世行贷款规模最大、建设内容最复杂的灾后重建项目之一。汶川地震项目也建立了一个创新型灾后重建模式，将恢复重建同振兴发展相结合，兼顾地方实际与发展目标。
- 世行的快速反应和及时支持证明了一句老话：“患难见真情”。

根据我的经验，中方和世行人员都充满激情与奉献精神，希望有所作为。作为世行高层管理团队的一员，我对世行员工的奉献精神更有切身体会。我们双方伙伴关系的成功，应该归功于参与其中的全体同仁的奉献与努力，其中很多同仁也为本书撰文。正是由于全体同仁的激情与奉献，才使得这个机构如此出类拔萃，使得这一伙伴关系如此非同一般，激励我们不断前进，以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灵活性，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服务。

最后，我想对双方所有前任与现任领导和同事表示感谢，他们的知识、成就和遗产为我们奠定了坚实基础。我相信，世行与中国的关系将继续发展，继续以知识为根基，以灵活性和适应性为特点，通过资金与知识合作，通过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和股东国，在世行发挥更大的作用，继续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为丰富全球发展经验宝库做出贡献。



2009年2月，世行向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提供紧急贷款7.1亿美元。

农村综合发展：世界银行项目经验 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和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张文才³¹

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与中国在过去 40 年的合作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回顾我的职业生涯，自 1989 年到中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司（以下简称世行司）工作，31 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建立并加强这一合作。我曾担任过项目官员、处长、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顾问、副司长、司长等不同职务，工作涉及能源、农业、技术援助、政策和国别计划等多个领域，因此能够更深刻地审视中国与世行之间不断变化的、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我个人同世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永远忘不了这个我去过无数次的地址“华盛顿特区西北 H 街 1818 号，邮编 20433”。

当然，像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这一合作也有过高低起伏。随着这一关系的不断演变、中国在世行和全球范围的影响日益扩大，在双边合作中出现观点和看法不同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双边关系面临的挑战包括但不仅限于世行对华贷款的规模和类型，更重要的是中国如何在世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并非是要抹杀迄今为止取得的巨大成就。事实上，总的来说，双方合作是非常成功、互利共赢的。对于中国来说，世行不只是一个资金合作伙伴，世行的知识支持和政策建议也使中国受益匪浅。对于世行来说，中国不只是一个借款国或者国际开发协会捐款国，也是一个可以提供丰富经验的重要发展伙伴。

回顾了我个人与世行的渊源关系之后，我想深入探讨一下在本世纪头十年中国的角色及其与世行的合作，然后着重谈谈我目前所在机构的核心任务农村发展问题，把我的世行工作经验同我目前的工作联系起来。

31 张文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2020 年 6 月前任中国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司长，之前历任财政部和国际金融机构多个高层职位，包括亚洲开发银行中国执行董事和副行长。

21 世纪头十年中国与世行的伙伴关系

在本世纪头十年发生的若干事件显著改变了双方的合作关系。在 2000 财年之前，中国是国际开发协会借款国，同时获得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硬贷款和国际开发协会软贷款。从 2000 财年开始，中国从国际开发协会毕业（丧失软贷款资格），并于 2007 年开始向国际开发协会捐资。在这十年期间，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显著增大，其话语权和代表权也通过世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和随着 2010 年增资而得到提升。到 2010 年，中国在投票权上升后成为世行第三大股东国。2005 年，在国际金融公司支持下，中国发行首支熊猫债券，进一步体现其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杨少林、罗兰德和郝福满的文章对此均有详述，我就不再赘述了。总之，在这个十年里，中国在国际金融和全球发展中的角色逐渐开始改变，随着影响力增大，责任也随之增加。这一转变也在世行与中国合作的性质上反映出来，合作重点从资金援助转向知识转让与资金援助并重，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促进环境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增长。

农村综合发展之路

接下来，结合我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及以往从事相关工作的经历，包括曾负责的世行贷款工作，我想深入探讨一下农业领域的发展问题。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曾有一段时间在财政部世行司负责农业部门的工作。在那期间，我们和世行密切合作，开展了大量综合农业发展项目。这些项目覆盖地域广泛，细致深入。我记得这些项目涉及种植（育种、水稻和棉花生产）、养殖（渔业、肉牛）、农产品加工、涉农服务体系、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特别是在本世纪头十年，中国政府在特定地区采取了精准扶贫方针，目标是使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参见黄育川在本书中的文章）。当然，有了“硬件”之后，也需要促进“软件”也就是人的发展。我们不仅利用世行资金支持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解决公共卫生问题，也为贫困地区的林业发展、清洁能源、自然资源管理和环保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通过把基础设施建设和地方产业发展同人力资源投资和农村生计改善相结合，我们努力开拓综合和可持续的农村发展路径。我为我们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并很高兴目睹世行贷款减贫项目从单一部门转向多部门综合方式，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教育、卫生、人力资本等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从农村发展转向城乡一体化，力图利用改善连通性，通过农业全产业链开发，增加农村地区的商机。世行贷款试点项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在本世纪头十年中国加大扶

贫力度时借鉴了这些知识。近期中国政府和世行合作，通过项目整合涉农资金促进乡村振兴，世行资金采取结果导向型贷款形式，显著扩大了影响，项目成功经验在全省范围推广。本书中郝福满的文章介绍了结果导向型贷款广西扶贫示范项目在这方面的做法。

我目前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的工作延续了我曾从事的农村综合发展工作。近几十年来，我们农发行也非常重视脱贫攻坚，特别是把重点放在支持“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上。农发行扶贫贷款余额 1.5 万亿人民币左右，是中国国内支持农村扶贫的最大银行。农发行也采取综合方式促进农村和农业现代化，部分是从世行学习的宝贵经验：从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开发，到支持改善教育、医疗和环境，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随着中国技术能力不断提高，我们在土地管理、育种、农业耕作、农产品加工等方面越来越多地采用现代先进技术，实现生产率提升和农户增收。

2020 年，中国成功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仍然任重道远，重要的是巩固和扩大脱贫攻坚成果，同时启动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这两项战略之间的顺利衔接并不容易，但核心仍然在于采取综合性农村发展方式，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为基础，利用城乡地区互联互通，为农村地区吸引投资和就业机会，不断缩小仍然很大的生活水平差距。

我们农发行希望与世行以及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我们将提供更多绿色贷款，支持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在如何设计有效适应或缓解气候变化的项目方面，非常欢迎世行提供协助。中国政府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保护与发展规划是开展互利合作的潜在领域。为了实现乡村振兴目标，世行可以和我们合作，在中国农村地区生态环保领域提供援助。通过与农发行等机构合作，世行能够确保其知识和经验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以小额资金投入发挥杠杆效应，实现规模化成果。

农发行还希望和世行合作，借助世行的平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宣传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经验。这种合作最终可以促进三边或多边合作，构建一个合作伙伴网络，共同努力消除地区和全球贫困。实际上，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在农村和农业发展领域，世行与中国已经同非洲、中亚、南亚、中东北非等地区的世行借款国建立了坚实和成功的知识共享伙伴关系，也包括在 2015 年为此目的设立的中国 - 世行伙伴基金支持下开展交流。

最后我想讲的是，作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中国自身仍面临挑战。为了实现到 2035 年以及到本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的远景目标，中国需要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我相信，世行能够继续为这一进程做出巨大贡献。我也相信，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国也能够为世行、为地区乃至全球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支持中国在 2015 年《巴黎协定》 下为减排做贡献

陈诗新³²

当今世界面临最严峻的发展挑战之一，是如何既要帮助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要持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中国在这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技术进步使中国有可能跨越发达国家的碳密集型发展路径，并为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树立一个典范。中国绿色发展之路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世界银行集团（以下简称世行）可以在这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2013 年至 2016 年，我担任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期间的 2015 年，在巴黎召开的缔约方会议通过了《巴黎协定》。2016 年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马年会上，世行承诺到 2020 年贷款资金中至少 28% 要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在此背景下，我的这篇文章侧重于讨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在支持中国走绿色发展道路中的作用。

32 陈诗新，2013 年至 2016 年任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此前在中国财政部任职，现任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承诺的重大意义

中国在其国家自主贡献中的有关气候承诺对《巴黎协定》的达成和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支持巴黎气候大会的讨论，中国2015年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提出了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这一承诺对《巴黎协定》的达成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2020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表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12月12日³³，习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中国传递出的这一强烈信号，表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施《巴黎协定》中的立场，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有些人称其为“改变游戏规则的行动”。中国正在认真履行这项承诺，继续推动绿色、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深化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

实施的挑战

传统发展模式很难兼顾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双重目标。必须从以往只追求发展数量转向注重高质量发展，制定高质量发展的新计划和新战略，推动体制改革，加大公众宣传。各级政府需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领域，特别是在能源供应和使用方面，加强监测评估，加大相关政策实施力度。

发展模式的转型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根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的研究，要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资金总需求约为139万亿人民币，每年平均约需3.5万亿人民币（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6%左右。这需要一个综合的气候融资计划，包括动员政府和私营资源，创造条件吸引和扩大气候变化融资。

33 气候雄心峰会是在2020年10月28日举办的“中国与世行合作40周年线上纪念座谈会”之后召开的，鉴于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重要性与其一致性，特增加此段落作为参考。

与此同时，政府监管和执行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能力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在地方层面和农村地区。中国贫困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大致相当于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帮助这些地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支持其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目前清洁能源技术成本依然过高。与化石燃料相比，太阳能、风能等绿色能源的竞争力不断提高，但是绿色能源的初始成本更高。有些清洁低碳技术，比如氢燃料、碳捕获和储存在商业上尚不可行。高昂的技术成本使企业和地方政府对投资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的积极性不高。

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大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巨大，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因此下降了8%，但这一下降对实现全球温升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的目标微不足道。随着疫情得以控制，经济开始复苏，预计温室气体排放量会再度反弹。因此，当务之急是在疫后复苏中更加重视绿色增长战略，克服疫情对政府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从而增加气候融资可用资源。

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

中国与世行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着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早在利马年会之前，双方就已开始深度合作。例如，1992年，世行给中国提供技术援助，制定产业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和有关减排政策。2012年，世行国际金融公司为中国节能减排融资项目提供资金，撬动私营部门参与节能投资。2014年，世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的旗舰报告，就城市绿色发展提出了详细建议。

利马年会是中国与世行气候变化合作的一个里程碑。年会期间世行理事会批准了世行《气候变化行动计划》（2016—2020），目标是到2020年把世行贷款项目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投资从21%提高到28%，并要求世行帮助各国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政策，撬动私营部门投资，加大气候行动力度。根据这个行动计划，中国和世行密切合作，将贷款项目重点转向应对气候变化。例如，2016年，世行批准了两个结果导向型贷款项目：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融资创新项目和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项目，贷款总额10亿美元。这两个项目把重点放在节能、可再生能源和排放控制上（参见本书中郝福满的文章）。这两个项目的实施，为2013年至2019年京津冀地区PM_{2.5}浓度降低35%并远远超过25%的政府目标做出了积极贡献。京津冀项目仍在实施，贷款资金还有三分之一尚未支付，但已超额15%完成了年减排二氧化碳240万吨的目标。

令人鼓舞的是，世行2020至2025财年对华《国别伙伴框架》旨在从战略高度支持中国实现更加绿色的发展，并确定了五个重点领域：推动低碳能源转型、减少空气-土壤-水-海洋塑料污染、支持可持续农业发展、改善自然资

源管理、支持低碳交通与城市。

在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国别伙伴战略 2021—2025》中³⁴，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成为该战略的支柱之一。我认为，在未来几年中，国际金融机构还将继续加大对中国实现其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的支持，“低碳”和“净零碳排放”将成为国际金融机构对华援助的关键词。

随着全球从新冠疫情中逐步复苏，国际金融机构可以在帮助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重建更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场危机导致投资骤减，因此公共投资可以在加快复苏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2020年已经这样做了）。随着公共投资的增加，加快清洁能源转型投资的机会窗口也会随之出现。数字化经济的发展也将激励创新、提高效率，从而促进低碳产业发展。

曾经有些人担心向绿色增长转型可能会导致就业机会减少。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根据亚行最近的分析，与投资化石燃料相比，发展可再生能源创造的就业机会多2.8倍，投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创造的就业机会多14.7倍。国际金融机构可以通过知识分享和专业技能引进，帮助各国实现这些新的就业机会。

展望未来，国际金融机构可以在以下方面帮助中国实现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

一是知识合作。国际金融机构拥有顶级专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积累了大量项目经验，有其独特的优势，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出政策建议、提供专业指导。中国虽然已取得巨大的技术进步，并在某些绿色技术上已实现全球领先，但还有不少方面需要从全球知识合作中汲取营养。比如，如何减少建筑物的碳足迹和规划绿色城市，实现低碳出行，开发绿色金融市场，提升农业可持续性，规划能源体系从而更高效地整合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等。国际金融机构也可以支持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与别国的分享。例如，中国、世行和非洲国家共同举办的“对非投资论坛”已成为中非分享清洁能源发展知识和创造投资机会的一个重要平台。

二是制度和能力建设。中国政府始终把能力建设放在优先位置，《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也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国际金融机构在技术援助能力建设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中国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制度和能力建设有待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商业化和并网，综合数据系统建设，监测和质量控制，碳排放交易市场等方面都可以通过技术援助，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在过去40年的合作中，培训和能力建设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直到今天，培训和能力建设对于帮助中国实现其有雄心的气候目标仍有价值。

三是新技术和新兴技术投资。我认为，新技术和新兴技术将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些技术往往需要大规模的初始投资，可能还面临巨大

34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国别伙伴战略 2021—2025：促进高质量绿色发展》于2021年3月9日获得亚行董事会批准。

风险。国际金融机构在支持中国加快采用新技术和新兴技术方面可发挥独特作用，包括提供长期融资以解决初始投资成本高的问题，以及减少商业机构不愿意承担的投资风险。

四是农村地区和小城镇提供更多的直接投资。随着中国政府“美丽乡村建设”计划和“乡村振兴”计划的开展，农村地区和小城镇有可能吸引更多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能源供给、互联互通、环保和市政服务等。这些投资在帮助中国实现新的气候目标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因此需要根据“重建更好未来”的要求推动绿色发展。为此，国际金融机构可以农村低碳和零碳发展为目标，优先支持中国农村地区和小城镇。

五是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所有国家都应积极参与并采取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在中国宣布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激励下，国际社会期待与中国开展更多的气候变化合作。国际金融机构可以积极支持这方面的努力以确保实现碳减排目标。世行可积极发挥其影响力，召集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协同一致，加强南南合作，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中亚以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及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的议程。

综上所述，国际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加强长远战略构想，制定全面行动计划，诸如世行《气候变化行动计划》(2016—2020)，大幅增加金融资源和提升知识能力。国际金融机构还应加强与利益攸关方的广泛合作，在城市和农村，开展与大公司、中小微企业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合作，全面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中国与世界银行的知识伙伴关系： 鉴往知来

杨英明、叶玉³⁵

世界银行向“知识银行”的演变

长期以来，世界银行一直是国际发展领域主要的智力参与者，至少从1978年世行开始发布《世界发展报告》以来即是如此。不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时任世行行长詹姆斯·D·沃尔芬森任期内，世行才明确提出建立“知识银行”³⁶的设想。这是80年代后期世行在负债国家推行结构调整方案遭到外界激烈批评后，进行全面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按照这一新设想，世行打算将自己重新打造为一个更具响应性和灵活性的“知识捐客”，以更好地为成员国服务。为了完善知识管理网络，促进知识的创造、捕获、传播和分享，世行实施了“去中心化”改革和其他机构重组措施。有建议认为，在政策框架薄弱的国家，世行应集中精力提供知识和技术援助而不是贷款³⁷，把有效的知识分享作为衡量世行成功与否的一项最重要的指标³⁸。

从那时以来，“知识银行”的使命传承至今。在本世纪头十年后期，时任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任期间发起了“开放知识”的计划，他的继任金墉提出了“解决方案银行”的新设想，将关注点放在利用和提供高质量的、量身定制的知识上³⁹，并开展了新一轮机构重组，目的是建立“一个世界银行集团”，更有效地发挥交付知识的职能作用。

35 杨英明，目前任中国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司长，2016年6月至2020年7月任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2007年8月至2009年8月任副执行董事，2009年9月至2012年10月任驻亚行中国执行董事。

叶玉博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特别是多边开发银行有关问题。

本文作者从以下人员的意见中受益匪浅，包括郭文松、黄会平、王勇、张敏文，均为长期参与中国与多边开发银行合作的实际工作者和（或）研究人员，并感谢芮泽先生提出的深刻见解，作者对本文负全责。

36 时任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于1997年9月23日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的1997年年会上的讲话《包容的挑战》。

37 《定位世界银行》，克里斯托弗·吉尔伯特、安德鲁·鲍威尔和戴维·韦恩斯，《经济学杂志》，1999年11月，109卷（459），598—633页。

38 世界银行《世界银行知识分享与再利用激励框架》，世界银行，2019年，<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2624>。

39 时任世界银行行长金墉于2012年10月9日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世界知识论坛上的讲话《交付发展：利用知识构建繁荣和减少贫困》<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speech/2012/10/08/delivering-development-harnessing-knowledge-build-prosperity-end-poverty>。

在本文中，我们聚焦世行与中国的知识合作，原因有二：第一，知识从始至终都是双方伙伴关系的核心，本书前面的文章已有充分论述。第二，本文作者之一杨英明任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时，恰逢世行最新 2020 至 2025 财年对华《国别伙伴框架》定稿，这一文件提出，双方的伙伴关系将朝着更加重视知识共享的方向发展，包括同世界其他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

中国与世行的伙伴关系彰显互学互鉴的艺术

发展知识共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自 40 年前中国恢复在世行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与世行建立了非常成功的、互利共赢的知识伙伴关系，也体现并激励了其他国家的类似努力。这一成功故事有广泛的文献支撑，究其原因可归结为三对微妙平衡关系的把握。

一是外援与内需的关系

大家普遍认为，外援的重点必须与客户需求（内需）不断变化的重点保持一致。知识伙伴关系的重点和成功的关键是，其不仅应反映世行认为紧迫的议题，也应反映客户的需求，这样才能保证客户的内部主导权。否则，客户可能被迫采取在理论上完全正确但在实践中难以实施的政策。令人庆幸的是，中国与世行的伙伴关系始终遵循以下四项原则和做法，即相互尊重、相互倾听、相互学习及互利互惠。世行作为外部知识提供者，协助中国解决关键领域的改革瓶颈问题，而中国牢牢把握内部主导权。

二是硬周期与软周期的关系

世行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开始于通过相对简单的项目共同创造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项目的规模越来越大，设计越来越复杂，旨在通过试点促进改革 40，从而建立了一个将贷款项目（硬）周期同知识（软）周期相结合的“四合一”模式：（1）知识产品先行，找到解决改革瓶颈问题的备选方案；（2）通过贷款项目，对甄别和高定的备选方案进行试点；（3）通过投资项目的实施积累创新经验；（4）推广创新经验扩大发展影响。要实现这两个周期之间的协同效应最大化，就必须改变思维方式，把创新置于合作的核心位置。贷款项目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但主要不是为了获得贷款资金，而更多是为了有效发挥对借款方的撬动作用，鼓励他们进行创新。因此，贷款项目成为鼓励借款方试点新想法、取得具体成果的平台。

三是顶层设计与基层经验的关系

减贫有没有一个最佳模式？减贫需要的是顶层设计，还是来自基层的第一手经验？2004 年世行与中国在上海共同召开的全球扶贫大会试图回答这个问

题。大会不是把发展作为一门准科学对待，而是作为一门艺术来呈现，主角是负责项目实施的足智多谋的项目经理，特点是由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工作者介绍基层减贫案例。大会的成果强化了一个信念，即，成功减贫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草根经验，来自田野的案例有助于丰富发展思想，形成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考虑到这一点，世行需要在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更多案例研究，从成功案例中寻求有益的实践做法。这是为南南学习交流寻找具有说服力的典范的捷径，也有益于中国与世行的伙伴关系。当然，这需要辅以对成功案例的赋能环境进行数据驱动型的分析。

世行在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经验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与世行的知识伙伴关系始终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而不是单向的指导关系，这非常有助于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知识。2004年的全球扶贫大会是一次极为重要的知识分享过程，包含案例研究开发、虚拟学习、田野考察和面对面开会，中国经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分享中国发展经验的平台有很多，但世行无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世行是最先向世界广泛介绍中国经济特区经验的机构之一，而经济特区的本质就是“先试点后推广”。根据我们自身的经验，试点项目是协调整合资金与知识转让、以渐进方式稳步推进政策改革和能力建设的有效平台。通过“先试点后推广”，世行、中国和国际社会可以共同努力扩大借款国的政策空间，确保采取立足各国国情的发展方式，着眼于自身存在的制约因素，而避免以教条主义方式对待国际经验。中国的试点做法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一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地区之间有很大差异，因而具备足够的试点空间和需求。二是中国总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对试点进行调整，并对试点结果进行评估，成功就推行不成功就放弃。这种务实的做法至关重要，却往往被忽略。

未来方向

全球和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我们需要继续“边干边学”，以便战胜新挑战，把握新机遇。为了使知识伙伴关系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我们认为以下要素至关重要：

第一，相互信任是建立真正平等的发展伙伴关系的关键。信任是任何知识分享最为重要的因素，因为该分享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正如前面很多文章所述，中国与世行伙伴关系的成功始于相互信任，这使得双方能够共同应对许多发展挑战，并取得巨大成功。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双方需要维护这种宝贵的相互信任。同样，信任对于所有其他发展伙伴和参与伙伴关系的利益攸

关方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样才能客观地收集、分析和传播中国的发展经验，世行才能继续帮助中国确定优先重点，提出应对新挑战的建议，并密切关注其历史背景和全球意义。

第二，需要采取综合方式提高同行学习成效。在这方面，世行针对各种形式的知识交流活动采取的结构性的做法可以有所助益。世行可以围绕中国发展经验开展更多案例研究以及数据驱动型分析，将其理论化，转化为可供全球借鉴的“显性知识”。中国也可以通过帮助收集数据，改进“反馈循环”，从而发挥重要作用。可以促进世行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增加人员交流，推动世行员工与发展中国家实际工作者积累的“隐性知识”的交流。与此同时，世行政策、程序 and 实践中蕴含的知识也应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应加强采用根据具体国情的做法，鼓励借款国“边干边学”。中国和世行还可以对采用中国成功试点做法的项目进行联合融资，使借款国能够学会“先试点后推广”，根据情况变化创新发展理念。

第三，为了促进有效的相互学习，也为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世行仍需要获得第一手的中国经验。世行应继续向中国等较高收入国家提供知识支持和贷款服务，从而能够不断积累第一手的经验，获得第一手的数据。这些国家也能够继续从双方伙伴关系中受益，进而提升创新能力，提供更多的全球公共产品。为此目的，应该进一步发挥世行新型贷款工具的效应，比如2016年中国引进了结果导向型贷款工具，以推广创新理念，在实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除了广为宣传的期限较长的联合旗舰研究项目（本书其他文章中已有详尽论述），世行也可以考虑在提供解决眼前问题所急需的短期研究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以帮助决策者及时采取行动，从而也加大世行知识支持的吸引力。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世行需要改进内部激励机制，更好地鼓励知识分享活动。作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知识分享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工作，要求员工同时兼具能力和意愿。从能力来说，世行员工采用“脚手架”的方法尤其重要，就是以所在国已有知识为基础，利用其自身文化和知识来影响学习过程，而不是以“一刀切”的方式推行外来方案⁴¹。机构文化也很重要，世行最近所做的一次问卷调查发现，80%以上的员工认为他们的知识分享职能受到一系列结构性障碍制约，比如缺少正规培训机会和社会规范、不与绩效考核挂钩因而缺乏能见度、个人主导权和同行压力、时间有限等等⁴²。世行需要继续努力，鼓励和赋能员工把知识分享作为提升发展效力的重中之重。

41 唐·科恩和布鲁诺·拉波特《知识银行的演变》，KM杂志，2004年3月期，www.kmmagazine.com。

42 世界银行《世界银行知识分享与再利用激励框架》，世界银行，2019年，<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2624>。

结束语



2016年启动的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创新融资计划支持企业投资于能效、可再生能源和空气污染末端治理，减少碳排放，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贡献。

中国与世行合作 40 周年反思

王忠晶：⁴³

我很荣幸应邀为中国与世界银行集团合作 40 周年撰写结束语。过去 40 年不仅见证了中国与世行丰硕的合作成果，也见证了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到上中等收入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历程。这一非凡成就也给我们的个人职业生涯留下了印记。本书的很多作者把自己为世行与中国合作所做的工作看成是个人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所有文章无不体现出奉献与激情，希望这将成为我们未来的灵感源泉。

我想就过去 40 年对我们未来合作的启示，谈三点看法作为结束语。

一是坚持我们的合作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保持高度一致，一如过去 40 年那样。正如本书多位作者所说，我们的合作之所以成功，原因是世行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环境调整对华合作战略重点。由于中国政府强有力的主导与承诺，合作项目层面的“硬件”建设，逐渐发展到体制机制改革层面的“软件”开发。但是，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短板弱项，世行可继续在相关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相关合作经验仍具有全球意义。所以，中国非常重视坚持 2019 年通过的世行对华《国别伙伴战略》确定的贷款规模。同时，双方应努力不断提高贷款项目的附加值，创新和示范新方法、新解决方案，应对中国仍然面临的发展挑战。

二是利用中国的发展经验，通过知识合作推动全球发展。40 年来，世行作为一个真正的全球知识银行，中国从中受益匪浅。希望世行未来继续发挥好国际发展经验传播者的重要作用，持续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等前沿领域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中方也欢迎世行继续积极总结中国在脱贫攻坚、优化营商环境等领域的良好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在这方面，我们高度重视继续加强在其他地区的合作，特别是非洲地区，希望继续加强在对非投资论坛等领域的合作，介绍中国经验和中国投资者，推动非洲国家的减贫和经济发展。

三是构建富有活力和韧性的、稳健的合作伙伴关系。正如其他同事所述，双方合作时常面临着起起伏伏，但我相信，正如罗兰德在文章中所言，只要我们合作，我们就能做得更好。40 年来，面对各种阻力压力，中国与世行总能展现大智大勇，推动双方合作关系行稳致远。受新冠肺炎疫情疫情影响，当前世界经济低迷，国际经济、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但疫情也显示出，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际合作。中国将继续坚定奉行多边主义，坚持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以此作为建立共识、实施合作解决方案的重要平台。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43 王忠晶，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首席执行官，中国与世行合作 40 周年纪念活动之际在中国财政部国际司任司长。

为中国经济开辟空间，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动力。希望双方继续共同努力，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国际发展合作贡献积极力量。

我在 2021 年初撰写此文时，正值中国完成“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将指导中国短期和中期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中方欢迎世行结合中方发展战略，秉持友好合作精神，不断深化双方 40 年来建立的关系，为实现“消除贫困、共享繁荣”的双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承前启后书写伙伴关系新篇章

常军红：⁴⁴

值此中国与世界银行集团合作 40 周年之际，我能分享一些想法，深感荣幸和兴奋。本书收录的文章是重要的历史记录，也是对形成世行与中国之间特别伙伴关系的各种因素的思考。正是由于双方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与奉献，才使我们取得了重要成就，建立了强有力的、真正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首先我向在过去 40 年共同创造了中国与世行合作历史的所有世行同事和财政部前辈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世界快速发展演变，相比 40 年前，世界格局已发生巨变。现在是时候在更广泛的框架内审视和推进双方的伙伴关系，建立中国与世行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论述。

一是在更广泛的全球大背景下塑造我们的战略伙伴关系。展望未来，中国与世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方。中国仍然需要利用世行的知识和资金来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世行也需要利用中国的发展实践和经验来丰富自身的知识库。我认为，世行如果不能解决中国这个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挑战，就会在许多借款国眼中丧失合法性和相关性。另一方面，随着从借款国向主要股东国、新兴捐款国和发展知识重要来源的角色转变，中国愿意在世行承担起更大的责任，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对发展理念的贡献，在全球发展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是创新合作领域和合作工具，丰富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传统的合作领域和工具是不够的。根据世行 2020 至 2025 年对华《国别伙伴框架》，双方的合作旨在推进更加绿色、公平和包容性发展，促进市场和制度改革。保持适当的贷款规模仍然是必要的，通过支持创新试点项目和示范改革成功经验来实现上述目标。此外，可能也需要采取新的合作形式来扩大影响面，包括联合融资和多方合作以及新型贷款工具，比如发行绿色债券和采用其他增信方法。探索合作新路径，以有限的资金产生大范围的影响，也有助于世行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关系。

我承认目前我们的关系遭遇些许逆风，有些世行股东国希望世行在资本金有限的情况下加快缩减对华贷款规模，还有一些股东国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影响力与日俱增感到不适。本书收录的文章证明，在我们的伙伴关系中，包括政治或地缘政治争议在内的各种争议并不新鲜。我坚信过去 40 年卓有成效的合作实践会帮助我们克服这些阻力。我相信只要同心协力，我们就能书写中国与世行战略伙伴关系的新篇章，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⁴⁴ 常军红，驻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2020 年 8 月上任，此前在中国财政部任副司长等职。

继往开来推动伙伴关系行稳致远

维多利亚·克瓦：⁴⁵

本书收录的个人回忆与思考，内容丰富，反映了中国举世瞩目的发展历程：中国从一个贫穷、以农村为主、中央计划但管理不善的经济体，转变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政策和行动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我想在此分享几点阅读这些文章的心得，但首先我要向在过去40年为世界银行与中国建立如此特殊关系做出贡献的所有同仁、向与我们和广大读者慷慨分享他们的故事的各位作者致敬。

不断发展与调整的伙伴关系

这些文章清楚地说明了世行与中国的对话重点发生了哪些变化，而随着这些变化，双方的伙伴关系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这一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候世行协助中国与外界重新建立联系。林重庚的文章介绍的巴山轮会议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反映了世行在合作初期针对中国面临的主要改革挑战促进政策讨论和引进国际经验中所起的作用。伯基、鲍泰利和霍普的文章提到的大连会议真正推动了宏观经济改革、汇率并轨，引进了现代经济管理理念。这些文章也说明在那个阶段世行贷款计划如何呈爆炸式增长，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年贷款额猛增10倍。伯基的文章提到世行贷款项目引进的国际竞争性招标采购帮助中国实现了自身项目管理能力的现代化。到本世纪头十年，世行开始重视并致力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不平等和环境退化问题，杜大伟的文章提到黄土高原项目，这个项目在半干旱地区解决农业灌溉问题，通过大规模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也对空气质量带来积极影响，给很多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黄育川的文章论述了如何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中国落后地区发展。近十年来，双方合作重点日益集中在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和作用以及通过世行中国伙伴基金分享中国的知识经验上。

世行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业务计划的能力，使其得以始终保持相关性。我的同事王忠晶和常军红在结束语中明确表示，中国仍然把世行看成是破解国内改革挑战和发展制约因素的一个合作伙伴，看成是帮助与其他国家分享中国经验的一个平台。与此同时，中国的收入水平上升，意味着对世行贷款资金的需求比过去减少，应注重利用世行贷款产生大范围的影响。郝福满的文章很好地描述了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世行贷款计划如何将重点从“围栏式”改革试点和示范项目，转向结果导向型贷款等新型贷款工具，瞄准最重要的发展挑战——污染防治、减贫、推广医疗卫生改革经验，并撬动大量预算资金和社会资金。新的2020至2025财年对华《国别伙伴框架》延续了这一趋势，将重点放在全球公共产品上，通过正在实施以及规划中的新项目支持中国加快低碳经济转型，治理海洋塑料和水污染，改善食品安全，防范新发传染病风险，保护生物多样性

⁴⁵ 维多利亚·克瓦（Victoria Kwakwa），世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副行长，此前担任越南局局长，并曾在世行担任其他多个领导职务。

和丰富的生态系统。这一重点转移与中国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视高度一致。因此，世行对华业务计划目前正在经历新一轮转型，虽不像上一轮转型那么具有挑战性，但可以说同样意义重大，对双方都有很多启示。

建立在信任与尊重基础上的伙伴关系

在双方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演变的同时，有三个要素始终未变，那就是相互信任和彼此尊重，相互学习的意愿，致力于寻找基于证据和试点经验的务实解决方案。正如本书中多篇文章所述，有些时候贷款业务陷入停顿，原因可能是在优先重点或者世行规则应用上双方没有达成一致，但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尊重总能帮助我们度过难关。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沾沾自喜，最近世行贷款计划重点向全球公共产品转移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我们还需要积极争取地方政府支持，地方政府历来是世行项目主要的实施伙伴。我们也必须牢记中国存在的巨大地区差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调整项目设计。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撬动中国自身的预算资源，扩大项目在全国范围的影响。从全球来看，我们双方还需要在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包括债务透明度和环境与社会良好做法在发展金融中的应用。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坚持多年来建立的相互信任和彼此尊重，保持定期的坦诚对话，推动强大的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在这方面，我想强调指出世行员工和中国财政部官员在关键时刻为推动双方伙伴关系向前发展所起的作用。没有他们的努力、勇气和聪明才智，我们就无法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建立在许多个人关系和友谊基础上的集体努力，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对过去和现在参与这一令人兴奋的征程的全体同仁，我想表示最深切的感谢。

促进国际合作的伙伴关系

当我们思考如何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疫情带来的巨大挑战之际，我们深知必须在我们共同的征程上继续走下去。显而易见，如果没有中国在全球多边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就无法应对气候变化，防范未来的流行病风险，解决我们许多借款国面临的债务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等问题。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体量决定了中国继续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我们所有人的根本利益，世界银行集团将继续致力于这项事业。

让我用一个中国成语作为结束语，“继往开来”。在我们40年合作经验的基础上，在文章作者们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的基础上，让我们再接再厉，继往开来，让我们的伙伴关系行稳致远。

作者简介

前言



阿克塞尔·冯·托森伯格

阿克塞尔·冯·托森伯格 (Axel van Trotsenburg)，世界银行运营常务副行长，历任世行多个高层职位，2014年至2017年任世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副行长，在任期间监督世行对华贷款显著加大对气候变化和国内改革重点难点的支持力度。



邹加怡

邹加怡，2018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副部长。2009年至2015年期间曾任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司长，2015年晋升财政部部长助理，2005年至2009年任驻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1999年至2000年任驻世行中国副执行董事，1998年至2000年任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办公室顾问。

引言



芮泽

芮泽 (Martin Raiser), 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 接替郝福满担任现职。来华之前, 芮泽在世行不同地区任国别局局长, 职业生涯初期曾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研究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转型。

第一部分：中国与世界银行四十年合作历程



凯奥·科赫-韦泽

凯奥·科赫-韦泽 (Caio Koch-Weser), 1977年至1980年任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个人助理, 1980年至1986年任世行首任中国处处长, 之后任世行副行长、常务副行长, 1999年返回德国任财政部副部长。



林重庚

林重庚 (Edwin Lim), 1980 年至 1985 年世界银行中国事务首席经济学家。1985 年至 1990 年任世行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 之后曾任世行西非局局长、印度局局长等职, 1994 年至 1996 年, 从世行请假, 领导组建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国首家国际投资银行), 任首任总裁。



贾维德·伯基

贾维德·伯基 (Javed Burki), 1987 年至 1994 年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 1994 年任世行拉丁美洲地区副行长, 与中国的关系回溯到上世纪 60 年代, 受巴基斯坦政府委托研究农业生产问题。



鲍泰利

鲍泰利 (Pieter Bottelier), 1993 年至 1997 年任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 在世行工作 28 年期间历任多个职位, 如拉丁美洲和北非地区局长、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任亚洲副行长高级顾问等职, 从世行退休后的近 20 年时间里, 在美国各大学讲授中国经济与改革课程。



尼古拉斯·霍普

尼古拉斯·霍普 (Nicholas Hope), 1994 年至 1997 年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 2000 年从世行退休后任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 继续保持与中国的密切联系, 曾接待多位中国政府官员开展中国政策改革研究。



黄育川

黄育川 (Yukon Huang), 1997 年至 2004 年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 此前任世行俄罗斯及前苏联局局长, 中国政府与世行《2030 年的中国》联合报告首席顾问, 现任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研究重点为中国经济及其区域和全球影响。



杜大伟

杜大伟 (David Dollar), 2004 年至 2009 年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 历任多个世行职位, 包括发展经济学部发展政策局局长, 从世行离职后, 2009 年至 2013 年任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 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 研究重点为中国经济和美中经济关系。



罗兰德

罗兰德 (Klaus Rohland)，2010 年至 2014 年任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此前在世行历任多个职位，包括越南和俄罗斯国别局局长。



郝福满

郝福满 (Bert Hofman)，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2014 年至 2019 年任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

第二部分：中方的思考



杨少林

杨少林，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此前曾任中国财政部国际司司长、2009 年至 2013 年任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



张文才

张文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2020年6月前任中国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司长，之前历任财政部和国际金融机构多个高层职位，包括亚洲开发银行中国执行董事和副行长。



陈诗新

陈诗新，2013年至2016年任驻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此前在中国财政部任职，现任总部设在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



杨英明

杨英明，中国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司长，2016年6月至2020年7月任驻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2007年8月至2009年8月任副执行董事，2009年9月至2012年10月任驻亚洲开发银行中国执行董事。

第二部分：中方的思考



王忠晶

王忠晶，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首席执行官，中国世行合作 40 周年纪念活动时在中国财政部任世行贷款项目评估中心主任。



常军红

常军红，驻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2020 年 8 月上任，此前在中国财政部任副司长等领导职务。



维多利亚·克瓦

维多利亚·克瓦（Victoria Kwakwa），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副行长，此前担任世行越南局局长，并曾在世行担任其他多个领导职务。

世界银行对华贷款项目 1981—2021 财年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1981					
大学发展项目	100.00	100.00	200.00	06/23/81	06/30/86
小计	100.00	100.00	200.00		
1982					
华北平原农业项目		60.00	60.00	06/15/82	12/31/87
小计		60.00	60.00		
1983					
三港项目	124.00		124.00	11/02/82	06/30/88
农村教育科研项目		75.40	75.40	11/02/82	03/31/89
第一工业信贷项目	40.60	30.00	70.60	12/21/82	12/31/88
大庆石油高台子油层发展项目	162.40		162.40	01/25/83	06/30/90
中原文留石油项目	100.80		100.80	03/29/83	12/31/90
黑龙江农垦项目	35.30	45.00	80.30	04/19/83	03/31/89
小计	463.10	150.40	613.50		
1984					
职大和电大项目		85.00	85.00	09/13/83	06/30/92
技术援助项目		10.00	10.00	09/13/83	12/31/88
橡胶发展项目		100.00	100.00	11/29/83	12/31/90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鲁布革水电项目	145.40		145.40	02/21/84	06/30/92
第一铁路项目	220.00		220.00	03/27/84	12/31/90
第一农村信贷项目		50.00	50.00	04/24/84	06/30/89
农村卫生和医学教育项目		85.00	85.00	05/08/84	12/31/91
克拉玛依石油项目	100.30		100.30	05/29/84	03/31/91
第二工业信贷项目	105.00	70.00	175.00	06/05/84	06/30/90
第二农业教育项目	45.30	23.50	68.80	06/14/84	06/30/92
小计	616.00	423.50	1039.50		
1985					
农业教育科研项目		25.00	25.00	09/11/84	06/30/92
第二电力项目	117.00		117.00	02/19/85	06/30/92
第二大学发展项目		145.00	145.00	02/26/85	12/31/92
常村煤炭项目	126.00		126.00	03/14/85	12/31/93
种子项目		40.00	40.00	04/11/85	12/31/90
农村供水项目		80.00	80.00	04/11/85	12/31/91
第一公路项目	42.60	30.00	72.60	05/14/85	06/30/91
第二铁路项目	235.00		235.00	05/14/85	06/30/94
化肥节能改造项目	97.00		97.00	05/14/85	12/31/90
林业开发项目		47.30	47.30	06/11/85	12/31/91
溧史杭 - 巢湖地区发展项目	17.00	75.00	92.00	06/11/85	06/30/92
威远气田技术援助项目	25.00		25.00	06/11/85	06/30/92
小计	659.60	442.30	1101.90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1986					
第二农村信贷项目		90.00	90.00	12/17/85	12/31/91
第三工业信贷项目	75.00	25.00	100.00	03/04/86	06/30/91
第一技术合作信贷项目		20.00	20.00	03/04/86	06/30/94
地方大学项目		120.00	120.00	03/25/86	12/31/92
第三铁路项目	160.00	70.00	230.00	04/15/86	06/30/95
天津港项目	130.00		130.00	05/06/86	10/31/94
淡水养鱼项目		60.00	60.00	05/06/86	06/30/92
北仑港火力发电项目	225.00		225.00	05/29/86	06/30/94
岩滩水电项目	52.00		52.00	05/29/86	06/30/94
辽东湾石油评价和技术援助项目	30.00		30.00	05/29/86	12/31/89
农村卫生和预防医学项目	15.00	65.00	80.00	06/19/86	06/30/96
小计	687.00	450.00	1137.00		
1987					
红壤地区开发项目		40.00	40.00	09/09/86	06/30/92
水口水电项目	140.00		140.00	01/06/87	06/30/93
工业信贷项目四	250.00	50.00	300.00	03/03/87	06/30/93
上海机床项目	100.00		100.00	03/03/87	12/31/93
新疆农业开发项目		70.00	70.00	03/03/87	12/31/94
上海污水项目	45.00	100.00	145.00	04/14/87	12/31/95
京津塘高速公路项目	25.00	125.00	150.00	05/12/87	12/31/95
甘肃发展项目	20.00	150.50	170.50	05/12/87	06/30/96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化肥产品结构改造项目	97.40		97.40	06/16/87	06/30/94
吴泾电厂项目	190.00		190.00	06/23/87	06/30/95
计划援助和专题研究(特别信贷)项目		20.70	20.70	06/30/87	12/31/94
小计	867.40	556.20	1423.60		
1988					
黄埔港项目	63.00	25.00	88.00	10/06/87	12/31/94
第三农村信贷项目		170.00	170.00	01/26/88	06/30/94
大连港项目	71.00	25.00	96.00	02/09/88	12/31/93
北方灌溉项目		103.00	103.00	03/22/88	12/31/97
沿海地区发展项目	40.00	60.00	100.00	03/29/88	06/30/94
教师培训项目		50.00	50.00	05/24/88	12/31/93
中原制药项目	127.00		127.00	05/24/88	12/31/94
四川成渝公路项目	75.00	50.00	125.00	06/09/88	12/31/96
陕西三铜公路项目	50.00		50.00	06/09/88	12/31/94
大兴安岭森林防火及恢复项目		56.90	56.90	06/09/88	03/31/94
北仑港火力扩建项目二期	165.00		165.00	06/14/88	06/30/95
贵州磷酸盐开发项目	62.70		62.70	06/15/88	12/31/95
农调贷款项目	200.00	100.00	300.00	06/23/88	07/31/90
第四铁路项目	200.00		200.00	06/23/88	06/30/98
小计	1053.70	639.90	1693.60		
1989					
宁波-上海港项目	76.40		76.40	12/13/88	12/31/95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厦门港项目	36.00		36.00	12/13/88	03/31/95
江西南九公路项目		61.00	61.00	02/07/89	12/31/95
天津轻工项目	154.00		154.00	02/21/89	06/30/97
陕西农业发展项目		106.00	106.00	03/28/89	06/30/97
教材开发项目		57.00	57.00	04/18/89	06/30/95
综合性区域卫生发展项目		52.00	52.00	05/02/89	12/31/97
内蒙古地方铁路项目	70.00	80.00	150.00	05/12/89	12/31/96
山东农业开发项目		109.00	109.00	05/16/89	12/31/94
湖北磷矿项目	137.00		137.00	05/23/89	03/31/97
山东济青公路项目	60.00	50.00	110.00	05/25/89	06/30/97
第五工业信贷项目	300.00		300.00	05/30/89	12/31/94
小计	833.40	515.00	1348.40		
1990					
华北地震重建项目		30.00	30.00	02/08/90	12/31/92
江西农业开发项目		60.00	60.00	02/27/90	12/31/95
职业教育项目		50.00	50.00	03/27/90	12/31/96
国家造林项目		300.00	300.00	05/29/90	12/31/97
河北农业开发项目		150.00	150.00	06/14/90	06/30/98
小计		590.00	590.00		
1991					
长江中上游农业开发项目		64.00	64.00	08/09/90	12/31/96
第四农村信贷项目	75.00	200.00	275.00	10/30/90	12/31/96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星火项目	50.00	64.30	114.30	12/04/90	09/30/97
三个中等城市项目	79.40	89.00	168.40	01/08/91	06/30/97
上海工业发展项目	150.00		150.00	01/29/91	06/30/96
重点学科发展项目		131.20	131.20	02/26/91	12/31/98
辽宁城建项目		77.80	77.80	03/21/91	03/31/97
江苏交通项目	100.00	53.60	153.60	04/09/91	06/30/96
河南农业开发项目		110.00	110.00	05/14/91	12/31/98
加强农业灌溉项目	147.10	187.90	335.00	06/04/91	03/31/98
小计	601.50	977.80	1579.30		
1992					
二滩水电项目	380.00		380.00	07/02/91	12/31/96
塔里木盆地项目		125.00	125.00	08/29/91	12/31/97
上海市政交通项目		60.00	60.00	09/10/91	06/30/99
第五铁路项目	330.00		330.00	09/24/91	12/31/98
大广坝综合项目	30.00	37.00	67.00	10/31/91	12/31/98
广东农业开发项目		162.00	162.00	11/05/91	12/31/98
北京环保项目	45.00	80.00	125.00	11/19/91	06/30/99
传染病与地方病控制项目		129.60	129.60	12/12/91	06/30/02
偃师火电项目	180.00		180.00	01/14/92	12/31/97
农村供水与卫生项目		110.00	110.00	02/11/92	12/31/98
贫困省教育发展项目		130.00	130.00	03/10/92	12/31/99
地方水泥项目	82.70		82.70	03/17/92	12/31/97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邹县火电项目	310.00		310.00	04/21/92	06/30/99
浙江公路项目	220.00		220.00	05/19/92	06/30/00
天津城市发展和环境项目		100.00	100.00	06/17/92	12/31/00
港口船舶废弃物处理项目		15.00	15.00	06/17/92	06/30/97
小计	1577.70	948.60	2526.30		
1993					
四川农业项目		147.00	147.00	07/07/92	04/30/00
水口水电项目二期	100.00		100.00	09/01/92	12/31/97
财税技术援助项目		60.00	60.00	09/29/92	09/30/02
广东省公路项目	240.00		240.00	11/17/92	06/30/00
河南省公路项目	120.00		120.00	11/17/92	06/30/00
第三技术合作信贷项目		50.00	50.00	12/15/92	12/31/03
上海港结构调整与改造项目	150.00		150.00	12/22/92	06/30/99
长春供水及环境项目		120.00	120.00	02/09/93	06/30/99
农业支持服务项目		115.00	115.00	02/23/93	06/30/01
太湖防洪项目	100.00	100.00	200.00	02/23/93	12/31/01
师范教育发展项目		100.00	100.00	03/16/93	12/31/99
天津工业发展项目	150.00		150.00	03/16/93	06/30/00
浙江城建项目		110.00	110.00	03/25/93	03/31/03
第六铁路项目	420.00		420.00	03/25/93	06/30/01
苏南环保项目	250.00		250.00	03/25/93	06/30/01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300.00		300.00	05/18/93	06/30/02
粮食流通项目	325.00	165.00	490.00	06/17/93	12/31/02
环境技术援助项目		50.00	50.00	06/22/93	12/31/05
小计	2155.00	1017.00	3172.00		
1994					
农村卫生人力开发项目		110.00	110.00	08/03/93	03/31/01
上海市政交通项目二期	150.00		150.00	10/14/93	12/31/00
福建公路项目	140.00		140.00	12/14/93	12/31/03
电信发展项目	250.00		250.00	12/21/93	06/30/00
红壤地区开发项目二期		150.00	150.00	02/03/94	05/31/03
松辽平原农业开发项目		205.00	205.00	02/24/94	06/30/02
上海环境项目	160.00		160.00	03/08/94	12/31/02
四川天然气开发和节能项目	255.00		255.00	03/17/94	06/30/03
扬州火力发电项目	350.00		350.00	03/22/94	12/31/02
小浪底综合发展项目	460.00		460.00	04/14/94	12/31/00
小浪底移民项目		110.00	110.00	04/14/94	12/31/03
黄土高原小流域治理项目		150.00	150.00	05/26/94	12/31/05
森林资源发展和保护项目		200.00	200.00	06/07/94	12/31/01
107 国道项目	380.00		380.00	06/07/94	06/30/00
小计	2145.00	925.00	3070.00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1995					
企业住房与社会保障改革项目	275.00	75.00	350.00	07/05/94	12/31/04
辽宁环保项目	110.00		110.00	07/26/94	12/31/03
新疆公路项目	150.00		150.00	08/30/94	12/31/00
贫困及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项目		100.00	100.00	09/06/94	12/31/00
沈阳工业改革项目	175.00		175.00	09/06/94	06/30/03
经济法改革项目		10.00	10.00	10/18/94	06/30/04
综合性妇幼保健项目		90.00	90.00	10/18/94	06/30/02
浙江电力项目	400.00		400.00	02/28/95	12/31/03
科技发展项目	200.00		200.00	02/28/95	12/31/02
四川输变电项目	270.00		270.00	02/28/95	01/31/04
财税技术援助项目	25.00	25.00	50.00	04/25/95	12/31/02
长江水资源开发项目	100.00	110.00	210.00	04/25/95	12/31/05
第七铁路项目	400.00		400.00	06/01/95	09/30/04
西南扶贫项目	47.50	200.00	247.50	06/15/95	12/31/05
内河航运项目	210.00		210.00	06/20/95	06/30/01
碘缺乏症控制项目	7.00	20.00	27.00	06/28/95	12/31/00
小计	2369.50	630.00	2999.50		
1996					
上海 - 浙江公路项目	260.00		260.00	08/01/95	12/31/01
二滩水电项目二期	400.00		400.00	08/22/95	12/31/01
疾病预防项目		100.00	100.00	12/12/95	06/30/04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劳动力市场发展项目	10.00	20.00	30.00	12/19/95	12/31/05
湖北城市环境项目	125.00	25.00	150.00	12/19/95	04/30/05
河南(沁北)火电项目	440.00		440.00	02/27/96	06/30/03
第三贫困省教育发展项目		100.00	100.00	03/21/96	12/31/01
第二陕西公路项目	210.00		210.00	03/21/96	12/31/02
上海污水项目二期	250.00		250.00	03/21/96	06/30/04
山西扶贫项目		100.00	100.00	03/26/96	12/31/03
饲料项目	150.00		150.00	04/16/96	12/31/01
第二河南公路项目	210.00		210.00	05/30/96	12/31/04
甘肃河西走廊项目	60.00	90.00	150.00	05/30/96	12/31/06
重庆工业污染控制与改革项目	170.00		170.00	06/18/96	06/30/03
种子商业化项目	80.00	20.00	100.00	06/18/96	06/30/03
云南环保项目	125.00	25.00	150.00	06/25/96	12/31/04
小计	2490.00	480.00	2970.00		
1997					
职业教育改革项目	10.00	20.00	30.00	07/02/96	12/31/02
第二新疆公路项目	300.00		300.00	10/10/96	12/31/03
湖南-广东公路项目	400.00		400.00	12/17/96	12/31/04
黑龙江农业发展项目	120.00		120.00	05/13/97	06/30/04
托克托火电项目	400.00		400.00	05/27/97	12/31/05
第四基础教育项目		85.00	85.00	05/27/97	09/30/03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万家寨引黄项目	400.00		400.00	06/03/97	06/30/07
秦巴山区扶贫项目	30.00	150.00	180.00	06/10/97	12/31/04
第三国家农村供水项目		70.00	70.00	06/23/97	12/31/06
外高桥火电项目	400.00		400.00	06/24/97	12/31/06
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项目二期	430.00		430.00	06/24/97	12/31/03
小计	2490.00	325.00	2815.00		
1998					
山东环保项目	95.00		95.00	10/28/97	12/31/05
节能项目	63.00		63.00	03/26/98	06/30/06
华东（江苏）输电项目	250.00		250.00	03/26/98	03/31/06
国营农场商业化项目	150.00		150.00	03/31/98	12/31/03
基本卫生服务项目		85.00	85.00	05/19/98	06/30/07
沿海地区资源可持续发展项目	100.00		100.00	05/19/98	12/31/06
贫困地区林业发展项目	100.00	100.00	200.00	05/21/98	01/01/06
河北地震恢复项目		28.40	28.40	05/28/98	12/31/00
广州市中心区交通项目	200.00		200.00	05/28/98	12/31/06
内河航运项目二期	123.00		123.00	05/28/98	12/31/06
第三国道项目	250.00		250.00	05/28/98	12/31/04
塔里木盆地项目二期	90.00	60.00	150.00	06/09/98	12/31/04
广西城市环保项目	72.00	20.00	92.00	06/16/98	12/31/07
湖南电力发展项目	300.00		300.00	06/18/98	12/31/05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加强农业灌溉项目二期	300.00		300.00	06/18/98	06/30/05
三省公路项目	230.00		230.00	06/23/98	06/30/07
小计	2323.00	293.40	2616.40		
1999					
安徽公路项目	200.00		200.00	12/15/98	08/31/05
安宁河流域农业发展项目	90.00	30.00	120.00	01/21/99	12/31/06
长江洪水紧急恢复项目	40.00	40.00	80.00	02/09/99	06/30/02
会计制度改革和发展项目	27.40	5.60	33.00	02/23/99	12/31/07
集装箱运输项目	71.00		71.00	03/16/99	06/30/05
辽宁城市交通项目	150.00		150.00	03/30/99	12/31/05
第九卫生项目	10.00	50.00	60.00	05/05/99	06/30/08
第四技术合作信贷项目	10.00	35.00	45.00	05/18/99	10/31/07
高等教育改革项目	20.00	50.00	70.00	05/18/99	09/30/05
关中灌区改造项目	80.00	20.00	100.00	05/25/99	06/30/06
黄土高原小流域治理项目二期	100.00	50.00	150.00	05/25/99	06/30/05
第四农村供水和卫生项目	16.00	30.00	46.00	06/03/99	12/31/06
养老金体制改革技术援助项目		5.00	5.00	06/04/99	12/31/05
可再生能源项目	100.00		100.00	06/08/99	06/30/07
第四国家公路项目	350.00		350.00	06/17/99	06/30/06
四川城市环境项目	150.00	2.00	152.00	06/17/99	01/31/07
甘肃和内蒙古扶贫项目	60.00	100.00	160.00	06/24/99	06/30/06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第二福建公路项目	200.00		200.00	06/24/99	06/30/07
企业改革项目		5.00	5.00	06/29/99	12/31/05
小计	1674.40	422.60	2097.00		
2000					
小规模肉牛发展项目	93.50		93.50	12/22/99	12/31/05
桐柏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320.00		320.00	12/22/99	12/31/07
广西公路项目	200.00		200.00	03/28/00	06/30/07
第三河南公路项目	150.00		150.00	05/16/00	12/31/06
重庆城市环境项目	200.00		200.00	06/15/00	12/31/08
北京环保项目二期	349.00		349.00	06/20/00	03/31/09
河北城市环境项目	150.00		150.00	06/27/00	06/30/08
长江干堤加固项目	210.00		210.00	06/27/00	06/30/08
小计	1672.50		1672.50		
2001					
金融技术援助补充项目	8.00		8.00	08/01/00	
节水灌溉项目	74.00		74.00	12/19/00	06/30/06
乌鲁木齐城市交通改善项目	100.00		100.00	12/19/00	12/31/07
淮河污染控制项目	105.50		105.50	03/22/01	06/30/07
石家庄城市交通项目	100.00		100.00	03/27/01	12/31/08
第二江西公路项目	200.00		200.00	06/05/01	12/31/06
辽河流域环境治理项目	100.00		100.00	06/19/01	12/31/07
内河航运项目三期	100.00		100.00	06/21/01	12/31/07
小计	787.50		787.50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2002					
国家铁路项目	160.00		160.00	01/29/02	12/31/07
结核病防治项目	104.00		104.00	03/21/02	03/15/10
可持续林业发展项目	93.90		93.90	04/16/02	08/31/09
内蒙古公路项目	100.00		100.00	06/06/02	03/31/08
小计	457.90		457.90		
2003					
第三新疆公路项目	250.00		250.00	09/17/02	12/31/07
湖北孝感 - 襄樊公路项目	150.00		150.00	09/05/02	12/31/07
宜兴抽水蓄能项目	145.00		145.00	03/20/03	12/31/10
天津城市发展与环境项目	150.00		150.00	05/20/03	06/30/12
上海城市环境项目一期	200.00		200.00	06/17/03	03/31/10
第二安徽公路项目	250.00		250.00	06/24/03	06/30/09
小计	1145.00		1145.00		
2004					
西部地区基础教育项目	100.00		100.00	09/09/03	06/30/09
甘肃新疆畜牧业发展项目	66.27		66.27	09/09/03	06/30/10
江西农业现代化项目	100.00		100.00	11/20/03	06/30/10
浙江城市环境项目	133.00		133.00	01/29/04	06/30/11
武汉城市交通项目	200.00		200.00	03/09/04	06/30/10
第四内河航运项目	91.00		91.00	03/25/04	06/30/11
广东珠江三角洲城市环境项目	128.00		128.00	06/09/04	12/31/11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第二国家铁路项目	200.00		200.00	06/25/04	01/31/08
湖北十漫公路项目	200.00		200.00	06/25/04	12/31/09
小计	1218.27		1218.27		
2005					
太湖流域城市环境项目	61.00		61.00	08/03/04	06/30/10
湖南城市发展项目	172.00		172.00	09/16/04	10/31/12
内蒙古交通和贸易走廊项目	100.00		100.00	02/16/05	06/30/10
宁波水环境管理项目	130.00		130.00	03/18/05	12/31/10
农业科技项目	100.00		100.00	04/28/05	12/31/10
柳州环境管理项目	100.00		100.00	05/25/05	06/30/11
可再生能源规模扩大项目	87.00		87.00	06/17/05	09/30/10
贫困农村社区发展项目	100.00		100.00	06/21/05	06/30/11
重庆小城市基础设施改造项目	180.00		180.00	06/21/05	06/30/12
小计	1030.00		1030.00		
2006					
上海市城市环境项目二期	180.00		180.00	07/05/05	03/31/15
农业加强灌溉项目三期	200.00		200.00	10/11/05	12/31/10
内河航运项目五期	100.00		100.00	10/11/05	06/30/11
福州城市交通项目	100.00		100.00	12/15/05	05/31/13
黑龙江奶业项目	100.00		100.00	01/24/06	12/31/11
可再生能源规模扩大项目一期的后续项目	86.33		86.33	02/07/06	09/30/10
经济改革实施项目	20.00		20.00	04/11/06	12/31/13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江西公路三期项目	200.00		200.00	06/27/06	12/31/10
辽宁中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218.00		218.00	06/27/06	10/31/13
河南县城供水和环境卫生项目	150.00		150.00	06/27/06	06/30/13
长江珠江流域治理项目	100.00		100.00	06/27/06	06/30/12
小计	1454.33		1454.33		
2007					
四川省城市环境治理项目	180.00		180.00	09/07/06	12/31/13
福建省级公路发展项目	320.00		320.00	10/12/06	06/30/15
广西综合林业发展与保护项目	100.00		100.00	12/14/06	12/31/12
国家铁路三期项目	200.00		200.00	01/23/07	06/30/13
山东城建环境二期项目	147.00		147.00	02/27/07	12/31/13
陕西安康公路发展项目	300.00		300.00	03/13/07	06/30/12
广东珠江三角洲城市环境项目二期	96.00		96.00	03/21/07	12/31/13
微小企业贷款项目	100.00		100.00	06/19/07	06/30/11
辽宁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二期项目	173.00		173.00	06/26/07	12//31/13
农村安全饮水及卫生项目	25.00		25.00	06/26/07	09/30/12
小计	1641.00		1641.00		
2008					
贵州省贵阳城乡公路发展项目	100.00		100.00	01/08/08	12/31/13
安徽省蚌埠市防洪、生态环境治理项目	100.00		100.00	03/11/08	06/30/15
甘肃省自然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38.40		38.40	03/20/08	12/31/13
安徽省路网改造项目	200.00		200.00	04/22/08	06/30/12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湖北汉江污染治理项目	84.00		84.00	04/29/08	06/30/15
节能转贷项目	200.00		200.00	05/27/08	12/31/16
山东省电厂脱硫项目	50.00		50.00	05/27/08	06/30/12
辽宁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三期项目	191.00		191.00	05/27/08	06/30/16
农村卫生发展项目	50.00		50.00	06/24/08	12/31/14
农民工培训与就业项目	50.00		50.00	06/24/08	02/28/15
西安城市综合交通改善项目	150.00		150.00	06/24/08	03/31/17
石家庄至郑州铁路项目	300.00		300.00	06/24/08	11/30/15
小计	1513.40		1513.40		
2009					
江西赣江石虎塘航电枢纽项目	100.00		100.00	09/25/08	06/30/14
生态农业项目	120.00		120.00	12/02/08	06/30/14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紧急贷款项目	710.00		710.00	02/12/09	05/31/16
湖北宜巴公路项目	150.00		150.00	03/31/09	12/31/15
贵广铁路项目	300.00		300.00	04/16/09	12/31/15
贵州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发展项目	60.00		60.00	05/05/09	06/30/17
云南城市环境项目	90.00		90.00	05/05/09	04/30/17
山西煤层气开发与利用项目	80.00		80.00	05/19/09	06/30/17
江苏省供水和污水项目	130.00		130.00	06/02/09	12/31/15
西宁市防洪及流域管理项目	100.00		100.00	06/02/09	12/31/15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	20.00		20.00	06/02/09	12/31/14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南广铁路项目	300.00		300.00	06/24/09	12/31/14
上海城市环境项目三期	200.00		200.00	06/25/09	06/30/17
小计	2360.00		2360.00		
2010					
宁波新农村建设项目	50.00		50.00	02/25/10	03/31/16
武汉第二城市交通项目	100.00		100.00	03/30/10	12/31/15
山东生态造林项目	60.00		60.00	05/06/10	07/31/16
吉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	100.00		100.00	05/13/10	06/30/17
宁夏公路项目	250.00		250.00	05/13/10	06/30/15
安徽省中等城市交通建设项目	100.00		100.00	05/20/10	12/31/17
河南黄河滩区生态畜牧业示范项目	80.00		80.00	05/27/10	12/31/15
辽宁省和山东省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	40.00		40.00	06/01/10	12/31/15
南宁城市环境项目	100.00		100.00	06/01/10	12/31/15
重庆城乡一体化项目	84.00		84.00	06/03/10	06/30/17
太原城市交通项目	150.00		150.00	06/10/10	07/15/14
贫困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项目	100.00		100.00	06/10/10	12/31/15
吐鲁番地区节水灌溉项目	100.00		100.00	06/17/10	03/31/17
能效融资二期项目	100.00		100.00	06/22/10	12/31/16
小计	1414.00		1414.00		
2011					
林业综合发展项目	100.00		100.00	07/06/10	12/31/16
淮河流域重点平原洼地治理项目	200.00		200.00	07/06/10	12/31/16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云南城市环境项目二期	60.00		60.00	07/06/10	04/30/17
浙江省钱塘江流域小城镇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100.00		100.00	01/20/11	12/31/16
柳州市环境综合治理项目二期	150.00		150.00	03/10/11	05/31/18
沙颍河安徽段航道整治项目	100.00		100.00	04/12/11	12/31/17
四川小城镇发展项目	100.00		100.00	05/10/11	12/31/16
昆明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300.00		300.00	05/10/11	06/30/18
乌鲁木齐集中供热节能改造项目	100.00		100.00	05/17/11	12/31/15
福建农村公路恢复和改善项目	50.00		50.00	05/19/11	06/30/15
山东孔孟文化遗产地保护项目	50.00		50.00	05/24/11	12/31/16
巴彦淖尔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80.00		80.00	05/24/11	12/31/18
吉图珲铁路项目	200.00		200.00	05/24/11	12/31/16
山东能效项目	150.00		150.00	06/09/11	03/31/18
小计	1740.00		1740.00		
2012					
能效融资项目	100.00		100.00	10/27/11	12/31/16
四川武都引水二期灌溉工程	100.00		100.00	02/28/12	10/31/19
张呼铁路项目	200.00		200.00	03/15/12	06/30/20
长治市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项目	100.00		100.00	03/22/12	12/31/17
湖北省襄阳市城市交通项目	100.00		100.00	04/26/12	01/31/19
节水灌溉二期项目	80.00		80.00	05/10/12	06/30/17
云南省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	50.00		50.00	05/15/12	12/31/17
宁夏荒漠化防治和生态保护项目	80.00		80.00	05/17/12	01/31/20
小城镇综合经济发展项目	150.00		150.00	05/24/12	12/31/18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新疆伊宁城市交通改善项目	100.00		100.00	05/29/12	12/31/17
甘肃庆阳城市基础设施改善项目	100.00		100.00	05/31/12	11/30/19
重庆市统筹城乡卫生项目	100.00		100.00	06/14/12	08/31/20
小计	1260.00		1260.00		
2013					
湖南森林恢复与发展项目	80.00		80.00	01/17/13	03/31/19
福建湄洲湾航道改善项目	50.00		50.00	02/28/13	06/30/19
江西景德镇城市综合防洪项目	100.00		100.00	03/20/13	06/30/20
上海发展绿色能源建设低碳城区项目	100.00		100.00	03/20/13	12/31/18
江西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城镇发展示范项目	150.00		150.00	03/20/13	12/31/18
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项目	150.00		150.00	03/20/13	09/30/19
北京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扩大示范项目	120.00		120.00	03/20/13	12/31/19
江西省上饶市三清山机场建设项目	50.00		50.00	05/13/13	12/31/18
广西来宾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80.00		80.00	05/31/13	01/31/20
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循环利用示范项目	80.00		80.00	05/31/13	03/31/20
马鞍山市慈湖河流域水环境治理项目	100.00		100.00	06/04/13	07/31/20
江西省南昌市轨道交通项目	250.00		250.00	06/20/13	12/31/19
安徽宣城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基地基础设施示范项目	150.00		150.00	06/20/13	08/31/20
广东城乡社保一体化和农民工培训项目	80.00		80.00	06/20/13	10/31/20
小计	1540.00		1540.00		
2014					
综合现代农业发展项目	200.00		200.00	12/27/13	12/31/20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广东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	100.00		100.00	12/27/13	06/30/21
安徽黄山新农村建设示范项目	100.00		100.00	12/27/13	06/30/20
青海西宁城市交通项目	120.00		120.00	12/27/13	05/30/21
贵阳农村公路项目	150.00		150.00	03/06/14	12/31/20
哈尔滨高寒城市智能公交建设项目	200.00		200.00	03/28/14	06/30/21
哈佳铁路项目	300.00		300.00	03/28/14	12/31/20
山西燃气利用项目	100.00		100.00	03/28/14	06/30/21
焦作绿色交通及交通安全改善项目	100.00		100.00	05/15/14	06/30/21
云南红河州滇南中心城市交通项目	150.00		150.00	05/15/14	12/31/21
经济改革促进与能力加强技术援助项目	35.00		35.00	05/22/14	10/31/21
福建渔港项目	60.00		60.00	06/03/14	12/31/20
小计	1615.00		1615.00		
2015					
青海西宁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150.00		150.00	09/25/14	06/30/21
陕西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50.00		150.00	09/25/14	12/31/20
浙江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及饮水项目	200.00		200.00	09/25/14	12/31/20
贵州农村发展项目	100.00		100.00	09/30/14	08/31/20
郑州市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250.00		250.00	12/23/14	06/31/21
重庆市小城镇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100.00		100.00	12/23/14	12/31/20
桂林市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100.00		100.00	02/02/15	12/31/20
河北省农村再生能源开发示范项目	71.50		71.50	03/13/15	12/31/20
川渝合作(广安)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00.00		100.00	03/16/15	09/30/20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甘肃省统筹城乡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50.00		150.00	03/31/15	06/30/21
云南省公路资产管理项目	150.00		150.00	03/31/15	12/31/20
安徽淮南采煤坍塌区综合治理项目	100.00		100.00	05/11/15	06/30/21
新疆职业教育项目	50.00		50.00	05/29/15	12/31/20
贫困片区产业扶贫试点示范项目	150.00		150.00	06/23/15	06/30/21
小计	1821.50		1821.50		
2016					
贵州省铜仁市农村交通项目	150.00		150.00	09/25/15	06/30/21
天津市城市交通改善项目	100.00		100.00	12/21/15	03/31/21
乌鲁木齐市城市交通改善项目二期	140.00		140.00	12/21/15	12/31/21
河北省清洁供热示范项目	100.00		100.00	01/19/16	06/30/21
湖北荆州古城修复与保护项目	100.00		100.00	01/19/16	06/30/21
武汉城市圈交通一体化示范项目	120.00		120.00	02/26/16	12/31/21
京津冀空气污染治理创新融资计划	500.00		500.00	03/22/16	12/31/21
湖南株洲清水塘区域重金属污染环境治理项目	150.00		150.00	03/31/16	12/31/21
湖北孝感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00.00		100.00	04/29/16	06/30/21
现代财政制度与国家治理项目	22.00		22.00	04/29/16	07/31/21
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计划	500.00		500.00	06/06/16	12/31/19
小计	1982.00		1982.00		
2017					
宁波可持续城镇化示范项目	150.00		150.00	07/15/16	11/30/21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	300.00		300.00	10/13/16	06/30/22
云南学前教育发展实验示范项目	50.00		50.00	12/09/16	12/31/21
广西贫困片区农村扶贫试点示范项目	100.00		100.00	12/21/16	06/30/23
湖南省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政策贷款	200.00		200.00	01/10/17	12/31/17
重庆市大渡口区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政策贷款	200.00		200.00	01/10/17	12/31/17
陕西省贫困农村社区发展项目	100.00		100.00	02/09/17	12/31/22
安徽公路养护创新示范项目	150.00		150.00	02/21/17	12/31/23
甘肃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二期项目	100.00		100.00	02/24/17	12/31/22
江西鄱阳湖流域重点城镇污染综合治理与生态安全改善项目	150.00		150.00	03/16/17	12/31/22
甘肃省职业教育发展项目	120.00		120.00	03/31/17	06/30/23
医疗卫生改革促进项目	600.00		600.00	05/09/17	12/31/21
三峡现代物流中心项目	200.00		200.00	06/30/17	09/30/23
小计	2420.00		2420.00		
2018					
湖南省农田污染综合管理项目	100.00		100.00	08/22/17	12/31/23
广东省欠发达地区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示范项目	120.00		120.00	10/31/17	06/30/23
江西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	150.00		150.00	12/15/17	12/31/23
湖北汉江雅口航运枢纽项目	150.00		150.00	05/08/18	06/30/23
浙江千岛湖及新安江流域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150.00		150.00	06/06/18	06/30/24
江西省城乡供水一体化及农村污水处理项目	200.00		200.00	06/06/18	06/30/24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辽宁城镇供水安全可持续发展示范项目	250.00		250.00	06/06/18	06/30/23
广西贺州市水环境治理与城市综合发展项目	150.00		150.00	06/13/18	06/30/24
安徽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118.00		118.00	06/19/18	12/31/23
结果导向型贷款广西扶贫示范项目	400.00		400.00	06/22/18	12/31/21
小计	1788.00		1788.00		
2019					
安徽省农村公路提升改造示范项目	200.00		200.00	09/27/18	06/30/23
贵州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350.00		350.00	03/21/19	12/31/24
新型城镇化融资创新示范项目	200.00		200.00	05/21/19	06/30/25
陕西可持续城镇发展项目	100.00		100.00	05/28/19	12/31/25
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传承创新发展项目	180.00		180.00	06/04/19	06/30/25
中国可再生能源和电池储能促进项目	300.00		300.00	06/11/19	06/30/25
小计	1330.00		1330.00		
2020					
长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恢复项目	150.00		150.00	12/19/19	12/31/23
四川德阳水环境治理 PPP 项目	100.00		100.00	03/03/20	12/31/26
河南绿色农业基金项目	300.00		300.00	03/26/20	12/31/26
湖北省安全、可持续、智慧型农业项目	150.00		150.00	05/21/20	12/31/25
江西生态产业园区项目	200.00		200.00	06/18/20	12/31/26
中国新发传染病预防、准备和应对项目	300.00		300.00	06/18/20	09/30/25
小计	1200.00		1200.00		
总计	54496.70	9946.7	64443.40		

项目名称	单位: 百万美元			批准日期	关闭日期
	硬贷款	软贷款	总额		
部分担保项目:					
1994 扬州火电项目	\$90m 加相当于 \$30m 的日元				
1995 浙江电力项目	\$100m 加相当于 \$50m 的日元				
1996 二滩水电项目二期	\$100m 加相当于 \$50m 的德国马克				
紧急援助项目:					
1997 震后重建项目			\$67.3m		
2001 暴风雪紧急援助项目			\$10.2m		
2003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及其它传染病应对项目			\$11.5m		
注释:					
1. 贷款数额为承诺额。					
2. 所有紧急援助项目资金均来自其他项目贷款节余的重新分配。					

世界银行对华政策研究项目

1981—2021 财年

报告名称
1982
中国：上海市部门研究
中国：农村金融：部门研究
1983
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三册）
中国：近年来的经济趋势和政策发展
1984
中国：卫生部门
中国：运输部门研究报告
1985
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包括六个附件：教育、农业、能源、经济模式、经济结构和交通运输）
1986
中国：甘肃省的增长与发展
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与融资
1987
中国的工业改革
中国：浙江省：高速城市化的挑战
中国：中国发展所需的技能和职业教育
中国：教材开发
中国：畜牧业
中国：水泥机械制造业研究
中国：水路运输部门研究
1988
中国的农村改革、非农业部门的发展与农村现代化
中国：对外贸易与外资

报告名称

中国：金融与投资

中国：项目评价的经济价格

中国：华东电力价格研究

1989

中国：企业管理改革：问题和选择

中国：煤炭价格研究

中国：乡镇工业：概要、问题和展望

1990

中国的乡镇工业：结构、发展和改革

中国：社会主义分权制度下的宏观经济稳定和工业增长

中国：计划与市场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下的社会保障改革

中国：收入动员和税收政策的发展

中国：金融部门回顾：金融政策和机构发展

中国：电子工业部门研究报告

中国：经济过渡时期的产业政策

1991

中国：海南省的发展

中国：江苏省的经济发展

中国：省级教育与融资（两册）

中国：煤炭利用效率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改革

中国：农业变革的管理—粮食部门调研

中国：粮食改革选择

中国：广东省综合运输研究（两册）

1992

改革中的中国工业企业

中国经济改革案例研究

中国：90年代的改革和计划的作用

中国：转轨中的统计制度

中国：城市住房改革的问题和实施方案

中国：城市就业和工资制度改革

报告名称

中国: 90年代的扶贫战略

中国: 环保战略报告(两册)

中国: 工业重组: 三个城市的故事

中国: 通讯业部门研究报告: 调查、评估和战略建议

中国: 铁路投资研究

中国: 卫生模式转变中的长远问题与对策(两册)

1993

中国: 公路发展与管理的问题、选择和战略

中国: 管理高速增长和转轨

中国: 价格改革的成就和挑战

中国: 新兴市场经济下的城市土地管理

中国: 经济发展中的新技能—企业改革对就业与培训的影响

中国: 非自愿移民

中国: 国内市场开发与调控

中国: 黄河流域投资计划研究(两册)

中国: 饲料业研究

中国: 节能研究

中国: 机床工业研究

中国: 产业组织和效率案例研究: 汽车工业

中国的铁路战略

中国: 东南沿海地区: 港口和航运发展的战略问题

1994

中国: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中国: 预算政策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两册)

中国: 外贸改革: 迎接90年代的挑战

中国: 金融改革: 现状和问题

中国: 效果评价报告: 华北平原农业项目

中国: 农业经济作物销售体制改革

中国: 电力部门改革: 投入竞争, 提高效益

1995

中国: 在权力下放的经济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中国: 城市环保服务管理

报告名称

中国：新兴资本市场（两册）

中国：公共投资和金融

中国：中国煤炭和电力输送系统的投资战略

中国：公路货运发展战略

1996

中国：集装箱运输服务与贸易

中国：中国经济：治理通胀，深化改革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中国：蔬菜水果销售体制改革

中国：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

1997

中国：企业资产管理：国家作为股东

2020 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

2020 年的中国：共享增长的收入：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2020 年的中国：中国的参与：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2020 年的中国：老年保障：中国的养老金体制改革

2020 年的中国：卫生部门融资：中国的问题与选择

2020 年的中国：碧水蓝天：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环境

2020 年的中国：中国的粮食安全：长期问题与可选方案

1998

中国：万众一心向前走：交通行业战略

1999

中国的企业改革：所有制、转轨和效益

中国农业的转型与发展

中国：战胜风暴，汲取教训

中国 21 世纪教育发展战略目标

中国农村的过渡与发展

中国交通：世界银行援助项目评估

2000

改善道路，摆脱贫困

中国城市化战略研讨会论文集：机会、问题和政策选择

报告名称

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机遇与挑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新兴的私营企业：新世纪的前景

中国：加强公共支出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2001

上海国际城市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会议论文集

中国国有企业的破产研究：改革破产制度的必要性和途径

中国与知识经济：把握 21 世纪

中国：空气、土地和水：新千年的环境优先领域

中国：战胜农村贫困

中国北方地区水行业战略研究

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现代化结构改革和监管

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监管改革国际研讨会报告（摘要）

2002

中国林业政策国际论坛论文集

中国的公司治理和企业改革：建立现代市场制度

中国国别社会性别报告

中国：省级支出考察报告

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政策：经验和政策建议

中国：天然气长距离运输和城市配气的经济监管

改善和推进中国电力改革

关于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建设规划的建议

2003

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城市竞争力：中国 23 个城市排名

发展中国的机构投资者

中国经济备忘录：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

借鉴国际经验管理中国的国有企业资产

农民用水者协会在中国：世界银行项目支持的参与式管理模式及其发展

有关民营部门参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和建议：公路、水和电力行业

在国有企业集团中行使所有权：中国可以从国际经验中学到什么？

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

供暖计量与收费：技术方案、政策与规章—中国的示范项目与国际经验

中国天然气行业下游领域监管框架国际研讨会提要

报告名称

2004

中国西南地区中小企业的投资环境

中国：国别援助评价报告

中国与 WTO：入世、政策变革和减贫战略

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

韩国公司债券市场研究及其对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的影响

2005

中国：全国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分割：经济成本和政策建议

中国：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改善公共服务提供

中国非营利组织适用税法研究

2006

中国辽宁社会保障改革试点评估

中国西南扶贫和环境工作实施指南

村级综合扶贫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

在扶贫行动中关注环境问题

扶贫项目中的环境问题 - 指南

云南村级扶贫项目 - 评估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中国利用外资的前景和战略研究

中国：加强机构建设，支持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

中国废弃物管理：问题和建议

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回顾与政策建议

中国水果和蔬菜产业遵循食品安全要求的研究

振兴东北发展战略

促进投资和创新：振兴东北的市场化途径

国有企业分红：分多少？分给谁？

2007

发展终身学习，提高中国竞争力

中国的信息革命：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

机不可失：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性别差异与扶贫研究报告

中国电力监管机构能力建设研究报告

政府治理、投资环境与和谐社会：中国 120 个城市竞争力的提高

报告名称

中国农民专业协会：回顾与政策建议

中国的发展重点

中国北方城市水行业管理研究项目：摘要报告

中国：管理多方运营铁路环境下的经济界面

中国的水质管理：政策和机构考虑

中国环境污染损失

2008

改善农村公共服务

中国的城市化：后果、战略和政策

能效融资：巴西、中国、印度的教训及其他

中国的公共财政：推动改革增长，构建和谐社会

2009

向公民社会组织采购社会服务的国际经验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开发社区受益机制研究

中国道路交通安全报告：成就、挑战及展望

老轨道，新交通：1990 ~ 2008 年的中国铁路工业及未来计划与契机

重庆城乡统筹研究

中国城市轨道发展

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提供

中国食品安全

中国内河运输可持续发展研究

中新天津生态城研究

改进中国地方政府投资集团公司的市场借贷模式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2004—2009）：五年经验

迎接中国大规模发展风能的空前挑战：近海和大规模风能战略指导

加强中国环境保护的行政体系：分析与建议

国家铁路建设投资政策

林业政策：深化改革，扩大合作

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要点和建议

自贸区协定中的劳动力流动性条款：带给中国的经验

自由贸易区协定中的环境保护条款：带给中国的经验

自由贸易区协定中的竞争条款：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

报告名称

旅游业与中国经济刺激方案

通过创新实现发展上海产业战略

中国：促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

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

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期进展评估

解决中国的水稀缺：关于水资源管理若干问题的建议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煤炭工业 - 安全、经济和环保

展望中国城市水业

中国与世界银行：推动创新的伙伴关系

2010

金融可获得性（2010 财年）

农业生产体系适应气候变化

关于遵守标准和守则的报告（ROSC）：中国会计与审计评估

广东省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研究

降低能源强度政策研究

林业政策对话

中国医改政策建议系列报告

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研究

铁路部门市场化定价政策研究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报告

农村义务教育改革（原为促进基础教育）

中国农村卫生改革

农村养老保险与社会安全网

从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转移和社会政策

中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通过农村低保解决贫困问题

国有企业分红政策

2011

金融可获得性（2011 财年）

中国私营部门发展规划

儿童早期发展

金融稳定研究（2010 财年）

中国金融部门评估规划

报告名称
洪灾风险综合管理的主要经验
土地流转与登记技援项目
地方政府融资与债务研究
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研究报告（2011 财年）
宁波：气候变化城市适应性研究
非传染性疾病技援项目
“十二五”规划政策与机构改革
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重塑上海经济版图
农村地区污水治理研究
中国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制度研究
水价与用水者协会可持续性研究
2012
2030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
中国水资源伙伴战略
吐鲁番盆地基于用水量的水权管理制度
气候变化给中国水资源带来的发展影响
城市供水的经济、财务和商业调研
城市交通部门提高能效与应对气候变化
风电利用的激励机制评价
政府设施能效项目
卫生系统改革实施与检测评价研究
高速铁路系统的一体化
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及性
中国经济季报及宏观财政政策建议
城市给排水设计国家标准审查与更新
国家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修订
中国社会安全网与劳动力市场问题
城市交通气候变化战略
供水与环境卫生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
2013
中国智能电网发展的能力建设
中国碳捕获与封存能力建设技援

报告名称
中国清洁炉灶倡议
集体产权制度与政策改革方案选择
食品安全
上海发展低碳城市绿色能源规划
中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和金融认知
金融部门业务活动
金融部门改革战略
中国供热调节二期
中国住房政策、城市规划与一体化发展
中国普惠金融学院
经济适用房投融资创新模式
中国市政融资与债务管理
中国包容性创新促进
省级节能从业人员论坛
中国轨道金融期货分析
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
云南省四个经济部门技能开发
国有林业改革
地方政府公共财政与债务管理
资助中国出席 2011 年世界银行 - 新加坡基础设施融资峰会
可持续的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机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
交通系统安全
山东文化遗产保护试点
中国适应气候变化的风险管理方法
2014
从供求双方分析老年卫生服务的需求
养老金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儿童早期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的电力监管措施
建立金融统计综合信息平台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报告名称

改善中国的社会救助体制

能效监测、核查和报告的问题与选择

低碳生态城市融资模式与低碳产业发展

铁路项目地区经济效益模型分析

城市交通知识管理平台

上海绿色能源建设低碳城区

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

中国东北地区林业改革

2015

保持与中央和省级在人力资源领域的战略对话

低碳城市定义和测量

将应对气候变化考虑纳入中国能源法规

中国碳捕获与封存能力建设技援

行业层面的战略环评应用

2013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

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报告

中国地方公共财政和债务管理

小城镇基础设施发展可持续融资

促进上海市长宁区经济适用房建设

中国高铁区域经济影响分析

2016

金融消费者保护与扫盲

亚太区清洁炉灶行动倡议 - 中国

地方债务监测制度

小城镇资产管理

中国铁路股权融资

中国化石能源补贴研究

智能交通与能效

2050年的上海

小城镇基础设施融资

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性别维度

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

报告名称

建立创新型能效融资机制

制定深圳低碳发展战略

中国老年护理选择

2017

中国金融消费者教育评价

智能交通系统的性别影响

乌鲁木齐地区供热价格技术援助

中国扶贫项目系列研究

中国交通转型与创新知识平台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促进中国的绿色创新

世行项目财务管理 / 支付 / 采购培训研讨会

中国公平性分析

2018

中国：污染地块再开发管理

中国绿色增长融资

中国金融部门评估规划更新

中国增长新动能：创新与私营部门发展

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推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公共部门内部审计方法报告

健康中国：深化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设基于价值的优质服务提供体系

中国增长新动能：增长与生产力专题报告

第一阶段：德阳雅安韧性城市规划

中国规划城市咨询服务与分析

支持重庆市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

中国水治理研究

2019

医疗卫生服务供方支付改革影响评估：县级医院评估

完善中国低保制度，减少贫困与不平等

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和就业体系体系

劳动力市场咨询服务和分析

提升公共部门绩效的体制机制

报告名称

规划性能源转型

促进中国具有融合性的优质教育

中国金融部门发展以及普惠金融

创新中国：培育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增长新动能

中国韧性基础设施和灾害准备知识

养老服务融资方案

一带一路：依托交通走廊，通过强化全球价值链和投资促进区域和地方经济发展

中国的贫困与不平等：监测与政策问题

支持电力体制改革推动中国能源转型

中国营商环境

对口单位采购、财务管理和贷款支付能力强化

中国农业“十四五”规划：农业现代化绿色转型与增长

中国营商环境之担保交易与破产法制改革

2020

中国可持续森林管理与融资回顾

地方采购制度评估

重庆 2035：空间与经济转型传播

中国城市规划咨询服务与分析

中国水电行业移民管理经验回顾

创新促进与“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支持

中国城市贷款项目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

上海营商环境建筑许可和跨境贸易改革

北京营商环境建筑许可与财产登记改革

2020 财年中国营商环境

中国合作方采购、财务管理与支付能力加强

中国新土地管理法业务影响回顾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经验系列



世界银行集团



世界银行
与中国合作
周年